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雄壮的故事

伟大的“地下长城”

第十册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难忘的故事

伟大的“地下长城”

奋起反抗的人民

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崛起一座大山，屹立天地之间，坚不可摧。这座大山并非积石而成，而是 4 万万中国人意志的凝聚，是中华魂的强烈的闪射，是世界战争史上罕有的巍巍人山。这座巍巍人山，抵抗了日本侵略者成千上万次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面对野蛮的烧杀抢掠毫不动摇，最后粉碎了侵略者妄图永久占领中国领土的迷梦。

日寇在中国无恶不作的暴行激怒了中国人民，激起了人民的奋起反抗。热血的青年学生组织起学生军，人民群众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手无寸铁的农民也大义凛然，拒不为鬼子兵带路。他们用鲜血谱写了一章又一章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诗篇。

1937 年 9 月 22 日， 3000 多日本鬼子闯入徐水县漕河北岸的于坊村，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就烧，强奸妇女，屠杀孩子。一群鬼子去敲易老端的家门，64 岁的易老端闩上大门，手拿顶门杠站在门后，说：“鬼子要是进来，我就和他们拼了！” 3 个鬼子破门而入，易老端冲出门后，用顶门杠将一日本兵打倒，另外两个鬼子扑向老人，一个用刺刀刺，一个用洋刀劈，老人胸背 7 处受伤，仍用顶门杠与敌搏斗，直到最后一息。

村南头 54 岁的张老配听到阵阵枪声和哀叫声，把 4 个儿子叫到一起说：“你们的爷爷在义和团与洋鬼子斗时，双腿被打断了没眨一眼。如今洋鬼子又来欺负咱们，咱们不能给祖宗丢脸，更不能给中国丢脸，今天准备和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了。”4 个儿子吼道：“他来一个撂倒一个，来两个就杀他一双，只要咱们有一个活着，就不能叫小鬼子占便宜！”张老配说：“好！咱们给小鬼子来个暗计，门大开着，他一进来，咱们就动手，大伙赶紧抄家伙去！”张老配首先拿起他爹传给他的长矛；大儿子张舫从柴禾垛边抄起铁叉；二儿子张思身高体壮，在院里转一圈没找到合适的家伙，便跑到牲口棚，拆下了铡草的大铡刀；三儿子张全拿起了推碾子的大棍；四儿子张教找了一把刮树皮的镰刀。父子 5 人找到家伙后，又聚到正房。张老配指挥说：“老大、老二藏在右扇门后，老三、老四藏在左扇门后，我在窗口监视。兔崽子们来了，我说打，大家就一起上。” 4 个儿子异口同声地说：“行，就这么干！”大约 9 点多钟，5 个鬼子端着刺刀出现在院门口。藏在窗后的张老配低声对儿子说：“准备好！狗日的们来了。”4 个儿子握紧手中的家伙，准备着。

鬼子见院里很静，又敞着门，便径直向屋里走来，他们刚要进屋门，张老配隔窗看得清楚，大喝一声：“打！”说时迟，那时快，走在前面的鬼子，一个被老大用铁叉子插住左胸，一个被老三用推碾棍打中脑袋。两个鬼子连滚带爬摔下台阶。后边的鬼子一见屋里有人，赶紧往后退。张老配父子一窝蜂追了出来。最近处的鬼子慌忙举枪射击，“砰”的一声，老大张舫被打中前胸当场身亡。老二张思又扑向另一个鬼子，将大铡刀抡去。鬼子躲闪不及，一下被削了半个脑袋。随即，张思又扑向另一个鬼子。将大铡刀抡去，鬼子慌忙躲闪，被砍下半个胳臂。就在张思举刀再砍之际，一个鬼子刺刀刺入他后背。他踉跄两步倒下。老三张全也急了眼，扔下推碾棍，趁鬼子还没收回刺刀，窜上去勒住了他的脖子，两个人在地上扭打起来。张老配大步跑过去，用长矛一下子刺入鬼子后胸。剩下的两个鬼子一看 5 个死了 3 个，真发急了，有个军官模样的鬼子掏出手枪就打。老四张教看见忙叫：“爹，防着！”说

着上前推父亲，鬼子军官的枪响了，张教被击中头部倒下。这时院外传来鬼子的皮靴声。日寇援军来了。张老配见 4 个儿子死了 3 个，父子 5 人只剩下一老一小了，便大喝一声：“ 小三儿，我掩护，你快跑！ ”老三张全双眼喷着怒火，咬着牙吼道：“ 不走，今天和他们拼了！ ”

张老配不容儿子再说，一边用长矛抵挡着追上来的鬼子，一边把儿子推向墙根。当张老配欲助儿子一臂之力，用手托儿子上墙时，鬼子的刺刀刺进了他的后背。张老配喊了一声：“ 三儿快跑！ ”就倒了下去。老三张全哭叫了声：“ 爹——”跳下墙跑了。不久，在抗日武装里多了个不怕死的机枪射手，他就是张全。

1939 年的 11 月 5 日，日本侵略军在钦州、防城登陆，沿邕钦公路攻占了南宁。陆屋小镇也受到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敌军的侵扰，小镇的人家纷纷向偏僻的山村逃难，平日里沉寂宁静的山野挤拥着扶老携幼的逃难人群。

那天鬼子兵从陆屋向灵山进犯，到了三隆附近的农村时，他们抓到一个逃避不及的农民，强迫给他们带路，想抄小路绕过蔡廷锴部队防守的大路。起初这位年近半百的老农民很倔强，他拒绝给鬼子兵带路，不愿充当汉奸，因而受到鬼子兵的枪托和皮鞭的一顿毒打。毕竟鬼子兵急需一名向导，毒打后不想马上杀他，又劝说要他带路。老农心生一计，佯装愿意充当“ 皇军 ”的向导，带领他们进攻灵山县城——蔡廷锴将军总部所在地。他先领着鬼子兵走了一段山间小路，绕了几个弯，转得鬼子兵一时迷失了方向，就把他们引向与灵山县城相反方向的太平小镇。风风火火走了几十华里，快到太平小镇的一个山坳上，鬼子兵遇上梁振武率领的灵山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伏击。经过一场恶仗，鬼子兵到达了太平镇，它的指挥官拿出军事地图对照，看出这里不像是灵山县城，厉声喝问老农这是什么地方？老农默不作声，在多次喝问后，最后他只从牙缝中挤出两个字：“ 太平 ”。鬼子知道上当了，狰狞面目毕露，立即抽出军刀向老农砍去。这位铁骨铮铮的中国农民，既不抗争也不求饶，无声地倒下，热血染红了他祖祖辈辈眷恋的家乡土地。

群众不惜牺牲性命掩护报社，令人敬佩。有一次，敌人“ 清剿 ”报社印刷厂所住的村庄，一直未找到隐蔽起来的机器，就鞭打没有逃脱的老少，逼问机器藏在哪里。先把一个老人倒吊在树上，用刺刀乱戮，把老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可是老人什么也不说。敌人又抓出一个 13 岁的孩子。捆了一支胳膊吊到树上，用鞭子毒打。这个孩子痛得大声惨叫，同样什么也不说。更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是，敌人用刺刀对准群众的胸口，逐个逼问报社的人和机器设备在哪里。第一个被逼问的，坚决地回答：“ 没有！ ”当场被刺死了。第二个被逼问的人，同样回答“ 没有！ ”也被刺死了。第三个人，仍然回答“ 没有！ ”这悲壮的事迹，不仅表现了保护报社亲人的生死情谊，也表现了崇高的不可屈也不可辱的民族气节。

民兵们在锄奸反特和打击汉奸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河北任邱县东良淀村虽距敌保定据点不远，附近也有很多炮楼，但因紧靠白洋淀，好藏好打，建立了较巩固的抗日政权和民兵组织。敌人为搞垮它，费了不少心思。1940 年 3 月的一天上午，区游击队来到东良淀村，村游击组长刘进把他们安排好住下，自己腰里掖颗手榴弹到村外去巡逻，出村不远，他忽然发现村南王家坟地有个女人在东张西望，十分可疑，于是，加快脚步朝女人走去。这女人 50 来岁，衣服破烂，脸很脏，胳膊上挎着柳条篮。她见刘进走来，赶紧蹲在一个坟头前，从筐里拿出一叠黄纸，边烧边哭起来，刘进见她很面生，虽然

哭，但干打雷不下雨，就问：“你哭谁呀？”女人嚎道：“哭俺闺女。”刘进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这坟埋的是一位老人，怎么说是她的闺女？肯定这里有鬼。刘进想把她抓回去，一想：不行！一是怕抓错了，二是怕惊动了敌人。便装着关切地说：“老大嫂，你可要当心呀，现在到处都有八路军、游击队。”女人抬头问：“你是什么人？”刘进故作神秘地小声说：“不瞒你说，我是青塔炮楼上的。”女人一听立刻眉开眼笑，凑过来说：“我是专门给‘皇军’探消息的，‘皇军’每次‘扫荡’，得来的衣服、粮食都给我不少，今后晌‘皇军’就要到这村来。”刘进故意夸奖她：“你真能，愿意不愿意给我们青塔炮楼办事？每月给你 20 块大洋。”女人顿时眉飞色舞：“那感情好。”“我们队长正在村里玩牌，顺便见见。”刘进说着领女人来到区小队驻地，经过盘问，原来她是被敌人收买的汉奸，每次“扫荡”时，她都打前站，探听我抗日军民情况。随后，区小队马上带上她转移了，后经政府批准，发布告将她处死。以后，汉奸、特务就很少敢到这里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村政权的保卫者就是民兵。

同时，民兵在对敌斗争中直接发挥了作用。定襄县南涧村有个老海（边海禄）领导的民兵组织。这个村庄座落在小五台山西麓的千山万壑中，山形地貌复杂。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成立不久，这个村的民兵组织就成立了。1940 年春的一个早晨，村民们正在吃饭，忽然听到东山梁传来“当当”的敲钟声，村民们听到信号声，扔下碗，抱上孩子，牵上牲口就往山上跑。从河边来的几十个鬼子冲着山梁“砰、砰”开了枪，然后跑到村里，抢鸡抢羊、烧房子。年已 44 岁的民兵组长老海带着大家跑上南山梁，安排大家藏到一条沟里，自己带两个人到南山梁了望，一看，只见顶村的东梁上，六七个鬼子正架着机枪，烟雾腾腾地烧鸡吃。老海一看气得眼都红了。他回头对田丑三说：“走，咱们打死他们几个。”另一个民兵田金仓说：“咱们用什么打？火枪哪儿能打得了那么远。”老海说：“你们跟我来。”说完，带他们爬到半山崖，钻进一座古墓里，不会儿抱出 3 支步沧，他给每人发一支，还有 10 来发子弹，笑着说：”今天就看你们的把式 。”田五三一边高兴地往枪里压子弹，一边奇怪地问：“这枪是从哪里弄来的？”老海往前凑了几步，选了个有利地形，一边冲着鬼子瞄准，一边说：“前一阵河南游击队从咱这儿过，留下叫咱保存的，正好咱们先用一下……别着急，瞄准点。”说着“砰”地一枪，对面山梁上一个站着的鬼子栽倒了。其他鬼子“哇哇”叫着赶紧去抓枪。老海他们紧接着又“砰、砰、砰”打了几枪，把鬼子打倒了 3 个，鬼子的歪把子机枪盲目地发出了吼叫。老海是个放羊的。枪法为什么这么准呢？原来他过去放羊时，让狼咬过一次，他就省吃俭用买了支火枪，打起了山害，渐渐练出一手好枪法。鬼子打了一阵，就来追。两座山梁虽然很近，但中间隔着一道深沟，一下一上七八里地，等鬼子爬上这座山梁时，老海他们领着老乡们早跑得没影了。

南涧村的民兵打死了 4 个鬼子。一下出了名。他们在民兵连的基础上组织了南涧村游击中队，不光是自卫、护村，还经常出去一二十里，破坏敌人的铁路、割敌人的电线，在敌人碉堡前埋地雷。后来发现蔚家据点的十几个鬼子每隔 3 天就到方兰据点一次，他们就打了一次伏击，由于行动突然，先是地雷炸，后是枪支打，消灭鬼子五六个，还缴获了 6 支三八大盖枪、l 把战刀。民兵们把鬼子尸体上的钢盔摘下来，扣在头上走回村，神气极了。

敌人恼怒了，纠集了 300 多人来“扫荡”南涧村，老海和地的游击中队

从区里得到情报后，赶紧埋地雷，让乡亲们“坚壁清野”，做好了充分准备。敌人还没进村，在河川里就踩上地雷，接着又遭到山梁上老海游击中队的射击。当敌人付出很大伤亡追到山梁上，老海游击中队又跑到南坡，敌人追民兵追了一天也没追上，晚上宿营在村外又遭到民兵袭击。第二天，敌人正开饭，民兵又来打。敌人追，他们就跑。敌人回村内，他们就跟着，抽冷子打几枪，打伤鬼子一两个。横竖山区地形复杂，熟悉地形的人跑着跑着就没影了。不熟悉地形的人，顺着山沟走半天，走到头是个死胡同，还得返回来重走。就这样，恼怒的鬼子非要消灭南涧村的民兵不行，南涧村的民兵也死死缠住鬼子不放，战斗打了 6 天 7 夜，民兵们硬是用山药、胡萝卜、玉米秸充饥坚持战斗。

多少次反“扫荡”、反“合围”中，被敌人冲散的干部、战士，都是在群众掩护下突出重围、转危为安的。“四·二九”大合围时，许多群众脱下自己的衣服，给被围住的素不相识的干部、战士换上，对付敌人。敌人每到一村，挨户搜捕，抓住干部、战士，就残暴地屠杀。许多老大爷、老大娘，面对敌人刺刀的威胁，认陌生的战士、工作人员作自己的儿子、女儿。有些年轻妇女，将怀中的婴儿交给陌生的战士和工作人员抱着，装着是夫妻。有个工作人员，被敌人包围在村里，一位老人拉他进家躲起来，他怕连累老人，正要走时被敌人捉住，敌人发现他手上没有老茧，要带走他。这时，老人的儿媳说：“俺家兄弟，常年在外上学，手上哪会有老茧？”敌人将她痛打，坚持要把人带走。在这危险时刻，8 岁的小女儿跑过来，抱着工作人员喊“叔叔”，骗过了敌人。有的老大娘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换回干部。有的在一年多时间内先后有 4 个亲人被捕和牺牲，仍坚持作“堡垒户”。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伤员藏到地窖、柴禾堆里，他们或和子弟兵在同一阵地、同一战壕、共同瞄准敌人射击，或抬下伤员用心护养，或给战士们送吃送喝……每一次战斗的胜利，都流淌了人民群众的血和汗，都凝聚着军民的深情厚谊。

乡绅捐资为抗战

1937 年深秋的一天，前不久刚从日寇铁蹄下解放的小城洈源张灯结彩，人声鼎沸，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八路军独立 1 师师长杨成武在这一天出人意料地要在自己的师部召开一次乡绅座谈会。事先发了请柬，邀请全县各界乡绅参加。在当时生活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杨成武还特意嘱咐有关部门，准备几样菜和酒，要宴请这些乡绅们。

对于杨成武的举动，许多人不得其解，那些收到请柬的乡绅们就更是摸不着头脑了。在此战斗频繁，局势复杂时期，杨师长有多少军政大事要抓，为何有此“雅兴”，聚会众乡绅呢？原来，这是杨成武贯彻上级指示，创建抗日根据地，壮大部队的良策之一。

自 1937 年 10 月初，杨成武率领的独立团夜袭了洈源城，守城日军溃败而逃，该城遂告光复。随后，他们又成功地恢复了广灵、灵丘、蔚县、浑原、易县等县城，开始向平西、平绥路和平汉路北段挺进，在晋察冀边区的北部解放了一大片地区。到了 10 月底，杨成武的独立团已由刚成立时的 1700 多人发展到 7000 多人，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 1 师，下辖 3 个团，另外还组建了各地游击支队和县大队，伍一下扩大了好几倍。

此时已是深秋初冬的季节，山区已经开始漫天飞雪、寒风阵起。部队指

战员们还没有棉衣，赤脚上穿的还是草鞋。由于国民党部队和日本侵略军败退时已把此地的物资洗劫一空，给我们部队筹粮、筹款、筹被服等项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和过冬问题，杨成武立即派出了地方工作团，普遍深入各地宣传党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各县“抗日救国会”。接着，在晋察冀三省的结合部—一恒山地区地方党建立了特委，并分别建立了县委和区委，各县也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为了做好上层人士的发动工作，杨成武决定在这天开一个乡绅座谈会，把附近的乡绅都请到师部，向他们宣传抗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快到开会的时间，四里八乡的各位乡绅衣冠楚楚，客客气气地陆续来到了会场。由于对八路军还不了解，这些人的紧张、胆怯的心情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来。杨成武亲自站在门口，把一个个乡绅迎进大厅，上茶落座，寒喧交谈，气氛逐渐融洽了起来。在这群乡绅之中有一个人显得与众不同，引起了杨成武的注意。此人 50 岁左右，别的乡绅都戴皮帽，穿皮袄，而他只戴一顶旧毡帽，穿一件极普通的棉袄，毫不起眼，像个窘迫的小店主。 但奇怪的是此人一出现，几乎所有的乡绅都主动向他抱拳作揖，主动搭话。见此情景，杨成武暗向旁人一了解，方解其中之谜。原来，此人就是远近闻名的当地最大的财主王莆。

王莆祖辈很穷，母亲还要过饭。清末闹义和团时，他的父亲曾救过一个外国神甫的命。后来，这位神甫为报救命之恩给了他家不少银元，王莆就用这笔钱做买卖。虽然他没读过书，除了银元、纸币外，一个大字也不识，但十分健谈，做起买卖来，旁人都说他有三头六臂，出奇的精明和能干。由于他经营有道，很快就成了当地首富。过去在破庙容身，四季衣不遮体，靠要饭为生的他，现在的住房和城楼子一样，在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等地都有他开的店。由于他从小吃过苦，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有时甚至十分吝惜。他的母亲还经常翻出当年的讨饭篮子和打狗棍教育他。王莆此次应邀前来赴约，凭他如此精明之人，自有其打算。

杨成武待各位乡绅到齐之后，便请大家入席，席间频频举杯给大家敬酒，招待大家吃菜、用饭、拉家常，平易近人，和蔼随和，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和其它作战部队那种飞扬跋扈的劲头。待大家高高兴兴用过餐之后，杨成武才开始言归正传，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政策和主张，阐述当前的形势和抗战胜利的光明前景，讲明我军目前面临的困难，同时论述了八路军、根据地的存在对乡绅们的有利因素，历数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从民族大义出发，动员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知识出知识。杨成武讲完之后，会场寂静了一会儿，接着乡绅们便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表态，所讲大多是恭维奉承之辞，夸奖八路军作战英勇，抗日有功，纪律严明，纷纷表示拥护统一战线，但就是不说自己要捐多少米款，好些人还都拿眼睛望着坐在一旁沉默无语的王莆，那意思很清楚，大家都要看这首屈一指，精明过人的大财主如何行动。

杨成武看出了大家的心思，知道王莆是关键人物，他的态度决定着这些乡绅的行动。他不动声色笑着问王莆：“王莆先生有何考虑？”

一个乡绅急忙从旁边插话说：“谁人不知，王兄的银洋能从张家口铺到天津卫啊！”

另一个插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王兄家资雄厚，带头说个数吧！”

王莆刚才一言不发，始终坐在一旁捧着手中的水烟壶慢慢地吸，表面平静，其实内心早已波涛汹涌，激动难平。杨成武刚才一番语重心长抗日救国，团结抗战的道理句句说到了他的心坎上，通过几天来的亲身观察，他确信，八路军是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是一支为国为民的队伍，是一支最有希望的队伍，这支队伍目前暂时遇到了一些困难，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支持这样的队伍那还支持什么队伍呢？打定了主意，他连吸了几口烟，然后放下烟壶，缓缓站起身来，向杨成武欠了一下腰，然后不慌不忙地说道：“在下是小有家产，各位高邻也有目共睹，这是鄙人多年血汗积累，不必相瞒。而今国难当头，抗战是民族大义，在下手无缚鸡之力，不能效前方将士为国捐躯，难道还不能为国捐款吗？鄙人认捐——”他伸出了五个指头。

会场一下鸦雀无声，众乡绅的目光一下全都集中到王莆的手上，一位乡绅忍不住壮着胆子惊问道：“ 5 千？”这数对于吝惜的王莆来说已不算小数了。

王莆摆一摆头，环顾了大家一下，背着手高声说道：“暂时先捐 5 万元，若抗日政府认为不够，王某还可再作考虑。”

顿时，惊叹、议论声四起。人们没有想到平时生活俭仆、省吃俭用、吝惜出名的王莆这次却出人意料地慷慨解囊，那些想拿王莆当挡箭牌，看他笑话的人脸色都变了。王莆捐 5 万，他们该捐多少呢？

王莆接着又说：“奉劝诸位一句，国将不保，家何能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与其让家财落入敌手，为何不献于抗日？望诸位三思！”王莆言辞慷慨，滔滔不绝地表明了自己抗日救国的决心。语惊四座，情感众人。在他的带动下，其他乡绅也先后表态认捐。有的说“量力而行”，捐了 1000 元；有的说“鄙人当等而下之，不敢与王兄比肩”，捐了 800，很快就筹集到了一笔急需的钱款。

不久，王莆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并先后捐了 10 万元的钱粮，比全县财主所捐的总数还多。从他身上，使人感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力量。

就这样，在各方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之下，部队的过冬问题顺利地解决了，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据地也日益巩固。

缅甸华侨救护队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一声炮响，20 万缅甸华侨的抗日情绪沸腾起来了。在仰光华人区街口的两座中文报栏周围，每晚都是人山人海，群情激愤，水泄不通，常是深夜方散。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十分活跃。在缅甸华侨抗日救国筹赈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充分的酝酿筹划，缅甸华侨救护队于 1938 年 1 月在仰光成立，不少爱国华侨青年纷纷回国，奔赴抗日前线。

根据祖国抗日形势的要求，救护队进行了战地救护培训，历时 100 天，培训班开设简易生理解剖、初级医药等科目，重点是止血、包扎、固定、搬运这些战场救护技术，还讲授部分抢救化学战创伤等常识，课程安排非常紧张，队员部能扎实地掌握教学内容。因为是抗日救国救护队，所以除紧张训练学习外，也常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宣传，募捐和其它救亡活动，每天特别紧张劳累，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结业时，队员们个个像小老虎似的，能跑、能搬、能吃苦耐劳，为回国抗战奠定了基础。

救护队就要出发了，旅缅各界侨联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欢送会，印共总书记辛格光临致辞；筹赈会主席林克逊讲了话。大意是：一向来宾表示衷心谢意；二是白布救护队归国后隶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挥：三是救护队回国后全部医药，生活费用，仍由筹赈会供给；最后勉励全体队员奔赴抗日前线，救死扶伤，英勇战斗，为祖国立功，为 20 万旅缅侨胞争光。队员代表也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表示要在战场上立功，以答谢海外父老兄弟的无限关怀。会后，举行了盛大宴会，各地侨领也不远千里赶来饯行，以壮声威。许多救护队员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如此隆重热烈的场面。旅缅侨胞的深情厚意，永远是救护队员们献身祖国的巨大动力。

侨领王相尧先生，他和廖仲恺先生是孙中山建立的同盟会里的至交密友，他特地给廖承志介绍，请予关照回国参战的救护队。

1938 年 8 月 15 日，仰光市夜雨晨晴，天气格外爽朗，救护队在锣鼓齐鸣，鞭炮震天，掌声如雨中出发了。各侨领、学校、社团、商会、同乡会等送行代表，排成熙攘浩荡的长蛇阵，延续到轮船码头，汽笛长鸣了，岸边、船上的人们，彼此频频挥手，惜别之情依依。这热烈的气氛，这深厚的情谊，给队员们增添了反击强敌保卫祖国的无穷力量和勇气。再见吧，亲人们，华侨青年，决不辜负你们的殷切期望。在沿途中，又受到了各地侨胞的热烈欢迎。各处的炎黄子孙把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气势磅薄，使队员们再次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但到了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英国总督借口社会治安问题，不准当地侨胞举行欢迎会，也不允许救护队整队集体登岸，受人统治，任人摆布，愤怒之甚。到了香港，这里的情景与英属殖民地新加坡迥然不同了，刚抛锚停泊，欢迎的代表就拥上甲板，队员们列队下船，码头上新闻记者竟相拍照，港九各界同胞夹道欢呼，队员们眼睛湿润了，深感这里毕竟不是异国他乡了，香港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这里的居民是同祖同宗的骨肉同胞。在中国红十字会香港办事处，见到了廖承志先生，他看了王相尧的信后说：“ 一定尽力而为 ”。

华侨救护队从缅甸出发时，就明确宣布其目的地是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然而，由于队长借口需要时间与国内联系和要在此地采办大量药材，迟迟不肯启程北上，直拖延至武汉失守，长沙大火，救护队仍滞留港九。队员们心急如焚，再也按捺不住了，纷纷要求立即启程共赴国难；否则，将队伍拉回缅甸算总帐去。队长无奈，才率队乘船赴广州。广州这座南方名城气氛紧张，满目凄凉，高楼大厦，多数被敌机炸成一片瓦砾。在全队人马和大批药品器材到达广州后，由于队长和广东省主席余汉谋的勾搭拉拢和乡土关系，加之队长原籍为广东台山人，地方观念极其浓厚，被高官厚禄所诱惑，竟然不顾中国红十字总会和缅甸筹赈会的决定，蓄意在穗盘桓，旷日持久，以达到留粤不走的企图，失掉了全部药品器材公私财物和为国效力的时间，队长的所作所为，大失众望。面对武汉失守，广东沦陷，和难民们一起逃走到香港的队员们悲愤交加，纷纷要求给路费、发护照，或就地解散各奔东西，或集体重返缅甸。队长无言答对，只劝静候待命。全队处在混乱、焦虑、愤怒中；队员们商定，应去红十字会驻港办事处反映一下情况，问问该怎么办？

中国红十字会香港办事处设在东亚银行四楼上，接待队员们的是伍连德先生，他耐心听完队员们倾诉这段坎坷的经历后，深表同情，备加安慰，并且说：“ 上午已将队长找来了，告诉他广东惠阳前线我方与日寇激战，伤员

甚多，中共香港办事处提出派人紧急救援。可是队长却说什么目前全队思想混乱，药品器材又全部抛弃了，实在难以开往前线。”队员们听后，觉得同胞们在沙场上流血牺牲，自己怎能在后方逍遥自在呢？要求立即奔赴前线。听到此消息的队员都愿意参加，于是过海乘车赶往深圳。没想到队长带着药品器材也随后赶到了。

在深圳，曾生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救护队，他简要介绍前线的战斗情况，提出伤兵的救治和安置的具体要求，大家都异口同声郑重承诺了。

救护队按照原来组建的 3 个分队开展工作，第一分队沿着广九铁路北上，一昼夜在铁路两侧就发现百余名轻重伤员，轻者经包扎处理后指定方位自行转移，中等伤员急救后派人处理，尚有十几名重彩号则动员或雇请农民用棕床、门板、藤椅等抬到深圳大饭店——这里是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的第一个战地医院。按照医院的要求，救护队对 50 多名轻、重伤员精心治疗和护理，并负责照管他们饮食起居。全队各尽所能，分工合作，昼夜奋战，真是既紧张又有秩序，伤员们高兴极了。日寇的便衣侦察、汉奸到处探风问讯，加上海上若干艘汽艇的窥视，很快摸清深圳除伤病号外我方并无战斗部队，鬼子便兵分两路向深圳合击。我军获得情报后便通知立即转移。救护队连夜将全部伤员转移到山界前，由驻港办事处组织东华医院转运去香港继续治疗。完成伤病员疏散任务后，救护队也后撤过界河，在英界上水镇边一座空庙里，以草铺地和衣暂息。日寇入侵深圳后，奸淫烧杀，洗劫一空，经一周才撤走，救护队第一分队首先重返深圳。敌军的血腥罪行，惨不忍睹，令人发指。队员们用整天时间，忍饥忍渴，来往奔波，才将数十具腐烂尸体和许多死亡动物，——抬到野外掩埋处理，并对所有饮用水井进行检查消毒，有些队员因劳累过渡和被腐尸污染中毒而病倒了。

在深圳打扫战场之后，当天全体队员就由英界上水镇迁回深圳大饭店中。战斗过后，队员们回顾从第一次到香港，队长借故迟迟不肯动身，误了北上时机开始，继而滞留广州想升官发财，违背上级要救护队北上抗日指示，使公私财物丢弃一光，险些作俘虏，到江门后他又擅离职守，弃队回家，引来数人冒名塞进救护队等等。全体队员昼夜辩论，对队长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批评。大家对其人其事，倍感失望，导致全体闽籍队员由副队长带领去香港，救护队从此正式分裂了。后来副队长从红十字会香港办事处那里知道另一部分队员也从南头回来后，便领队友们来探望，彼此都介绍了办事处已批准救护队北上抗日救护伤员，大家乐得手舞足蹈起来，兴高采烈地在香港渡过 1939 年元旦。

1939 年 1 月 3 日，救护队从红十字会香港办事处领了北上的路费和介绍信，由香港乘船赴广东汕头市。在汕头一小客栈休息 3 天，便整装徒步北上了，走了一会休息时，看到从汕头方向开来 3 辆大汽车，是广东省卫生厅运医药品赴粤北韶关的，经恳切请求，押车人员同意队员们搭车。为防避敌机空袭，汽车夜行昼息，公路崎岖，颠簸难走，达五昼夜，才到韶关城，谢绝省卫生厅的热情挽留，到了车站，很不容易等到一列北上的闷罐车，队员们上了车，车里空空如也。1 月份的湖广，昼夜蒙蒙细雨，运行中的车上更是寒气逼人，这些来自热带的华侨青年既无棉衣又无被褥，沿途车站什么吃的也没有，冻得队员们相互缩成一团，尝到了饥寒交迫的苦头。车开得很慢，却逢站必停，本来只几小时的路，却行驶了两天两夜，到了衡阳，有三位体弱的队员，因冷饿时间过久，竟然站不住走不动了，同伴们连背带架地互相

帮助才出了站，进了一家饭馆，10 个人要了 10 个菜，狼吞虎咽，吃了个干干净净。就这样，队员们能赶上坐车的，就坐车，赶不上车时就步行，有饭就狼吃一顿，没饭就忍着饿着，克服一切困难向北前进。

1938 年秋长沙大火之后，红十字总会迁到祁阳远郊。救护队员们冒雨在湘桂公路上步行约 10 公里。抵达目的地时已是黄昏，机关都已下班了，好容易找到总会办公室，适遇总干事林克胜先生尚在屋。他是世界著名生理学家，美国檀香山的华侨。领队将香港办事处的介绍信面呈给他。据翻译说，他早收到香港的电报，了解救护队的概况。对救护队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接着叫总务部连夜送来了内衣、制服、大衣、棉被褥，拿热菜热饭招待大家，令队员们极为感动。第二天，又发给救护队每人全套红十字会服装和生活费 50 元，并通知待命休息，春节过后再分配工作。领队下午把廖承志同志的信交给林总干事，向他表明想到延安去的心愿，他让大家等待机会。

春节后，红十字总会办公室写信介绍救护队去祁阳 137 伤兵医院卫训班学习。

到 1940 年底，红十字会第 54 救护队，除 23 名队员外，都先后参加了八路军。

东江华侨服务团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侵略者到处烧杀抢掠，蹂躏着祖国的锦绣河山。在祖国存亡关头，侨居东南亚各地及欧美等地的海外华侨万分悲愤，纷纷成立各种救亡团体，出钱出力支援祖国抗战。1939 年 1 月在南洋惠侨救亡总会的领导下，成立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总部设在惠阳县淡水镇。

以爱国侨领黄伯才和广肇会馆主席张郁才为首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两才队”，在队长黄志强率领下，一行 11 人，于 1939 年 3 月 27 日乘丰平轮离开新加坡，打着：“领导民众”、“卫乡救国”、“抗战到底”的旗子率先回国，他们牺牲职业，离开家庭，毅然回乡服务的精神赢得了爱国华侨的极端敬佩。随后，吉隆坡爱国侨领官文森独资筹建了一个回国服务队。官文森先生是广东惠阳人，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老同盟会员，抗战爆发后积极支援祖国抗战，积极领导华侨开展救亡活动。他组织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任务是回国到东江进行为期半年的抗日救亡宣传慰问工作。文森队由 7 名女子组成，队长是王春红。此时吉隆坡侨胞也踊跃集资组成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结隆坡队。队员采取公开报名，经口试合格，发通知录取。原定队员 72 人，其用意是激励队员继承和发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精神，为祖国为民族战斗到最后一息。但一位姓郑的小伙子缠着救乡会负责人不放，大家被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样，在队长黄炜然的率领下，由 73 人组成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吉隆坡队回国参加抗战。先后回到祖国的还有加影队、双峨月队，以及巡罗队、安南队等等。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一到国境，曾先在曾生同志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坪山停留。在坪山，服务团的团员们如同到了家一样，同志们友好的款待，亲切的交谈，热情的帮助，使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兄弟之情，同志之爱，眼前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个个都充满了新鲜感，异常兴奋。大部分华侨青年都争先报名参加游击队，投入抗日

战争的武装行列，拿起枪杆上战场。其余的都由服务团分配工作。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成立一年多，足迹踏遍了所有惠阳地区。分布在东江各县的团员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组成五六人的小分队，深入到各个城镇和村庄，积极开展赈济难民，宣传抗日救亡工作。由于日、伪、顽互相勾结，烧、杀、抢、抓，加上日寇野蛮的三光政策，一片恐怖，抗日武装力量还不强大，群众对服务团认识不足，初期的工作阻力很大，生活也十分艰苦。为避开敌人的骚忧、搜索，团员们经常饿着肚子夜行日宿，睡在山里，稻田茅草里。在敌人占领过的淡水、惠州、博罗等地，人民惨遭敌人的烧、杀、抢、掠、奸淫的苦难，被日寇炸成一片瓦砾的废墟，惨况令人目不忍睹。此情此景，更加深了归国华侨们对敌人的仇恨。他们带着华侨募捐来的药品棉被和大米赈济那些无衣缺食的难胞，给病人分发药品，治疗疾病。帮助同胞干农活做家务，创办民众夜校，教农民群众读书识字，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在接敌区和沦陷区，团员们深入群众进行慰问，发放救济物资，免费为伤病难胞治病，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那时候，老百姓普遍患疟疾，找不到医生，买不到药，团员们用从印尼运回来的一批金鸡纳霜给群众治疗疟疾，药到病除。广大群众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关怀非常感激，称赞他们离开家庭漂洋过海回国抗战真不简单，对华侨青年更加热爱。有的农民青年在服务团团员的教育下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行动，是感动群众、鼓舞群众、教育群众的一股巨大力量。日本侵略军从大亚湾登陆的时候，国民党守军不敢抵抗，不到一个星期，广东就沦入敌手，广东人民有目共睹，对国民党丧失信心。此时此刻，亟需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鼓舞群众的斗志。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东江各县，深入城镇和乡村，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演话剧，出壁报，写标语，印发宣传品等活动，控诉敌人的罪行，在有工作队的村庄，举办农民夜校、识字班、战时小学等进行时事宣传，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青年团结起来，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华侨青年开展的宣传工作，效果很好，对群众教育特别深刻。各地父老兄弟姊妹听了宣传，无不感动地说：服务团的华侨青年确实是爱国。在这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的日子，他们放弃舒适的生活，离别亲人，千里迢迢，回来抗日救国，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深入宣传教育的基础上，服务团的活动进一步开展。他们采用各种形式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如组织农民抗敌同志会，青年抗敌同志会，抗敌儿童团，抗日先锋队，抗日妇女会，姐妹会、兄弟会；成立各村护路队、打猎队、联防队、抗日自卫队、抗日随军杀敌队、锄奸队等武装组织，在抗日前线的增城、博罗地区，深入敌人据点和日本鬼子拼杀。惠阳坑梓、坝岗等乡的抗日自卫队勇敢地打退了下乡骚扰的敌人，并烧毁公路桥梁，阻止了敌人的行动。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经常要送款、送物回部队，而且数目不少，为了安全总是向群众借枪夜间行动护送。借了还，还了又借。天长日久，服务团觉得只有自己有了武装，活动才能白如。就是到各村活动，也有建立武装的必要。于是服务团开始有计划地发展人员，筹备枪支，组织武装队伍。不久，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队伍发展起来。有一次，日寇 100 多人从南头出发，沿宝大线向太平开进。服务团得知后立即部署队伍：一在沙头、上沙与上角的山上伏击；二在北栅矮坡伏击。结果杀伤敌人多名，击毙一名指挥官，取

得小胜。这一仗，使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武装队伍在群众中有了一定影响。伪军麦浩部与日寇同驻太平镇据点，仗着日寇势力，常到各村勒索村民。为了保护群众利益，服务团与麦浩部经常发生战斗。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成立初期，国民党顽固派妄图用软的手段把他们拉过去。借口说他们是华侨，都是 20 岁左右的青年，年幼无知，不了解祖国的国情，容易为共产党宣传所蒙骗，要他们集中起来接受国民党的训练，妄想通过集训，向服务团团员灌输反动思想，拉拢参加国民党。他们的阴谋破产后，一反常态地对服务团实行种种限制和迫害，抗战以来全国性的反共逆流向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袭来。服务团为了应付国民党迫害的突然到来，缩编了队伍，把各县的“团”改为“队”，人员由 400 多人减到 150 人，把一部分团队转移到其它工作岗位去。国民党顽固派对服务团的迫害逐渐猖狂，他们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拘留逮捕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员。1939 年冬，惠阳县长非法拘留在梁化乡工作的 5 名服务团队员。1940 年初，博罗县长以“勾结土匪，密谋暴动”的罪名，非法逮捕了博罗队队长李翼和队员共 23 人。在横沥墟，国民党区署向服务团公开说：上峰有令，不许其再进行活动了。时局恶化，事态严重，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被迫停止工作。两才队和吉隆坡队奉命返回惠州，驻守团部，坚持斗争。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把国民党顽固派在东江发动反共高潮、枪口对准服务团的情况报告给南洋惠侨救亡总会。总会闻讯，非常震惊，立即电促当局释放被捕人员，申明华侨应有抗日救国的自由。不久，以惠侨救乡会名义和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名义发表了告同胞书，责问东江当局的香翰屏、池中宽等人，为什么抓博罗队的人，为什么停止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活动。并要求无条件释放全体博罗队队员。更有甚者，国民党顽固派竟于 1940 年 5 月间以服务团“良莠不齐，分子复杂”，蛮横无理地封闭服务团团部，还恶毒地挑拨离间，说服务团帐目不公开，人员有真华侨也有假华侨，企图分化服务团队伍，妄图将服务团置于死地。但是广大团员，在暴力面前不低头，坚持“卫乡救国，抗战到底”的初衷。仍然继续活跃在东江前线，更深入地开展救亡运动。服务团员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诬谄挑拨驳斥道：国难当头，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应担负救国重任。我们华侨出钱出力，组成抗日救亡团体回国工作，经济上向华侨负责，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凡是参加我团的人，即与我们组成一个整体，没有什么真假之分。头可断，血可流，不达最后目的誓不休。服务团绝大部分团员以及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团员，经受了严酷斗争的考验，革命意志更坚强，抗日热情更高涨。继续发动群众，武装保卫家乡，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日子里，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许多华侨青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建立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和扩大人民抗日武装作出了贡献。他们在武卫队里深入敌后；在武装部队里身先士卒，视死如归，勇敢顽强；在民运队里深入发动群众和民众打成一片，亲如家人；在和敌、伪、顽的斗争中英勇、机智，顽强不屈。他们在革命斗争的洪炉中锻炼成长，大部分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之中有的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牺牲时，都还是 20 岁左右的青年。英雄的鲜血洒遍了东江，染红了祖国的河山。他们高尚的品质，将永远激励着广大华侨和我国人民。

20 万军民大起义

中华民族是不屈的民族，中国人民是英勇的人民。

面对侵略的残酷，他们拿起刀枪，武装自己，以死相拼。

1938 年 7 月的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组织的一次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伟大壮举。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兵学商 20 万人，声势浩大，发展迅猛，在短短两个多月内，东起抚宁，西到平谷、顺义、三河，北起雾灵山、都山，南至渤海之滨，在 20 个县的广大地区，组成 10 余万人的抗日武装，攻占了蓟县、平谷、宝坻、卢龙、迁安、乐亭等县城。这一起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冀东的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为日后开辟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冀东物华天宝，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北依长城，南临渤海，西通京津，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物产可资军需，而且山深林密，可供部队迂回，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理想战场。

共产党员李运昌受党组织派遣，于 1937 年 10 月来到冀东，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路任军事部长，王大中任宣传部长。11 月，在北宁路南，又调整了京东特委领导成员，由胡锡奎任书记，卞振东任组织部长。特委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向各县委、支部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有关在冀东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要求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冀东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有利条件，继续肃清“左”的错误影响；吸引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起义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1938 年 5 月，为了加强八路军挺进冀东的力量，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将在雁北地区活动的第 120 师宋时轮支队调到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组成八路军第 4 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部队随即进行东进计划。

在此期间，河北省委为了取得晋察冀军区的领导和八路军部队的配合，曾前后两次派李楚离去阜平和平西，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汇报了冀东起义的准备情况，并与邓华等人商定了八路军的东进计划和冀东起义的有关事项。

八路军第 4 纵队经过短期整训，于 1938 年 6 月 4 日向冀东地区挺进。

邓华政委率第 31、33 两个大队走北路，沿途与康庄、延庆、永宁、四海等据点之敌作战多次，缴获甚多。6 月 9 日在怀柔沙峪与坂垣师团从怀柔县城增援四海之敌相遇，激战 3 个小时，歼敌 100 余人。

宋时轮司令员率 34、36 两个大队和独立营、骑兵大队走南路。34 大队和独立营于 6 月 3 日出居庸关，4 日攻克昌平县城。接着，东渡潮白河，横扫密云、兴隆两县的敌伪据点，于 6 月下旬进到平谷县以东的靠山集、将军关一带。

第 4 纵队挺进冀热辽长城内，人民大众欢欣鼓舞，伪军、伪政权纷纷瓦解。对此，日军惊恐万状，惊呼：延安触角伸进热河，已使行政权无法行使！

敌人匆忙调集日伪军和民团对第 4 纵队进行堵击和围攻。

7 月初，中央电示第 4 纵队，要他们迅速向迁安、遵化、卢龙等县挺进，冲破敌人的包围圈，同抗日联军会合。

从 1937 年 8 月起，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河北省委、晋察冀军区筹划和领导下，经过近 1 年的多方准备，冀东起义条件已臻成熟。中共河北省委为了加强对起义的统一领导，于 1938 年 5 月，将京东特委合并到冀热边特委，由胡锡奎任特委书记，李运昌负责军事工作。

冀热边特委决定，于 7 月 16 日举行武装起义。

八路军第 4 纵队的快速东进，引起华北敌伪恐慌不安，紧急调动冀东各县民团 5000 人，赶到长城一线阻截。6 月 20 日，被调往蓟县马伸桥镇集中的蓟县民团 300 余人，得知敌伪要下手缴他们的械，队长夏德元、赵合当即率部打死警察分局局长王树森后宣布起义。26 日，中共地下党员徐志、王维新、田心听到各处起义的消息，也在丰润县四户村起义。这时，我党又从在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内部工作的朱欣陶处得到情报：冀东行将起义的消息已经暴露，敌人准备全力镇压；为防止人民武装起义，日军即将收缴散在冀东民间的 20 多万支枪。

形势紧迫，情况危急，起义不得不提前举行。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武装起义，像燎原烈火，在冀东大地迅猛燃烧起来。

在昌（黎）滦（县）乐（亭）地区；7 月 6 日，由李润民、高培之、赵玉清、张鹤鸣、张振宇等领导在滦县港北村首先发动起义。到 8 月底，共产党在昌、滦、乐地区组织抗日联军约 1.5 万人。

在丰（润）滦（县）迁（安）遵（化）地区；7 月 7 日，驻迁安县西庄村的冀热边特委和抗联第 2 路军司令部，直接领导了岩口起义，由苏林彦等人集合了西庄、铁厂、王官营、新集等地 400 多名基本队员，编为抗联第 4 总队，辖 3 个大队。截至 8 月中旬，共产党在丰润县、滦县、迁安、遵化地区成立的抗联队伍约 2 万余人。

以蓟县为中心的冀东西部地区，7 月 14 日，正式拉开了起义的序幕。这天夜间，中共蓟县县委领导了邦均起义。第 3 区民团团副王建国（共产党领导的救国会骨干成员）带领 10 多名救国会员，攻克了邦均镇伪警察局。活捉伪警察 30 余人，缴获步枪 30 余支。正式成立蓟县第 3 区队，王建国为区队长，冀扶朽为政治主任。在我党直接领导下，冀东西部地区起义武装很快发展到 5000 人，前后在蓟县城东壕门、城西贾各庄、别山等地，与伪军作战 10 余次，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并配合八路军攻下蓟县县城。

在唐山开滦地区，7 月 16 日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部队策应开滦矿工起义，派出 5 个总队和一个大队约 1 万余人，破坏北宁路，占领了洼里、古冶两车站，把唐山至昌黎间 100 多公里铁路截成数段，使北宁路停车半月之久。赵各庄、唐庄子、林西等地的矿工，在周文杉、节振国等领导下先后起义，有 7000 多人参加，编成 4 个总队和一个特务大队。

在起义期间，群英并起，传奇颇多。卢龙县简易师范学校校长高敬之，一向为人耿直，急公好义，在群众中颇有威望。7 月中旬，他听说滦县抗联第 5 总队成立的消息后，便在家乡沈官营组织几百名农民起义，并带着部队攻打卢龙县城。他站在关闭的城门外面，大骂伪县长，历数县长和日军的罪行，指出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投降抗日联军。在他的政治攻势下，促使伪军打开了城门。进驻卢龙县城后，许多人纷纷参军，很快发展到 2000 多人，被编为抗联第 23 总队，高敬之任总队长，高在起义后期加入共产党。

洪麟阁、高志远等人也相继发动起义。成立了第 6、7、8、12、13、16、20、23 等总队，发展到 l 万余人。

整个冀东武装起义，从 7 月 6 日港北起义开始，经过 1 个多月的暴风骤雨般声势浩大的起义斗争，首先在滦县、昌黎、乐亭、迁安、遵化、丰润、玉田、蓟县、平谷、三河地区和开滦煤矿为中心的广大山地和平原发展起来，并推动了周围卢龙、抚宁、密云、顺义、香河、宝坻、宁河、武清、兴隆、

青龙等县的抗日武装起义，共计 22 个县参加起义，仅抗联系统就组建了有 7 万多人的全副武装的 39 个总队。此外，由地主、旧军人拼凑起来的“ 忠义救国军 ” 1 万多人；流氓、土匪也打起抗日旗号拉起队伍，约几千人；各地闻风而起没有名义的起义队伍 1 万多人。

8 月 2 日，中共中央与中共北方局致电中共冀热边特委并转抗日联军。电文指出：“ 中共中央与中共北方局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会合，并向在起义中前线死难的烈士及其家属致以崇高的敬礼。 ”“ 我们相信这支在抗战中壮大起来的生力军，定能在冀东各党派领袖合作与正确领导下，继续胜利，创造冀热边特新的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给日寇野蛮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 望你们继续团结，集中注意力，打破敌人对你们的进攻，扩大巩固部队，组织民众，建立冀热边抗日政权，肃清汉奸，扩大巩固你们的胜利，为驱逐日寇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

这一电报，既肯定了起义胜利的意义，又明确了“ 抗联 ” 的奋斗目标，给冀东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

8 月中旬，八路军第 4 纵队指挥机关一部由邓华率领与冀东起义队伍会师于遵化县铁厂镇。随即由 4 纵队党委和冀热边特委以及第 4 纵队各大队和抗联各路的主要负责干部在铁厂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邓华主持，对冀东大起义后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决定建立根据地，成立冀察热宁军区，由宋时轮任军区司令员，邓华、李运昌、洪麟阁、高志远任副司令员，下设 5 个军分区，并确定了各分区的领导干部。会议还决定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县的政权工作，负责统一筹粮筹款，保证部队供给，建立抗日秩序，训练抗日干部，组织抗日救国会等。

9 月中旬，大家正在分头贯彻铁厂镇会议精神时，接到宋时轮关于到都山建设根据地的命令，要李运昌率抗联第 2 路部队向都山进军。

李运昌率 2 万余人进驻迁安县包各庄一带，准备出冷口进都山，适有伪满军 1 个营进入我军驻地，激战数小时，将该敌全部歼灭，生俘敌营长朱宝兴等 200 多人，缴获迫击炮 2 门、轻重机枪 4 挺、步枪 200 多支。战斗结束后，忽又接通知，停止进军都山，令部队撤回原地。此时，第 4 纵队领导侦悉敌人秋季要大举“ 扫荡 ” 冀东。他们对此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因此，为了避敌锋芒，决定把主力和起义队伍拉到平西整训。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以及晋察冀军区多次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于 9 月下旬，第 4 纵队一部主力和蓟县抗联部队开始向西转移。10 月上旬，第 4 纵队在丰润县的九间房村召开会议，决定留下陈群（副大队长）、包森（总支书记）、单德贵（营长）各有 200 人的 3 个游击支队坚持冀东抗战。抗联部队和地方干部约 5 万人，经遵化、蓟县、平谷、密云山地，一字长蛇阵，向平西进发。

刚成立不久的起义队伍，就远离家乡，沿途又遭敌围追堵截，部队伤亡很大，离队现象也严重发生了。高志远部约 1 万人在八路军掩护下走在前面，过潮白河后，连遭日军阻击，成批成批地散去，只剩下 1000 余人进到平西。洪麟阁、陈宇寰共 1 万余人走在中间，行进到蓟县马伸桥一带，遭到敌人阻击，洪、陈两人不幸牺牲，部队大部溃散。李运昌带领的 2 万余人走在后面，在密云县水峪、瓦罐头村遭敌阻击，打了 1 天恶仗，伤亡很大，打又打不赢，前进又被阻，人心涣散，逃亡严重。

大家看到继续西进十分危险，于是在平谷县樊各庄由李运昌主持召开了

干部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返回丰、滦、迁、遵原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会后，李运昌等人带领成建制的部队 6000 多人回到滦县的杨柳庄一带。此时，日军已从武汉小林部队调来 1 个旅团，对我军进行大“扫荡”。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部队，又在滦县北部东西安河、后良庄、偏山一带，连日苦战，牺牲很大，最后只好分散活动。总计这次抗联武装 5 万人，随第 4 纵队向西撤退，除 2000 余人达平西外，保留在冀东的就只剩下 1000 余人。

11 月 25 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再次来电，命令李运昌等人一定要坚持冀东游击战争，指出：“这块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但也有许多困难，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达到。”这些指示，坚定了起义队伍的信心，很快便集合了 1400 多人，重新建立了部队，与第 4 纵队留下的 3 个支队配合，开展高度分散的游击活动。

1939 年 2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肖克为司令员的冀察热挺进军。肖克明确提出巩固平西、开展平北、坚持冀东三位一体的任务，统一了冀东部队的指挥，加强了坚持与开展冀东游击战争的决心和信心。到 1945 年秋日本投降时，冀热辽已建成有 25 个联合县，5 万党员、约 3 万军队、20 万民兵、560 万人口，包括冀东全境、热河大部和辽西的大块解放区，这就为以后收复热河，解放东北准备了突击力量和前进基地。

冀东大起义，在不到两个月内，就发动了 20 万人参加，组织起拥有全副武装的 10 万多人的起义军，而且打了许多胜仗，并很快建立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指挥机构，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在 1938 年 11 月 25 日的一封电报中所说：“宋、邓支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和促成了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主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

冀东暴动胜利以后，确实又受到了严重挫折。毛泽东在当年的电报中也讲到：“……没有尽可能保持和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和群众，没有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至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均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水乳交融军民情

冀东地区，物产丰富，是华北通往伪满洲国的咽喉要道，平津的门户，占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所以日军极为重视。自 1935 年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来，他们就施行所谓户口调查等一套办法，限制、打击抗日活动，搜查抓捕共产党员，统治得极为严密。七七事变后，这个地区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由经济上的反抗剥削压迫，转为抗日武装斗争。工人和农民都在酝酿罢工、武装暴动，并且有一部分党领导下的武装已与都山、青龙等地区抗日义勇军取得了联系，这都为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开创根据地打下了基础。1938 年 6 月初，根据上级指示，研究了冀东情况后，决定以 5 个团的兵力组成邓（华）宋（时轮）支队，支援开滦五矿工人的政治性罢工和武装斗争。邓、宋支队组成后，李钟奇同志任参谋长。对这次任务，从领导干部到每个战士，都认为是最大的光荣。当时，一方面部队调动要送还借用的家俱，打扫房屋，拾掇院落，向老乡道歉致谢；一方面群众在非常艰苦的景况下，除了协助部队做好兵员补充工作外，还给部队杀猪、杀鸡、送军鞋、做军袜。

这样你送我还，人人喜悦，到处是一片欢乐和依依不舍之情，忙了 3 天，在群众、首长和战友的叮咛声、锣鼓喧闹声中大队出发了。

7 月初，部队快到延庆黄花坪附近，天气闷热，烈日当头，晒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四海镇是个不大的小镇甸。坂垣师团的一部分日军和伪军驻在这里，给我军设下了一道阻击线，经过半夜紧张的准备工作，拂晓前开始向敌固守的据点发起猛烈的攻击。不到两个钟头，100 多人全部被歼。战斗结束后，邓宋首先召集团以上干部研究了敌情，指出：从今天敌人顽抗据守的情况来看，他们是不会甘心这次失败的。敌人可能由顺义、怀柔方向来增援四海。我们必须迅速撤离这一地区。第二天拂晓时，侦察连派人回来报告说：“坂垣师团的一个中队的 100 多名日军，由怀柔出发去增援四海之敌，其先头已进至距沙峪镇以东 20 余里渤海所地区”。首长带领大家分析，虽然敌人是手下败将，但为了减少在东进路上的麻烦，决定给敌人一个下马威，部署了作战方案，首先跑步抢占了沙峪附近的有利地形，进入伏击地区隐蔽待敌。天气晴朗，太阳毒辣辣的晒得人冒油，没有一丝风，快 11 点钟的时候，敌人进入了伏击圈，随着两声枪响，一阵激战，日本兵死伤大半，剩下的像钻在风箱中的老鼠，乱窜乱跳，真是刀光血影。到了下午 2 点多，枪声稀少了，为了迅速消灭敌人，李参谋长跪起来看敌人的情况，刚把身子探出庄稼裸子，被趴在坑里的一个日本伤兵打了一枪，打中了参谋长身后的总支书记，从他头部穿过，又打中了参谋长的后背，都倒下了，总支书记当场牺牲，参谋长直到晚上才苏醒过来。同志们告诉他：“战斗已经结束，我们全歼了顽敌，现在部队决定继续前进，用担架把你抬走”。参谋长听了，很高兴，还没等说出话，就又晕了过去。为了能按时赶到开滦，支援工人罢工运动，主力部队先行了，留下一个警卫排掩护参谋长在后边慢行。

雾蒙蒙的夜里，担架随着老乡深一脚浅一脚的行走颠簸着，过河的时候怕水湿了担架，举到头顶，上举时，老乡终因太累，摔倒了，担架也翻了，参谋长“哎哟”一声，把老乡心痛的赶快问候，就在这时一个战士跑来说：“敌人的搜索部队已经上来了，请参谋长赶快转移，我们 4 个人在这里掩护。”警卫员一听，马上叫老乡抬起担架来就走。担架穿过荆棵，隐蔽在一个小山坡的背凹里。这时只听得远处一阵阵激烈的枪声，人喊马嘶。过了一会儿，山坡前的小路上有手电的亮光，警卫员和老乡趴在担架的旁边，隔着荆棵子看见两三个手电的光亮乱晃。敌人吆喝着：“都半夜了，咱们还上哪儿搜去？”“混蛋！你知道个屁！咱们要捉住这个挂花的大八路，别说半夜，搜到明天午夜也得搜！”这群敌人在一阵吆喝声中走过去了，又一帮敌人吆喝着过来了，这拨敌人比刚过去的那拨搜索得细致，越来越近了，剩下不到 100 米的距离了，大家已准备好了与敌人死拼。正在危急的时候，从东北方传来了枪声，原来是 33 团的肖团长来接应参谋长了，真是有惊无险啊。

担架抬着参谋长大约走了几十天，终于来到冀东。留下的同志告诉参谋长，五矿工人暴动的机密被泄露了，已经提前 5 天于 5 月 10 日暴动了。主力已经转移，由于参谋长的伤势太重，当时部队的医疗条件差，地方党委决定通过内线关系，送参谋长到林西矿医院孙大夫家里医治。

孙大夫是林西矿医院的名医。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对抗日救国很积极，是党的同情者，交通员把参谋长送到他家后，他夫妇俩照顾得非常周到。按照组织上规定的关系，参谋长假称小学教员，是他们的表弟，不小心被流弹所伤。孙大夫很热情，但话不多，可是每说一句都有份量，他连夜给参谋长

做手术，做完手术，他擦着汗说：“李同志，你放心吧！朋友把你介绍到我家里来，这是对我的信任。我虽然不是武人，但我也有一颗中国人的良心。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的伤早早治好的！”听着这朴实的话语，参谋长非常感动，也放心地在此养伤了。在这样的医疗护理条件下，参谋长的伤势好转了，体力也迅速恢复了。

孙大夫是个非常谨慎的人，特别是在这白色恐怖时代，从参谋长到他家养伤以后，他比往常更是早上班，晚下班，不让外人看出一点可疑的形迹。给参谋长作手术、换药，多是在半夜。唉！这可真是辛苦他们了。每次换药，孙大夫看完伤口后，总是说：“李同志呀！我治病时疼不疼呀？你可真是条铁汉子呀，我换药时看你连眉头都不皱一皱。好了，快好了，再有两三个星期就好……”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加上参谋长年轻力壮，伤口也就愈合得快了。

日子过得很快，一晃七八天过去了。一天傍晚，孙大夫和他爱人进来要给参谋长换药。突然听到大门口有人吆喝了一声：“有人吗？出来！”孙大夫马上出去了，就听有人问孙大夫：“你们家几口人？”“夫妻俩，还有一个亲戚。”“我们是查户口的。”说着，人就往屋里走来，孙太太忙迎了出去，一掀门帘，那人正好看见参谋长，“他是谁？”“我表弟。”孙太太说。“你表弟来干什么的？”“来这看看病。”孙大夫就把那套编好的假话，说了一遍。这家伙问了半天没问出什么漏洞，就自己没趣的走了。孙大夫夫妇俩送走那家伙后，赶快过来安慰参谋长，让参谋长放心，没什么可怕的，查不出什么的……　　。夫妇俩为了让参谋长养好伤，整天操劳，担惊受怕的，遇到事了，没有一点的退缩，反而劝参谋长不要有思想负担，真是让参谋长感动，内心不安，也深深感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人的深情厚意，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

从这次查户口后，不到五六天，就又来查一次，还特别盘问了参谋长一遍，看来，敌人是注意上参谋长了。怎么办呢？本来离开部队已经半个多月了，参谋长就有些着急，想念部队和同志们，这一来，情绪就更加不稳定了，上次查户口的人来过以后，就想给孙大夫说说返回部队，但每次见到他们夫妇那么热情，打针换药、端水端饭，就使参谋长不忍心说出这话来让他们不安。可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坏了。又过几天，天已黑了，孙大夫才回来，精神显得紧张，特别的疲惫，往常他回来后，总是先到参谋长住的屋来看看，说会儿话，然后才去吃饭。可今天他回来后，看着参谋长，心事重重的，老觉着有啥话要说，问他，他又说没什么，在屋里来回的走，坐都坐不住，催他去吃饭，又说等会，不着急，只是在屋里踱来踱去。一看孙大夫惴惴不安的样子，参谋长心中就猜出了七八分，就问：“孙大夫，您对我这么好，要是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就不应该有什么事瞒我，什么话、什么事都应该告诉我，你今天这么心神不宁的，无论有什么事，应该说出来，大家商量着办”。孙大夫见参谋长这么诚恳，叹了一声说；“小李，不要紧，等你病好了以后，再告诉你。”参谋长说：“孙大夫，我感觉着我的伤已经好了，我想回去……　　”孙大夫见参谋长提出来要走了，这才把日本宪兵队传讯他的事告诉了参谋长。原来敌人早就怀疑了，来查问过两次，都因为孙大夫是名医，为人处事一向忠厚谨慎，敌人没有贸然行动。今天宪兵队传讯他时，虽然没有用刑，但也是气势汹汹。孙大夫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作为中国人，他也是拥护抗日，仇恨侵略者的，但在敌占区又没有办法，想让参谋长彻底

在他家养好伤，又怕敌人突然下毒手，心中十分矛盾。参谋长安慰了一会儿孙大夫，又分析了眼前的情况，既然如此，后天也刚好是“交通”来的日子，伤也基本上好了，不如趁早离开。孙大夫夫妇同意了参谋长的意见。

临走那一天，孙大夫夫妇给参谋长带了许多东西，有一部分备用的药品，还有些吃的用的等，千叮咛，万嘱咐的，把参谋长送到门口，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趁着天色昏黄，参谋长回到了部队，每当闲暇时他摸到伤疤，他就会怀念孙大夫夫妇，感受到我军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鱼水深情。

女党员黑夜送信

1939 年年初，新四军的队伍不断挺进苏北。部队由丹阳过江，解放了江中的绿岛扬中；旋即挥兵北渡，挺进到苏北江都的大桥地区。这些队伍，后来就编为由管文蔚、叶飞、张藩、姬鹏飞等同志率领的“挺进纵队”。当时，苏北已经沦陷很久了，有 17 座重要县城被敌人占领。古来负有盛名的扬州，炮毁枪伤，废墟荒草间设置着敌人的兵营马厩。国民党虽拥有大军十几万，但远避日军，退缩到高宝湖以东；韩德勤带着江苏省政府、89 军驻在水城兴化；李明扬、李长江的“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驻在泰州；还有张星炳、陈泰远各部割地分驻，充塞四乡。他们一听到日军的炮声就像脱兔奔逃。人民受尽了敌伪和“国军”的蹂躏，日夜盼望着真正抗日的人民军队开来。冬季过去，1940 年的春天到来了。这时，抗日局势起了重大变化，正面战场上，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的进攻，采取了诱降政策；在南京，汪精卫成立了伪政府，大叫“蒋汪合作”、“和平反共”；而蒋介石的真面目也日益暴露了，他们对外主张什么“曲线救国”，对内却偷偷地发下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主要力量对付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是抗战沉寂，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反共的逆流。挺纵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紧张的局势在急速发展着，挺纵坚决给予猖狂的日军以迎头痛击，仇恨、愤怒激奋着部队，在吴家桥，在七里长庄，连续歼灭了日伪军 100 多名。但困难的处境仍然没有改变，由于吴家桥地区狭小，东西不过 30 里，南北不过 20 余里，兵力周转有许多不便。此时部队是被深深地包围在一个小小圈子之中：南面不远就是长江，有日军严密封锁；北面靠着邗江，有二李重兵把守；西面仙女庙是日军的集结点；东面泰州是二李指挥部所在地。处此险境，挺纵不得不转移了。经过周密的研究，挺纵决定继续北上，渡过邗江，然后东进，到泰州以东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这样，1940 年 5 月 17 日，挺进纵队遂转移邗江之北，进驻郭村。

郭村，是一个有近万居民的小镇，是敌、顽的空隙地带。这里有党的地下组织，群众基础较好，加以挺纵在南面打鬼子的英雄事迹不断传扬过来，群众早已仰慕新四军了。因而部队来到，全镇男女老少打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旗帜出镇相迎，欢呼“拥护新四军”、“欢迎抗日队伍”之声不绝。但是，继续东进的道路却堵住了，韩德勤和李长江得知挺纵进驻郭村消息后大为高兴，以为挺纵投进了他们的口袋，便东面派了二李的第 4 纵队陈中柱部在刁家铺、口岸以及泰州一带拦阻；南面以颜秀五部于塘头、宜陵、丁沟分割挺纵与大桥地区和苏南新四军的联系；北面则早有顽军张星炳部盘踞。顽军洋洋得意，箭拔弩张，叫嚷要进攻郭村。李长江更是骄狂了，说郭村是他的地区，竟公然宣称要向挺纵“收复失地”，要挟挺纵受其指挥。这所谓“受其指挥”，实际上就是“并吞”和“收编”的意思。看来冲突是正面摆开了。

郭村的挺纵司令部，对当前情况作了研究，估计李长江有进攻郭村的可能，遂决定作可能打起来的战斗准备，但还未筑好工事。

泰州城，宣布戒严了。到处是岗哨林立，街上断绝了行人，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顽军，“卡卡”地从石板路上开过去，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顽军进攻郭村已经开始行动了，最反动的陈中柱、陈才福这两个纵队已向郭村逼近，正和其他顽军一起，打算四面包围，十路进攻。而郭村的挺纵司令部对这里的严峻形势还不清楚。军情十万火急，地下党的一个女同志连夜去郭村报信。

这位女党员名叫郑少仪，才 19 岁，是颜秀五纵队的政训员。她得悉敌情后，立即换上了旗袍，冒着极大的危险，赶去郭村。漆黑的水网平原上，稻田连着河道，所有大路、渡口都被顽军封锁了，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一旦被顽军发现抓去，那就什么都完了。郑少仪同志坚定地向前摸去，她鼓足了勇气，一会急走，一会悄悄地奔跑，逢河就游过去，浑身上下湿淋淋的，衣服上沾满了水草、污泥，费尽了气力，终于找到了郭村。郭村外围的大河太宽，她游不过去，沿河寻找，发现对岸有水声。她兴奋地呼喊，郭村的自卫队摇过一条船来接她了。郭村的哨兵，把她带到政治部，见到了彭德清同志，又到苏北特委见到韦一平同志，韦一平同志立即派人把她带到了纵队司令部。她向叶飞司令员和张藩参谋长详细地报告了泰州的情况和部署。叶司令员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感激地说：“同志，谢谢你，谢谢泰州城里的同志们！”

郑少仪同志冒险送来的情报，证明了我军原先的估计，再也不能对李长江寄于任何希望。部队立刻动员起来，摩拳擦掌，连夜抢修工事，郭村的人民也都沸腾起来了，他们彻夜不眠，青壮年就不用提了，连老大爷和青年妇女也自动前来协助部队修筑工事，抬土、伐木、送饭……黑夜里一片急促的脚步声，金属撞击声，土块砖石的搬运和堆积声……

翌日，拂晓的时候，枪声骤起，并越来越密集——李长江全力发起十路攻击，预有准备的挺纵随即展开了全面的抗击。

茅山和尚爱国心

几千个五台山的和尚在“你们出了家，还出不了国”这种生动的、鼓舞人心的、含有真理的动员口号下，武装起来参加了抗敌。这是华北电台对五台山和尚起来抗敌的武装行动作的迅速报道。

新四军依照学习五台山的经验，也去敲过茅山道士的大门。希望道士们能够像五台山的和尚一样，通过动员号召武装起来，加入新四军的抗战行列。茅山乾元观曾经是有名的“山中宰相”、中国道教以“宏景真人”称号的陶宏景隐居的地方，道士们对这位真人无比崇敬。新四军为使茅山的道士们武装起来抗敌，记住这段故事，并加以强调：“想当年你们陶真人在山中隐居还十分关心朝中的大事，如今国难当头，全国人民都奋起抗敌，难道你们不管抗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话当时对道士们来说并没有起什么作用。9 月份以后，敌人开始了疯狂的连续进攻“扫荡”。新四军一面采取迅速行动，深入敌后，与敌纠缠，并且不断出击，消灭敌人，一面派出服务团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发展农村党员，组织工、农、青、妇各种抗委会。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此同时还劝说道士们暂时速速离开，免遭残暴的日军枪杀。他们不但不相信，反而说：“日本人不会杀出家人的。”结果，

无恶不做的日军杀来，放火烧了乾元观，道士们也在日军的刺刀下惨遭杀戮，茅山道士们的悲剧，实在令人痛心。

1939 年 3 月 7 日，新四军 2 团政治处主任萧国生同志，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当地人民群众为萧国生同志的光荣殉国深表痛惜，先后举行群众大会表示追悼。一次在元庄有千余人参加追悼会，一次在薛庄有 700 余人参加。茅山道士惨遭杀戮的悲剧，令和尚们心寒肺裂，唤醒了出家人。残酷的事实告诉他们，只有武装起来加入人民的抗敌行列，才是出家人的唯一出路。在元庄的追悼会上，竟出现了和尚 20 余人，他们带着钟磬，穿着袈裟，提前一天赶到元庄来，日夜礼佛念经，超度英魂。在薛庄的追悼会上，还有一个和尚登台演讲，代表出家人表示：第一，他们决心做七日道场超度英魂，不要任何报酬；第二，他们要组织和尚抗敌协会，参加抗战工作；第三，他们要求新四军发给武器，组织伏击队，为烈士报仇。和尚精采的演讲，轰动了全场。到会的人们都称赞和尚热心爱国的精神，称赞新四军纪律好，为人民出生入死，作战勇敢顽强。

茅山和尚参加抗敌的爱国行动，召唤了有着“山中宰相”传统的茅山道士，不久，他们也参加到抗战的行列中来了。

教徒觉醒于战火

河北省青苑县有一个村庄，叫东闾村，村庄里有一个天主教堂，它周围高墙环绕，中间钟楼高耸，气势宏伟，庄严肃穆。东闾村天主教堂原有五、六个法国神甫，抗日战争爆发后，陆续回国，只剩下一个名叫李聂的中国神甫和教会会长杨振坤主持教会工作。东闾村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加入了天主教，成为虔诚的教徒，教会的势力扩展到方圆百里以外，每到耶稣的纪念日，四面八方的教徒，云集东闾，就像赶庙会一样热闹。

随着抗日运动的发展，我们党也深入到东闾村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组织。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调动各阶层人民抗日的积极性，我们党派人做李神甫的工作，以便团结发动天主教徒参加抗日斗争，经过接触，李神甫说他“谨奉罗马教廷驻中国代表蔡宁给各教区主教的指示，对中日战争，持中立态度，要一视同仁之爱德”。再次做他的工作，他竟说；“作为神甫，只能劝人信天主，才能赦免世人的罪恶，天主教第五戒就是不杀人，我怎能同意教徒去杀人呢”。多次工作均未有什么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村民迷信思想特浓重，我党在村里建立的武委会和青抗先组织，也只有少数几个教外群众和从外地来这里找活的长工参加，人数寥寥。广大教徒只是虔诚地祈祷，对抗日活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因此，这个村子里的抗日活动远远落后于其他地方。

但是，教会的一些上层人士并没有只是祈祷，而是广交地方顽固势力，干着破坏抗日的勾当。在东闾村一带，有一支 400 多人，300 多支枪的土匪武装，头子叫韩子犹。他自封为司令，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劫、绑架，奸淫妇女。教会的会长和他经常有来往，日本侵略者也对他非常恼火。1938 年 7 月，韩子犹驻进东闾村的消息被北大冉日军获悉，日军突然袭击东闾，韩子犹稍作抵抗，即逃走了。日本侵略者进村烧杀，教民们跑进教堂，紧闭大门，日军砸门，扬言不开门就要放火烧房。李神甫吓得浑身发抖，让人把门打开，日军端着刺刀把躲在这里的几百名教民赶到前院，逼着大家说出谁

是“八路”。突然，敌人从人群中拉出一个脸有些浮肿的教民，说他“良心大大的坏了”，拳打脚踢，又有刺刀顶着他的胸膛，让他承认自己是“八路”。李神甫苦苦哀求，敌人才放下这个教徒，回到庄上，杀死十几个教民后，离开东闾。被敌人烧杀后的东闾村庄上到处是燃烧的余烟，路边是死难者的尸体和血污。死者家属呼天嚎地，李神甫给死者做祷告，悲惨的情景，令人目不忍睹。一个血的现实使人们觉悟到一条真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不分贫富和信仰，都是他们杀掠的对象。一些教徒开始对教会的说教产生了怀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迅速增长起来了。

1940 年初，为了防止日军利用高层建筑阻止我党活动，边区政府号召各地拆除墙，破坏道路，拆除高房。东闾村天主教堂的钟楼高二三十米，如果被日军利用，可观察到三四里以外，对我游击队活动极为不利，因此，区委决定将其拆除。为了使教徒们明白拆除的意义，区长带同志们到东闾村找教徒做工作开会，可一提拆钟楼的事，教徒们开始喊叫：不拆，谁敢拆就和谁拼命！狂叫的声音像要震塌这座教堂，怎么说都不行，后来找神甫和会长谈判，双方争论十分激烈，最后也没有谈成。两次工作全部失败，引起了区委的怀疑，经过周密调查发现，原来韩子犹匪部被消灭后，天主教会会长杨振坤和保定特务机关及汪精卫伪县党部三家串通，利用宗教势力，暗中阻止教会中的进步势力参加抗日活动，和我党对抗。为了提高教徒们的觉悟，打击汉奸的气焰，区委在公安局的配合下，击毙了特务分子和伪党部成员，教育释放了杨会长和他的随从者。随后，由于形势紧迫，在区政府的组织下，从外村找人强行拆除了钟楼，但这一作法，也挫伤了一些教徒们的感情，为以后艰苦时期的斗争带来了不利的因素。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许是因为法国参加协约国的原因，在一次扫荡中，日军一把火烧了教堂，刹那间曾经繁荣了几十年的东闾天主教堂化为灰烬，李神甫痛哭流涕，杨会长目瞪口呆，广大教徒更加仇视日本侵略者。

日军为了变华北为其兵站基地，对根据地进行“吞食”，在张保公路沿线的一些村庄建立了碉堡，利用拆除教堂围墙的砖在东闾村修建了两座大炮楼，严密监视人民群众的行动，只要发现谁家和八路军有接触，就立即抓捕，施以酷刑，甚至杀头。有一次，区委的两个同志在村里住了一夜，被日军知道了，第二天就杀掉了房东全家。1942 年 5·1 大“扫荡”后，形势更加残酷，东闾村完全为敌人占据。我党的组织破坏了，党员转入地下活动，由于以前的拆钟楼事件，群众工作更不好开展，我们的人也进不去。面对这种状况，为了尽快在东闾村建立党组织，开展活动，我党通过关系了解了村里的基本情况，决定先争取天主教上层人士，并确定把教会副会长杨桂卿作为主要对象，开展工作。

杨桂卿是清苑县清凉城村人，有正义感，几年来日军残害中国同胞，毁灭宗教的无数事实，激发起他的爱国之心，只是在反动会长的控制下报国无门。党组织通过关系接杨桂卿到他岳父家，大家一见如故，谈得很交心，当场决定，派 1 个同志以扛长活的名义住进他家。杨家的长工大多是外地人，不信教，很快就明白了抗日的道理，愿为抗日出力，又联系东闾村的老党员，在东闾村党支部的配合下，开始了争取教徒参加抗日的活动。

由于教会的控制，教徒们对上帝、神甫和会长之类的神职人员，奉若神明，如果不揭开教会上层的黑暗，就不能使群众觉悟。大家首先摒弃过去拆钟楼事件的那种“左”的做法，坚决支持教会中的进步力量，打击反动分子，

把神甫和会长妹妹乱搞两性关系，和汉奸来往的真象揭露出来，用日军烧教堂、杀教徒等事实激发群众的民族意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群众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敌人的残酷，还是顾虑重重。为了解除群众的顾虑，决定对碉堡里的、群众最恨之入骨的、无恶不作的伪军丁排长进行教育。丁排长是这一带碉堡里最高的指挥官，他仗着日军的势力带着伪军偷教会的东西，驱散教友们集会，还向耶稣像开枪，令群众特别的痛恨。在对他教育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我党决定为民除害，在内线协助下，乘丁排长走出碉堡，辱骂卖桃老人时，我手枪队员当场将其击毙，造成了很大反响，群众拍手称快。说："八路军是神龙，显死不显尸，靠天主耶稣不保险，还是靠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摆脱苦难。"教徒们也开始纷纷加入党的活动了。杨桂柳副会长参加抗日活动更积极了，他的家成了我党在东闾村的联络点，他为我们的队伍捐赠粮食，变卖自己的田产，并亲自去保定、北大冉给部队采购药品。到1942年，他干脆停止了宗教活动，把全部力量投入到抗日工作上来，成为我们地下组织的重要骨干。他的行动，带动了广大教徒参加抗日，同时也引起日军的怨恨。在一个晚上，由汉奸带领，抓走了杨桂卿，严刑拷打，杨桂柳宁死不屈，惨遭日军杀害，但是，杨桂卿的不幸遇害彻底激发了东闾村群众的抗日热情。

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东闾村的抗日局面完全打开。村子两头虽有炮楼，但已形同虚设，大白天大家都可以在村里来往行走，敌人在炮楼上既不敢下来，也不敢开枪。广大教徒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感明显提高。他们冲破宗教的束缚，走上了抗日斗争的前线，许多人解下了胸前的十字架，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在东闾村，有30户群众为革命献出了亲人的生命。

黄桥烧饼慰劳忙

国民党反动派韩德勤得知新四军过了泰州防线东进的消息，勃然大怒，立即命令在黄桥的保安4旅何克谦部从黄桥及其以南的新镇市、毗庐市、虾蟆圩、广陵镇、季家市等处向北攻击，同时命令在运河沿线的陈泰运、林叙伊部，由黄桥北的曲塘镇南下北新街一带，实行两面夹攻，企图歼灭新四军于运动途中。但是这一行动，早在陈毅同志的预料之中。为争取主动，新四军于1939年7月28日挺进黄桥。苦于国民党反动派蹂躏的黄桥人民，真是拨开乌云见青天，在欢呼声中，他们把新四军迎进了黄桥镇及其周围地区。新四军指战员在大小市镇和乡村大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协助地方组织农抗会。7月29日在黄桥中学召开了千余人的代表大会，成立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第一纵队部队也在东燕庄等地协助当地人民成立了抗日区政府。这个地区从前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期间成立过红14军，留下了革命种子，因而一经发动，各种抗日组织就像雨后春笋似地很快成立起来了。而最有趣的是黄桥大寺院的和尚们，也被争取到团结抗日的旗帜下来，并且很快成立了"宗教界抗敌协会"。于是，黄桥一带纵横200余里的地方，出现了群众性的抗日新气象。

反动透顶、至死不悟的韩德勤，还是继续对我军制造"磨擦"战争。9月初，他又派了他的主力117师、保安1旅等部，协同税警总团由海安、曲塘等地出发，分三路向黄桥进攻。新四军闻讯后，即趁其在运动途中，把它歼灭。当顽军到达营溪时，一举歼灭了保安1旅2个团，毙俘千余人，117

师等部连忙缩回曲塘、海安去了。韩德勤继又命令保安 9 旅张少华部向新四军进攻，并在新四军驻地北边筑起碉堡，层层设防，隔断黄桥交通，禁止粮食、食盐等运进来，想以严密的经济封锁扼杀新四军，把新四军压缩到江边。张少华部是驻在姜堰的，为突破顽军封锁，于是新四军又不得不去解放姜堰了。

姜堰镇解放了，为了制止内战的继续发生，陈毅同志又数十次发电韩德勤，只要求“救国有分，抗战有地”，但韩德勤根本不加理睬。姜堰镇与曲塘、海安都是运河沿线的重镇，有名的粮食集散地，运河以南，黄桥一带粮食都是依靠这些市镇供应的。韩德勤认为新四军决不肯放弃姜堰，于是提出只要新四军退出姜堰，万事皆休，一切均可商议，否则无谈判之余地。以此为借口来向新四军发起进攻。陈毅同志早已洞察韩德勤这一阴谋，他胸有成竹，邀请各方代表和商民开会，慷慨陈词，声色俱厉地呼吁：“我军为达到苏北抗战合作的目的，愿意退出姜堰。只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人民，我军虽血涂四野，万死不辞，但求对方诚心履行诺言，不再逼人太甚，不逼我们退到黄河以北，不逼我们抗日无地到长江喝水的地步，我军还可容忍退让。现在我军既见逼于江南，又被胁于江北，竟不许中国的抗日人民军队在祖国土地上有抗战自由的权利，那是不行的，不能容忍的，即令我军可以牺牲，而中华民族的利益是不可牺牲的！如省韩必欲置我党我军于死地，只有出于自卫一途。即是说我军退到黄桥，决不再退！”

在退出姜堰之前，陈毅同志就提醒各个纵队的干部：不论新四军是否撤出姜堰，韩德勤的大举进攻是必然要来的，各部队要作好战斗准备。果然，韩德勤一次最大规模的进攻开始了。他命令 89 军军长李守维统一指挥，89 军、独立 6 旅为中央纵队，由海安出动，经营溪、古溪分三路进攻黄桥以东和以北地区。命令 10 个保安旅为左翼纵队，由郭心冬指挥，进攻黄桥以东地区，命令二李部队和税警总团为右翼纵队，由李长江指挥，进攻黄桥以西地区。动员总兵力达 10 万余人。黄桥以南即是长江，韩德勤得意忘形地喊出：“把苏北新四军赶到长江去喝水！”

部队经过动员以后，士气十分高涨，到处都是磨刺刀的“嚓嚓”声。战士们说：“韩德勤要逼我们到长江去喝水，问我的刺刀愿意不！有我们就有黄桥！”

黄桥战斗打响了。开始，敌人的机枪声压住了新四军的手榴弹声，但过了不久，手榴弹声就压住机枪声了。战斗顺利地发展，敌人逐渐退缩。到了黄昏时分，一纵队指挥部不断地接到 1、4 团的战斗报告：“敌 16 团团部被歼灭了，捉了四成多俘虏！”“18 团被歼灭了，轻机枪缴了几十挺！”最后来了这样的报告：“据俘虏来的独立 6 旅旅部副官说，中将旅长翁达自杀了！”

黄桥地区的人民在这次战斗中，紧紧地和新四军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热情地参加了战勤工作。他们冒着炮火，抬伤兵、运子弹、烧茶、煮饭、供饼，一筐筐，一担担，送上火线去。一个白须白发的老农民，他早上把自己的门板扛到阵地来，给三纵队的战士们筑工事。中午又提着一篮烧饼跑进了工事，把篮子硬塞到战士们手中，他的唯一的儿子阿富因出于爱国心，参加了韩德勤部队打日本，但后来因看出了顽军的黑暗与无耻，而且不堪当官的打骂虐待，不愿反共打内战，就反抗逃跑，结果给韩顽枪杀了。他痛恨地对战士们说：“让我老人也打一枪，打死这些坏种！”回头又招呼战士们：“吃吧，同志，这烧饼表表我老人感激你们的心！”黄桥镇的烧饼是

出名的，平时街上烧饼很多，几步一个烧饼炉。孩子们端着筐子，里面盛满焦黄的烧饼，饼上沾满芝麻，“烧饼啊！”“烧饼啊！”地叫卖。而现在，所有的烧饼都被居民订下来，去慰劳新四军。

说不尽的动人事迹在激励着战士们，战士们打得更加坚决勇敢了。而新四军服务团的男女同志们也和群众一起活跃在阵地上。他们唱起了现编词、现谱曲的军民合作的歌子：

黄桥烧饼黄又黄嗳，黄黄烧饼慰劳忙嗳。

烧饼要用热火烤嗳，军队要靠老百姓帮。

同志们啖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

不畏强暴众回民

1938 年 2 月，回民抗战建国会在河北新城县正式成立，选举刘太瑞为主席，杨子建为组织部长。新城县是回民聚居地，早在 1935 年，地下党员黄大夫就在白沟北镇的“公义合”药铺以看病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37 年七七事变后，在黄大夫的领导下成立了回教动员会，动员回民群众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支援前线。特别是敌人 1941 年 6 月大“扫荡”之后，在环境极端残酷的形势下，回民群众面对敌人的棍棒刀枪，英勇不屈地保护子弟兵，以及为配合部队反“扫荡”、夜抢敌人粮库的壮举，被传为佳话。在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回建会带领回民群众，同汉民兄弟一起，积极参战，共御外侮，为抗日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1941 年 5 月，日军对冀中 10 分区腹地新城一带展开“铁脚闪击扫荡”，接着又调集日伪军 2 万多人，于 6 月 10 日开始，对大清河北平津保三角地区进行疯狂的“梳篦拉网扫荡”。在敌人这次长达两个月的反复“扫荡”中，新城县委书记马子玉被捕，县长王星壮烈牺牲。坚持地区斗争的县大队、区小队也被敌人追得到处转移，隐蔽活动。我军主力部队也为避敌锋芒，转到平汉路西山地区休整，分区领导机关撤到白洋淀。一时间，风云变色，整个 10 分区成了敌人的占领区。

由于环境变化，回建会只能隐蔽地进行地下斗争。乡亲们见到县大队、区小队的战士们整天东躲西藏，处境十分危险，心里如火燎一般，决心想办法掩护自己的部队，保存抗日力量。新城县白沟镇附近的白辛社、仁合庄一带的抗日骨干自发地召集到一起，商量如何掩护自己的部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县大队、区小队在，日本军队和伪军、伪警察、伪保长们就不得不有所顾忌，一旦咱们的队伍垮了，乡亲们就会由敌人任意蹂躏，任意宰割。纷纷表示：无论如何也要保存住这股抗日力量，就是掉了脑袋也心甘情愿。就这样，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战士们化妆成老百姓，和乡亲们论好亲属关系，混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严密盘查。敌人做梦也想不到被他们围追的抗日队伍就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100 多个战士隐蔽在这两个村子，回建会的领导的心整天悬到嗓子眼儿。于是走家串户，给乡亲们讲：“如果走露一点风声，不但县大队和区小队要完，敌人也决饶不了咱们两村的老百姓。”

敌人终于撤走了。全体战士集合要转移到大清河西去。战士们挥泪告别了用身家性命保护了他们的乡亲。这难舍难离的告别场面，令人感动，令人难忘。

队伍渐渐走远了，村边的乡亲们还看得见他们在不时地回望。是啊，他们忘不了。忘不了这两个回民堡垒村！忘不了这里的回民父老乡亲！

村里的回民群众经过敌人残酷的“扫荡”，恨透了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更加积极热心。子弟兵伤员经常在村里养伤，部队也常到村里隐蔽。但是，时间长了，意外的情况终于发生

1942 年麦收后的一天拂晓，由于敌人安插在村里的特务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白辛庄。疯狂的日本兵和汉奸砸开各家各户的门，把乡亲们从家里赶出来，用刺刀逼着到礼拜寺的大院子里集合。敌人高声喊叫着：“快把八路伤员和县大队的人交出来！”院子里男女老少几百口子，没一个人吭声。

鬼子从群众中抓出几个乡亲。“说不说？”敌人嗥叫着，“不说？上刑！”棍棒齐下，朝着几个人劈头盖脸地打下去。不屈的人们，忍着疼痛，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受刑的人心里明白：敌人的问话证明他们已经知道村里有八路军，也知道八路军是被老百姓藏起来了。但是大家不说，他们就找不到。敌人见打不出来，就动用了老虎凳、压杠子、灌凉水等毒刑。村长刘殿启站起来，想支应敌人。没想到敌人对他吼道：“你这个村长，窝藏八路，捆起来！”不容分说，几个汉奸七手八脚把刘殿启绑到礼拜寺前的大桩子上。刘殿启等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将口中带血的凉水喷到敌人的身人，算是对敌人的回答。乡亲们不忍看啊！妇女们背转身躯，低头垂泪。敌人以为妇女们心软了，便逼着她们到受刑的人身边观看。她们面对顽强不屈的受刑的亲人，眼里满是心疼的泪水；而对凶狠残暴的敌人，眼里却喷射出仇恨的怒火。穷凶极恶的敌人黔驴技穷，恼羞成怒，狂叫着：“再不交出八路伤员和县大队，统统地活埋！烧掉礼拜寺！”死神向人们伸出了魔爪，圣洁的教堂将要变成敌人的屠杀场。虔诚的教徒们心里默默地祈祷着：“求主保佑！求主赶走这些强盗……”

由于敌人的突然进村，组织伤员和县大队的同志转移已来不及，怎么办？回民抗日建国会组织部长杨子建提议，马上调区小队来解救，于是迅速制定出解救白辛庄乡亲和部队同志的战斗方案，数路出击，迷惑敌人，以吓跑为目的。果然奏效，村子里的敌人顿时惊慌失措，不知道来了多少八路军，深怕被包围歼灭，顾不得活埋人和烧礼拜寺，如丧家之犬，似漏网之鱼，一鼓脑儿逃回了白沟据点。

回民群众受了敌人迫害以后，恨透了白沟据点的日军和汉奸，回民抗日建国会因势利导，利用回民心齐这一特点，广泛发动群众，人们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复仇的烈火燃烧在每个人的心中，要找白沟的鬼子去算帐。但是敌人势力强大，凭区小队和赤手空拳的群众，拔据点是办不到的。1943 年 7 月的一天，内线送来情报：白沟镇里有敌人的粮库，从四乡抢来的粮食未外运之前都存在这里。这个粮库和敌人炮楼不在一起。白沟据点敌大队人马已出发去“清剿”，据点内只有 100 多伪警察和伪警备队，防守十分空虚。接到情报后，回民建国会迅速召集抗日骨干和村干部会议，大家听完介绍的情况，一致认为是个好机会，因为虽然只有区小队的武装配合，但有这些有利条件可以利用，而且又是夜间行动，敌人不会知道回建会到底有多少队伍，伪警察们不敢出来，有爱国心的回民伪军官马长胜也不会叫伪警备队出来。

大家把几个具体问题商定后，便分头行动了。各村抗日骨干负责召集各村的乡亲。一切照计划进行，只等行动信号了。午夜，信号枪打响了，大木桥燃起了熊熊大火，成千上万的乡亲们在各村抗日骨干的带领下，冲向了敌

人的粮库。区小队战士们也向敌人发起佯攻。刹那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洋铁桶里的鞭炮声、乡亲们的怒吼声，夹杂着“冲呀！冲呀！拿鬼子炮楼呀”的呐喊声，震天动地。伪警察们吓得不敢出来，躲在炮楼里乱放枪；伪警备队在岗楼里一面向夜空放枪，一面大声叫喊：“顶住，别让八路攻进来！”乡亲们看着粮库里被敌人抢来的粮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滴滴血汗。愤怒的人群猛扑上去，打开布袋，装、灌、背、扛，人人都有使不完的劲。这是久埋心底的复仇的力量。这情景，这场面，是何等的壮观！

大火映红了大清河水，夜空中好像一根火柱通天，火光映照着乡亲们的笑脸。没到天亮，几万斤粮食就全部抢运完了。抢了敌人的粮库，又调回了外出“扫荡”的敌人。这次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武装队伍的反“扫荡”斗争。

抗日绿林金老太

1940 年 6 月，分区政治委员帅荣和参谋长肖新槐根据永定河两岸的情况，决定组织一支外围军，名为北上抗日先锋支队。主要任务是争取绿林武装，争取瓦解伪军，收容我失散人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孤立打击日军，配合地方干部坚持永定河两岸的斗争。北上抗日先锋支队成立时，任命李大卫为支队长，王雨田为副支队长，田树藩为参谋长，朱万福为政治部主任，徐成瑞为供给部主任。并为先锋支队增加一个主力连作为骨干，由支队长李大卫同志统一组织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

北上抗日先锋支队经过数次较量，先后收编了土匪徐玉芝、于丰年等部，并迫使最大股匪胡景荣、胡显荣部接受了“约法三章”。先锋支队成立后战果累累，因此 1941 年分区决定扩大北上支队为东进总队，任命出身绿林的缑海楼同志为总队长。在十分复杂的斗争中，东进总队与“黄军”（指日军）斗，与“蓝军”（指汪精卫新军）斗，与“黑队”（指土匪）斗，与此同时又争取过来了一部分绿林人物，金老太就是其中的绿林人物之一。金老太虽为绿林，也危害过群众，但在当时我军处于最困难的岁月里，她确实也做了很多有利于抗日的工作。

金老太是安次县后屯村人，原本小康人家，因她丈夫在赌场被人杀害，为替夫报仇，拉起“黑天档子”。当时她已五十多岁，讲交情，重义气，虽为妇道，但颇有些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她坚持“兔子不吃窝边草”，所以当地群众认为她比其他“黑天档子”好些。她平时外出骑一头毛驴，吃大“买卖”时她亲自督阵，对待“秧子”（人质、“肉票”）也较“开明”一些。当时她有 100 多人、轻机枪 1 挺，除礼贤镇胡部外，她是最大的股匪。因为她的长子负重伤，东进总队的医生高雅轩同志为他治过伤，所以，经高雅轩同志劝说，她和东进总队领导见了面。

经过几次接触和教育，金老太有弃暗投明之意，并要求参加抗日和接受我们的领导。因为她是安次县西北部的绿林，和日伪军、土匪都有联系，日军翻译中岛、廊坊特务吴保亭都是她的干儿子，特别是和土匪胡部关系较密切。只要她真心倾向抗日，就可以帮助我们侦察敌情，掩护我军活动，从中还可以调节我军与胡部的关系。如果收编她加入北上支队，就会失掉或至少会降低了这些我们自己无法起到的微妙作用。因此，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东进总队经过再三的考虑，还是决定让金老太留在“外边”为宜。由于她再三要求，后来东进总队秘密委任她的儿子金秀亭、胞弟金保元为北上支队第

三大队正、副大队长。金保元有民族正义感，是金部的领导骨干，有组织指挥能力，当时人称他是“金部大主任”。因此，金部就成了东进总队外围军的“外围军”。

1941 年冬敌人想彻底消灭北上支队和东进总队，首先对各股土匪进行威胁，并以高官厚禄诱降。金老太斩钉截铁地说：“连吕司令都看得起我老太婆了，叫我弃暗投明。我是中国人，怎能投降日本人！”

她这话的来历是这样的：由于东进总队和北上支队正确地执行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永定河以北地区的工作开展很快。1940 年秋百团大战时，金部派一个分队给东进总队带路并参加了对北宁铁路的破袭战。有一次遇到一列客车，恰好没有被炸毁，在被迫停车检修的几分钟内，东进总队乘机向旅客喊话。这件事被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知道，奖励了东进总队 200 元，并提出想见一见这一位绿林人物金老太。是年冬，金老太骑着小驴，由东进总队副队长李大卫陪同她一起到了军区所在地——饶阳县境内。吕司令员热情接见了他们。并指示东进总队要注意群众纪律，吃了老百姓的粮食要开条子，武器、弹药要取之于敌。当时在场的还有沙克参谋长和张学诗同志。金老太一再表示，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

从东进总队回到永定河地区后，土匪胡部便积极拉金老太想共同把东进总队挤出永定河以北，她都巧妙地应付过去了。一次，胡部邀她偷袭我军，她将这一情况详细告知我军，我东进总队将计就计，叫胡部扑了个空，并在他们的退路上狠狠地打了他一个伏击。乘他倾剿出动之际，金老太让她的机枪班给我军带路，袭击了胡部老窝礼贤镇，解放出“秧子”40 余人。

在东进总队正处在困难之际，金老太遇到来永定河地区活动的我游击部队，都积极给予帮助。她还曾主动帮助王光霞同志解决过一部分军需物资。特别是东进总队副队长李大卫同志委托她以可靠武装掩护一位“粮商”张老头往返通过平津铁路的事，她完成得非常出色。因这段路程由土匪控制，难以通行，这位化装“粮商”的人，就是当时晋察冀军区情报处长张存实同志。张在北平南采育镇以开设粮店来掩护情报站，并设有电台，据说北平解放后才撤回。

1942 年春，敌人再次大规模地伐树“清剿”。为粉碎敌人伐树阴谋，3 月初的一天夜里，由金老太出面，在安次县大更生村一个地主院内摆了一桌酒席。被请的“客人”胡三等人正准备就座时，东进总队领导李大卫和缑海楼同志按预定计划准时到达村外。金老太接到报告后，佯装不知，并故作惊慌，当李大卫和缑海楼同志进屋，彼此寒喧过后，金老太逐一介绍了客人。接着就摆桌上菜。

胡三是回民，金老太故意逗趣地说：“老三甭夹闷肘子。”说得大家都笑起来。胡三用筷子夹了一大块爆羊肉站起来说：“多谢老嫂子给我们准备了红烧鱼、爆羊肉。”他把视线迅速转向孙瑞峰（孙瑞峰同志是作为东进总队代表来这里作客的）说：“我眼睛虽然不太好使，可怎么也不会夹上红闷肘往嘴里塞。”孙瑞峰冷笑着说：“三掌柜干瘦人能吃肉，可能胃口消化不良。”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胡三一不作二不休，伸手把红烧鱼端到自己面前，扫了大家一眼，然后对着李大卫（1940 年末，李大卫曾在礼贤镇胡三的家里见过面）说：“这个菜我真得味！得味！”说话时满脸凶相。按当地风俗，有人说对这个菜他“得味”，其他人就不能再吃这个菜了。他这话明明是对着我东进部队说的，其言外之意是：大兴县一带是我胡部的地盘，我已

经“得味”了，谁也甭想进来。李大卫和缑海楼同志接着诙谐地说：“感谢金老太太这么丰盛的酒席，与各位巧遇，也算有缘。当前鬼子已经狗急跳墙，但他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我们都是中国人，爱国一家，抗日不分先后，只有抗日才是出路，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人，只有死路一条。要学葛中队长，‘身在曹营心在汉’。希望转告各‘掌柜’，与我们一起保境安民。”缑海楼同志用眼盯着胡三，接着狠狠地回击说，“我们不仅要解放大兴县，还要解放北平、天津，解放全中国。只要大家跟我们共同抗日，共产党是忘不了诸位的！”按预定计划，由孙瑞峰同志提出“反敌人砍树行动计划”。

此后不久，胡部暗地投敌了。胡三手黑心毒，是胡部的“智多星”，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在一天早晨，胡三和吴保恒（金老太的干儿子）突然来大更生村，说找金部有要事相商。金老太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胡部杀害了。金老太一家人，除了她的一个侄子、两个女儿当时不在家外，其余老少11口无一幸免。

神出鬼没雁翎队

位于华北平原上的白洋淀，是一个碧波浩渺、芦苇如林的淡水湖，面积约600多平方公里。它汇合了唐河、潴龙河诸水，经大清河注入海河，是天津、保定间内河航运的中枢。这里的人民勤劳、质朴，使这里成为华北罕见的鱼米之乡。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魔爪也伸进了白洋淀。敌人妄图利用天津至保定的这条水路，作为其侵华战争的重要运输航线。他们在这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实行了血腥的“三光政策”，把这块宁静、富足的地方变成了尸横遍野、满目废墟的人间地狱。

这里的人民并没有被日寇的暴行所吓倒。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拿起了武器，利用他们熟悉地形、精通水性的特长，以白洋淀为战场，出没于湖河港汊、茂密的芦苇荡，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机智灵活的战斗。由于这支游击队初建时是以“大抬杆”（打野禽用的大型土枪）为主要武器进行战斗，为了防止浪花打湿枪膛内的火药，便在信口（点火处）插上一根雁翎，所以，人们形象地称这支队伍为“雁翎队”。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活剧，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大抬杆”的枪管有丈把长，后半截装火药，前半截装铁砂，尾部有个装药捻的小孔，点着药捻，就能引燃火药，把铁砂子迅速地推出去，打出去的铁砂一散就是一片，杀伤力大，百米之内的目标基本上是弹无虚发。由于它的枪身很重，往往需要两个人才能抬起来，所以人们都习惯地叫它“大抬杆”。

雁翎队刚成立时，缺少武器弹药，“大抬杆”这种本地“土特产”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雁翎队的主要战斗武器。为了检验这种武器的威力，战士们决定试一试。

一天，他们找了几副“大抬杆”，把火药砸得实实的，把铁砂筛了一遍又一遍，净拣大粒的装，还在铁砂里边掺了许多“球皮钉子”。为了让几副“大抬杆”同时发挥作用，战士们还别出心裁地把它们后座的药捻连在一起。一切准备就绪后，战士们就隐蔽在茂密的苇塘里，静候着敌人来撞“枪口”。

不一会，远处传来了刺耳的引擎声，随着一股冲天的白浪由远及近，只见一个班的鬼子神气十足地坐着一艘快艇冲过来了。当敌人进入了最佳射程之内后，战士们迅速抓紧仅有的宝贵的几秒时间，瞄准敌人，点着药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瞬间功夫，船上刚才还骄横不可一世的 9 个鬼子立时全被报销了。个个身上千疮百孔，像 9 个马蜂窝。当日军头目龟本听到这个消息后，气急败坏地命令部下把尸体捞回去检验。可面对 9 具血肉模糊，全身窟窿的尸体，谁也说不出是什么武器打的，还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呢。从此，到处都在传说雁翎队有了“扫帚炮”，要是挨上“扫帚炮”，马就得满身窟窿，魂归西天，日伪军一听到雁翎队和“扫帚炮”个个胆颤心惊，坐卧不安。

“大抬杆”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白洋淀抗日军民的斗志，更坚定了战胜日本鬼子的决心。“大抬杆”从此也成了雁翎队的“秘密武器”，打得敌人魂飞魄散、狼狈不堪，充分显示出了“大抬杆”的神威。

自白洋淀出现了神勇的雁翎队，使得进犯白洋淀的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敌人从天津、保定等地调集了大批汽艇，连同他们在白洋淀掠夺的大小民船，一起出动，对雁翎队进行空前的“拉网清剿”，妄图一举消灭雁翎队。一时间，乌云滚滚，险象环生。敌人的巡逻汽艇穿梭般地在淀上横冲直撞。这种汽艇马力大、速度快、火力强，对我雁翎队的水上活动构成了很大威胁。

当时我雁翎队仅有 20 来副鹰排（打水禽用的一种小船），要想和敌人的巡逻汽艇打仗，困难是很多的，但雁翎队的战士们并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到。经过认真侦察，他们发现，敌人的汽艇虽然速度快，但噪音大、易暴露，而我们的鹰排虽然是人力划水，速度慢，但噪音小，易隐蔽。要想以劣胜优，就必须出奇制胜，利用芦苇荡作掩护，伏击敌人的巡逻艇。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雁翎队得到情报：安新县城的 20 多个鬼子和 30 多个伪军，分乘 2 艘巡逻汽艇到赵北口去运东西，预计下午返回。雁翎队遂即决定，中途伏击敌汽艇并迅速地作了战斗部署。

到了中午，雁翎队的战士装扮成打鱼的，有的划着小船，有的驾着鹰排，三三两两，从不同方向悄悄地钻进了设伏地点——大张庄苇塘。

大张庄苇塘在白洋淀中大清河道一侧。大清河河宽水深，没有杂草，是敌汽艇和大型船只的必经之路。这块苇塘方圆几十里，芦苇长得高且密，小船划进去两、三米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很便于隐蔽，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战士们到达以后，逐个地调整鹰排上的“大抬杆”，用药捻将 20 副“大抬杆”连接起来，呈扇面形对准河道，以便扩大杀伤面积。步枪班和手枪班配置在两边，一切就绪，就等敌人自投罗网了。

太阳偏西，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马达声。不久，就可看到敌人的汽艇划破平静的水面，隆隆驶来。但狡猾的敌人把两艘船的距离拉开了，把护航船放到前面，以便一旦被打好互相照应。雁翎队的指挥员看出这是日军耍的花招，当机立断，集中火力，速战速决。按计划进行。

我神勇的雁翎健儿随即行动起来。有的头顶荷叶，跃身钻到苇塘边，拖起一大堆杂草，扎猛子迅速向河中央泅去；有的拿着香火，蹲在“大抬杆”一旁，准备一触即发，让敌人尝尝“扫帚炮”的滋味；有的伏在鹰排上，紧握船桨，随时准备从芦苇中冲出去与敌搏斗；有的举枪瞄准了敌人……。

一会儿的功夫，敌人的汽艇就进入了我伏击圈，艇上的日本兵都看得一

清二楚，这些鬼子和伪军在艇上三一群、五一伙地挤在一起啃吃从乡亲们那里抢来的西瓜，个个吃得睑花肚圆，看样子毫无戒备。

当敌艇距雁翎队员仅百米时，突然速度慢了下来，原来，这是我雁翎队员在河中心放置的杂草起作用了，杂草缠住了敌艇。趁此机会，我神枪手“叭”的一枪首先干掉了掌舵的鬼子兵，那鬼子随着枪响，一头就栽到河里喂王八去了。失去控制的汽艇就像抽打着的陀螺一样在水里直打转，不能往前走了。

趁敌艇停止前进的功夫，早已严阵以待的 20 副火捻联在一起的“大抬杆”一齐瞄准了敌艇，一齐点火发射，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火光映红了淀水，密集的铁砂如暴雨般从四面向敌艇倾射过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死的死，伤的伤。紧接着，我步枪班、手枪班也以排射向敌人开了火。密集的火网立即就把平时耍尽威风的敌艇打得像蜂窝似的，机器也不叫了，艇也开不动了，在原地打转，像个手足无措的怪物。艇上的敌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报销了一半，剩下的在船板上滚的滚，爬的爬，狼狈不堪。

随着一声令下，埋伏在四周芦苇丛中的几十只鹰排便像离弦之箭一样冲出苇塘，直向敌人汽艇冲去，有的队员也扎入水中，一个猛子就扎到了敌艇边上，随着一排排手榴弹的爆炸声，敌艇瞬间就被烟火笼罩了，大火熊熊燃烧起来，艇上的敌人再也呆不下去了，纷纷跳入水中，妄想夺路而逃。敌人一旦离开了汽艇，落入水中就完全失去了优势，在我雁翎队员的摆布之下了。

只见在水中的我方队员个个如水中蛟龙，只要是被他们抓住的鬼子，个个都身不由己地到“龙王殿”去报了到。在鹰排上的队员个个像捕猎能手，有的用鱼叉，有的用船篙，有的用手枪、步枪，把在水中挣扎的鬼子、汉奸全都一个个地点了名。敌人的尸体像一块块朽木一样横七竖八地漂浮在河面上，敌人的汽艇也已开始倾斜、下沉……

这时候，第二艘汽艇出现了，这艘汽艇观察到前面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浓烟蔽日，料想到第一艘艇凶多吉少，便一边拉响警报器，一边用机枪疯狂地向四周扫射，但前进的速度却明显地慢了下来。大概是怕遭到和第一艘汽艇的同样下场吧！

听到战斗警报，附近据点和炮楼的敌人纷纷出动，不一会便集聚了近百艘船向出事地点围了过来。此时，我雁翎队员正在打扫战场，看到敌汽艇和四周出动的敌人，他们并没有顺河撤离，那样势必会暴露目标，被敌汽艇追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他们沉着地按照预定计划果断地撤进了浓密的苇塘。那艘汽艇仗着人多势众，指挥着其余的船只，一下子就把苇塘围了个严严实实，敌人洋洋得意，自以为这次可以把雁翎队一网打尽啦，鬼子先是让伪军向苇塘里喊话，见没动静，就向苇塘里拼命地开枪扫射，打了一阵，仍不见动静，敌人以为雁翎队员早已被他们打死了，便命令伪军在前，逐步缩小包围圈，进入了芦苇塘。可找了半天，几乎把苇塘翻了个遍，别说连雁翎队员的人影也没见，就连鹰排和“大抬杆”也未找到。敌人惊慌不安却又极为不解；雁翎队是上天了？入地了？难道他们是神兵吗？

其实，雁翎队既没上天，也没入地。他们在退入苇塘之后，迅速将鹰排弄翻，连同“大抬杆”一起沉入水中，然后，每人头顶一张大荷叶，乘敌人往苇塘里胡乱开枪的时候，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泅水冲出了包围圈。此时，白洋淀上荷花盛开，一望无际的荷塘上，荷叶摇曳，莲花摆动，敌人怎么也想不到我雁翎队员会在荷叶下安全地撤离了。

从此，白洋淀上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

无边芦苇扎营盘，打得鬼子怕出城。”

1943 年秋天，在冀中的鬼子真可谓度日如年，保定通往北平的铁路线被抗日军民切断了，保南的敌人孤立无援，只好把运输军火、粮食和物资的希望，寄托在大清河这条水上运输线了。

可是敌人又惧怕我神出鬼没，日益强大的雁翎队，不敢轻易小规模活动。而是采取几十条、上百条船一起活动的方式，企图保障水上运输的安全。

针对敌人活动规律的新变化，为了切断敌人水上运输线，支援我太行山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雁翎队决定寻找机会，打掉敌人的水上运输队。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雁翎队获得情报，敌人组织了一支 100 多艘货船的庞大运输船队，在 3 艘武装押运船的护航下，将从白洋淀经过，准备把货物运往保定。

雁翎队听到这个消息，决定打一个伏击战，消灭敌人，夺下军火、物资，卡断敌人的水上运输线。伏击地点就选定在王家寨东边的横埝苇塘。这里的芦苇是移栽的，苇密水浅，便于隐蔽和出击。

雁翎队员们趁着夜深人静，悄悄地出发了，五更时分，便进入了伏击地域。此时，西边的明月还未退下去，把大淀照得豁亮。四周万籁俱静。

大家藏好船只，头顶荷叶，手托枪、子弹袋，把手榴弹挂在脖子上、身披水榨草，站在齐胸深的水中，静候着敌人的到来。如果不走到跟前，谁也看不出这里埋伏着神兵天将。

当太阳刚一露头，敌人的船队就出现了。只见 100 多艘大船，黑压压的一大片缓缓地向前移动，3 艘武装押运船殿后。敌人被雁翎队打怕了，全都龟缩在押运船上，还在几丈高的桅杆上吊了个箩筐，派一个瘦猴似的伪军坐在上面，拿着个望远镜，紧张地四处观察着苇塘的动静。

按照原定计划，雁翎队员们躲在荷叶下，动都不动，耐心地等待着一艘艘货船从前面缓缓地驶过。大约过了半个多钟头，100 多艘货船才过完，拐过了苇塘，3 艘武装押运船进入了伏击圈，敌人正在吃早饭，大部分站在船舱里，只有少数几个人在船面上。当第一艘船刚一拐弯，只听“叭”的一声枪响，站在高处担任了望任务的伪军像个被击中的大乌鸦一样一头栽了下来。

枪声就是命令，埋伏在苇塘里的战士一齐向敌船开火，船面上的鬼子瞬间就给报销了。突击队员们驾乘着鹰排从苇塘里冲出，长篙一点，就到了敌船附近，随即投出了一排排的手榴弹。趁着手榴弹爆炸后的功夫，雁翎队员们跳上了敌船，准备收拾船舱内的敌人。这时，船舱里的敌人早已乱作一团，有的鬼子刚一爬出船舱，就被我雁翎队员一枪打了个倒栽葱，有的鬼子刚想摸枪，便被鱼叉穿了个“透心凉”，船舱里剩下的敌人见抵抗无用，逃跑无路只得乖乖地举起手来。前后只几分钟，第一只船上的敌人便被全都解决了。

在攻击敌第一只船的同时，其它雁翎队员也向第二只敌船发起了攻击。这第二只船距第一只船相距仅有约 50 米，第三只船距离前两只船比较远。因此，对前两只船必须同时攻击，才能不让它们互相支援。

当战士们快要靠近第二只敌船时，敌人的重机枪突然“哒哒哒哒……”地响了起来，一时间，密集的火力，打得水花四溅，使我们的船只难以靠近。见此情况，我几名雁翎队员翻身潜入水中，一个鸭子追鱼便悄悄地游到了敌船边，一手抓住船帮，一手抽出手榴弹，用牙咬开盖，用舌尖勾出弦，对准敌重机枪狠狠地投了过去。随即返身一个猛子从深水游离了目标，就听“轰

隆、轰隆”的爆炸声，鬼子兵连同机枪都被炸上了天。这些队员们凭借高超的水性，踩水站在水中，瞄准船上混乱的敌人，一枪一个地“点名”。紧接着，雁翎队员从水中翻身上了敌船，一连挑死了几个抵抗的鬼子，剩下的敌人吓得丢魂落魄，一个大个子伪军率先举着双手钻出船舱投降，身后一大群垂头丧气的伪军跟在后面，一问才知道，领头交枪的大个子正是河防大队大队长秦凤祥。

正当这里的战斗刚刚结束，后面第三只敌船已发现了这里的情况，敌人把轻、重机枪全都架上了船头，所有日、伪军都从船舱里爬了出来，全副武装，拼命地向这里的苇塘狂射。我两名雁翎队员不幸中弹倒下。看来，敌人是想拼个鱼死网破，企图凭借火力冲出伏击圈。

对这种情况，我雁翎队早已有所准备。火力组的神枪手们迅速占据有利位置，从几个方面同时开火，很快就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住了，日军和伪军被我强大的火力打得抬不起头来。趁此机会，十几名雁翎队员赤膊上阵，嘴叼大刀片，扎猛子潜水朝相距 100 多米的敌船悄悄泅去。泅出几十米才露出头来换口气，没等敌人发现，又扎入水中。不长时间，就潜水绕到了敌船后面。敌人只顾前面，绝没想到背后还会有人上船。当敌人听到动静时，我雁翎队员如神兵天降早已从水中翻身上船了。几个鬼子刚一回头，雪亮的大刀已砍到了他们的脖子上。另几个鬼子慌忙举枪来到，队员们在船上身轻如燕，而鬼子晃来晃去笨重如牛，面对敌人的利刀，队员们用刀背将枪刺一磕，翻过手腕，对准敌人狠劲一枪，敌人的脑袋就搬了家。敌机枪手是个日本兵，他刚想掉转枪口，向我登船勇士扫射，在水中的队员说时迟，那时快，一纵身从水中腾空而起，手起刀落，血光一闪，这个鬼子兵被劈成了两截。

经过激烈的白刃格斗，敌人很快就丧失了战斗力。有的举手投降，有的逃入水中企图逃命。从小在水中长大的雁翎队员们，个个如“浪里白条”，身怀绝技，没一会功夫，就像鱼鹰逮小鱼似的，把如落汤鸡似的敌人一个个从水中提了上来。

不到半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100 多个日、伪军全部被收拾了。日军安新县的指挥官初十加三郎被我战士从第三艘押运船炉灶旁的麻袋里活捉。这个号称有“武士道”精神的鬼子露出了纸老虎的原形。

运输船队被截获了，大批的物资和激获的枪支弹药都成了雁翎队的战利品。队员们押着 100 多条运输船，排成整齐的船队，迎着初升的太阳，一路欢声笑语，浩浩荡荡，凯旋而归。

北新镇学生锄奸

北新镇有个敌人的保甲指导员，名叫马之超，这家伙笑里藏刀，阴险毒辣，在敌人的武装帮助下，编好一批壮丁。每天早晨，马之超都要把壮丁集合在北新镇一个学校的操场上进行操练。每当操练的时候，马之超非常得意。时不时的，还装腔作势地向壮丁们喊着：“立正，向右看齐”。之后就是阴阳怪气，很刺耳、极其反动的训话，训话完毕，他让壮丁们操练，他自己则背着手，在操场上悠悠闲闲地踱方步，旁若无人。操练中壮丁们稍有不慎，就要遭到马之超残酷的拳打脚踢。操练完后，他还要和学生们在一起进行升旗典礼。马之超的可恶言行早已引起壮丁和北新镇老百姓的憎恨，都骂他是大坏蛋狗汉奸，早就想把他锄掉，只是这家伙很精，除了早晨上操外，平时

就不出来，缺少“锄”他的机会。

北新镇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在敌人刚开始“清乡”的时候，党及时颁布了一项“紧急治罪条例”，并组织了锄奸小组，展开群众性的锄奸活动，以便打掉敌人的最凶恶的爪牙。党提出“专打‘清乡’人员”，“专捕敌特奸细”，“专杀清乡特工”的口号。这就是说，把镇压汉奸之权交给群众，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有权杀汉奸。党的这项英明措施，在北新镇得到了强烈的响应。自从“紧急治罪条例”颁布后，这项措施真像一支火炬，一下就将北新镇群众的斗争热情燃烧起来了，锄奸运动像雨后春笋一样地成长起来，镇压了敌人汉奸的气焰，使日军失去了耳目。使敌人一提到锄奸运动，便“谈虎色变”，天天提心吊胆。

如今，马之超又嚣张起来，北新镇的人民对他恨之入骨，大家都说：“马之超是日本侵略军的耳目，到处出坏注意，干坏事，他是北新镇最反动、最可恨的大坏蛋，马之超该杀，他真太无法无天了！”

学校里有三个学生，平时和新四军的“短枪队”有联系，也是“短枪队”的青年队员。有一天，北新镇来了两个装着小贩模样的短枪队员，晚上他们住在学生家里，进行了研究，决定利用马之超参加学生升旗典礼的机会，由学生队员把他“锄”掉。

第二天，马之超照旧带着壮丁在学校的操场上操练，操练完毕，便和学生们在一起举行升旗典礼了。正当操场上的人们直僵僵地站着，望着旗杆上一面带黄幡的青天白日旗哗哗啦啦地升上去的时候，一个学生跑出了队列。这是“短枪队”的一名青年队员。此时，马之超站得端端正正，仰着脑袋。这学生悄悄走到马之超背后。人们都聚精会神地望着旗杆，谁也没有注意他。他一下拔出短枪，朝马之超的后脑勺就是一枪，打得马之超脑浆迸裂，像死猪一样地倒在地上了。这一刹那间，另外两个也是青年队员的学生大喊：“新四军来了！”这一来，操场上的人群大乱，像潮水一样地奔向四方。

打死马之超后，北新镇人人拍手称快。当然，壮丁再也不操练了，群众也都把编保甲的户口牌烧掉了。

千万华侨的义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在海外的侨胞有 1100 多万人。他们虽身处异邦，但心系祖国；他们尽管职业不同，信仰各异，但他们都是炎黄子孙，血管里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灵魂中充满着无比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热爱辽阔的中华大地，热爱勤劳善良的骨肉同胞。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广大华侨遥望故土，密切注视国内事态的发展。对日军蹂躏祖国，屠杀同胞，无不义愤填膺。祖国的存亡与他们的亲人休戚相关，因而他们纷纷组织起来，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推动祖国持久抗战的一支强大力量。抗日战争的每一胜利，无不凝聚着爱国侨胞的心血和汗水。

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爱国热潮，从财力、人力、物力各个方面积极支援祖国抗战。在南洋，陈嘉庚等爱国华侨领袖联络各界人士，在马来亚各地组织华侨救国救亡的联合组织，利用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抗日经费的活动。以陈嘉庚为首的马来亚抗战团体提出的口号是：“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在南洋各地救亡团体竞相成立的形势下，1938 年夏，印尼华侨领袖庄西言和菲律宾华侨领袖李清泉，联合写信给陈嘉

庚，建议成立南洋华侨救亡斗争的最高组织，统一领导南洋各地救亡斗争，以克服各自为政，步调不一致的缺陷。陈嘉庚十分赞同这一主张，并积极进行筹备。1938 年 10 月 10 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来自法属安南、暹罗，英属新加坡、缅甸、北婆罗洲，美属菲律宾，荷属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州、巴达维亚等 45 个华侨团体共 164 名代表。他们推选陈嘉庚为南侨总会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决定在新加坡设立总办事处。负责日常会务，指导各地筹赈救亡工作。南侨总会的任务是：号召侨胞“各尽所能，各竭所有，增筹款项，推销公债，以救济中国抗战中之难民”。其宗旨是：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一报九世之深仇”。大会之后，各代表回到原侨居地，先后建立 68 个筹赈分会，在总会领导下，组织群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力支持祖国抗战。

从抗战爆发到 1941 年底，所有捐献总数共达法币 28．5 亿元，平均每月 6000 万元。当时因半壁河山沦入敌手，国家财源大大减少，华侨的捐款及汇款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据统计，抗战头 5 年，华侨捐款 50 亿元。当时全国抗战经费每月约 7000 万元，华侨承担了 6／7 以上。爱国华侨除捐款外，还将捐献的大批抗战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运回祖国。据有的资料说，1938 年底，仅菲律宾华侨捐献的飞机就有 50 架，旧金山的侨胞短期内捐献飞机 10 架，纽约华侨一次就捐献救护车 100 辆，缅甸华侨一次捐献运输车 100 辆。1938 年秋至 1939 年夏，华侨捐献的寒衣、暑衣、蚊帐有 1000 万袋。巴达维亚侨胞两年内，献出治恶性疟疾的奎宁丸 1 亿粒以上，足够 500 万人服用。

在支援祖国抗战的筹赈活动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例。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制定了《菲律宾华侨在国难期中实行节约规则十一条》，得到侨胞热烈响应。马尼拉侨胞倡议举行集体婚礼，将节省的婚费捐献祖国难民。香港开展“一碗饭”运动，得到了普遍响应。许多华侨家境清贫，但爱国心切，从微薄的工资中每月挤出 1／10 奉献祖国。南洋一对新婚夫妇，把结婚收受的重礼毅然全部捐献。缅甸女侨胞叶秋莲，在认购国民政府的公债中，将产业和首饰全部拍卖，变款 3 万元，不要债票，尽数捐献，然后自己入寺为尼。马来亚乞丐赖凉，年逾花甲，每天乞得 4 角 4 分，除饭费外，尚余 3 角，他手持木杖到救难会，把余钱献出，他说：“余虽行乞，尚能平安度日，较之祖国难民，饥号啼哭，家破人亡，则优得多矣！”北婆罗洲山打根的华侨郑潮炯，虽是个小商贩，可是他为了赈济国内难民，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辛劳所得捐献出来。1940 年 7 月，他还将自己的第 4 个儿子卖给当地赵姓侨胞，得 80 万，又变卖了金饰，全部交给筹赈会。然后他离家去四方义卖瓜子，同时向爱国华侨大声疾呼，宣讲抗日道理和国内同胞的苦难，感动了侨胞。他历经纳闽、汶莱、古晋、诗巫等地，后又往新加坡、柔佛义卖瓜于达一年余，前后共集义款 4000 万余元，全数就地交给各筹赈会汇往祖国。他的卓著成绩和坚毅不拔精神，不仅受到南洋华侨的赞誉也受到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和侨务委员会的褒扬，分别奖以“抗战建国”纪念章和“义举堪风”奖章。

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说：在各地救亡团体组织下，海外侨胞“对祖国战区难民之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未曾有”。当时募捐的方式很多，有特别捐、年捐、月捐、节日捐、娱乐捐、婚丧事节约捐、航空救国捐、义演义卖、献金献礼等 10 多种。南侨总会马来亚槟榔屿

分会、新加坡分会分别发出《劝募长期月捐宣言》和《扩大推选常月捐宣言》，提出：“华侨助赈祖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大众都来认月捐，抗战一日不停，我们的月捐也就不断缴下去，直至民族得解放为止”。在他们的影响和各救亡团体的推动下，广大华侨奋起响应，南洋华侨每月认捐 700 万元。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带头认捐，直至抗战胜利为止，每月捐国币 2000 元。他说：“我们如果终日只知赚钱，不知救国，纵然发了财，但是做奴隶，做亡国奴，发了财有何用”。陈嘉庚将巨款捐给祖国，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简朴，连蚊帐破了也是自己补。

广大侨胞特别是青年，放弃自己的学业，辞去自己的职业，告别亲爱的妻子儿女，离开温暖舒适的家庭，在华侨救亡团体的组织和资助下，回到祖国，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参加神圣的抗战。在祖国各个抗日战场上，既有华侨留下的脚印，也有华侨洒下的热血。爪哇归国华侨女青年李林，1937 年春回国后即投奔八路军，由于她智勇双全，不久就成为八路军一名基层指挥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晋绥一带战场指挥战斗时，壮烈牺牲，时年 24 岁。在广惠战役中，由 22 人组成的一支华侨服务队，有 20 人牺牲在战场上。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团长，中共党员沈尔七，1938 年初率团参加新四军、后被评为“模范军人”，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 28 岁。华侨飞行员林日尊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晋升为中尉飞行队长，1940 年 5 月在成都迎击日机时，不幸中弹牺牲。

此外，爱国华侨还积极组织起来参加侨居地的抗日斗争，配合盟军的反日本法西斯战争。如 1941 年 12 月 30 日侨总会在中华总商会召集全市性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组织了“星华义勇军”，经短期训练后即赴前线作战，浴血奋战 8 天，后因英军投降才解散。在菲律宾，华侨抗日武装有“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和“菲律宾民主战地血干团”。1943 年，英国经济作战部马来亚支部和重庆国民政府合作组织了“一三六部队”，骨干是因战争而滞留在印度的 2000 多名海员，其中大部分是华侨。他们在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受训后，乘潜艇或空降到马来亚，战争结束前，共潜入 18 批，在马来亚敌后进行抗日活动和搜集情报。其领导人林谋盛于 1944 年 3 月被捕，“迭遭刑讯不屈”，牺牲时年仅 35 岁。新加坡政府于 1954 年建立了林谋盛烈士纪念塔，以表彰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

陈嘉庚回国考察

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他曾经倾其家产为华侨和祖国办学。兴学之初，正值同盟会革命党人反清浪潮风起云涌，他深感“富国必先启智”，毅然将新加坡的产业交给才去新加坡不久的敬贤经营，而自己回福建集美办学，随后又在新加坡创办华侨中学，接着又派敬贤回乡办女子学校，不久自己又回国操办厦门大学，他是厦门大学的“校祖”。抗战爆发后，在南洋，陈嘉庚等爱国华侨领袖联络各界人士，在马来亚各地组织华侨救国救亡的联合组织，激发了广大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的激情，增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

1940 年 3 月 26 日，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劳考察团到达重庆。欢迎会异常隆重，记者如潮，各界知名人士蜂涌而至。陈嘉庚在人们的簇拥下，缓缓步入大堂。他扫视了一眼会场，看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他说：“我离开祖国已十八九年了，对于国内的情形，很欠明悉；但是，我有一颗赤子心，这

颗心与祖国同在。”他脱下礼帽，向全体到会者鞠了一躬，继续说：“我对全国人民的抗战表示敬意，更对牺牲的抗战将士表示敬意。我要尽可能地走到抗战的每一处地方，带去我们海外侨胞的敬意，若八路军所在地延安能够到达，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最后，陈嘉庚情绪激动，调高了嗓门继续说道：“大家拿出有用的金钱，帮助抗战，以精诚团结的精神，战胜日本人！”当晚，陈嘉庚一行住进了嘉陵招待所。陈嘉庚这次组团回国除了慰劳祖国抗战的将士和人民之外，他还带着在国外听到国内的两大问题来进行实地考察：一是重庆政府当局各路要员生活奢华、贪污腐败现象；二是国共双方常有磨擦，而责任据说在共产党一方。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在海外宣传发动侨胞支援抗战的大事。事实真相如何，他要亲自看个究竟。

陈嘉庚当时是南洋华侨巨富之一，资产最多时达 1200 万元，但绝大多数资产都被用来办教育了。抗战爆发后，他对祖国抗战的贡献，更誉满海内外，不仅颇受各界爱国人士敬仰,连蒋介石对这位年已 67 岁的爱国老人也格外垂青。陈嘉庚来到重庆之前，蒋介石责成有关部门作了热烈欢迎和盛情招待的准备，重庆当局拨出 8 万元巨款做招待费，大小官员也想在各类宴会上大显身手。但是，陈嘉庚知道这一准备的情况后，于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 3 月 27 日，在重庆各报都刊载了他的一则标题为《辞谢无谓应酬》的启事：“敬启者，余今日到达重庆，闻政府筹备巨款，准备招待慰问团，余实感谢。然慰问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况且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以免浪费资财，耗费时间，妨碍工作，影响民风。今后如遇无谓应酬，慰劳团当即辞谢，恳望政府及社会原谅。陈嘉庚。”

3 月 28 日，蒋介石在重庆励志社 3 楼非常友善地接见了陈嘉庚，陪同接见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布雷、吴铁城、朱家骅和监察委员邵力子等。陈嘉庚刚到重庆因有约法三章公布于众，所以蒋介石宴会显得比较冷清。在宴会上，只有四五种菜，陈嘉庚对此较满意。不日，白崇禧亦举行招待会。这位有“小诸葛”之誉的人物，在陈嘉庚勉为其难的笑脸后面，洞察了陈嘉庚的心中忧虑，故恳辞恳句，试探问道：“先生心中有虑，但说无妨。”陈嘉庚看了白崇禧一眼，问道：“白将军知我心中有事？”白崇禧说：“我猜测错了。”“没错，”陈嘉庚说，“人说白将军乃儒将，赛过孔明先生，果然如此。”“陈先生过奖了。”陈嘉庚说：“我虽在海外多年，国内形势不可不察，风闻国共两党不和。如果真这样，日寇横行，黎民百姓惨遭屠杀，那将国无宁日，无国无家。”白崇禧一听，在心中计谋了一下。心想：在陈先生面前做个好人，何乐不为？就说：“先生忧虑极是。国共两党不和，已非朝夕之日。”“果真有此事？”陈嘉庚面色顿露不悦。“是有此事。”白崇禧说。陈嘉庚叹息一声说：“实乃国家不幸。此种情况，无异于自杀矣！”白崇禧说：“先生不必忧伤，我白某不才，但能纵观天下大势。国共两党，与我交谊皆深，我愿行调解，一致抗日。”陈嘉庚慢悠悠地说：“若将军能从中说合，一致对外，实国家民族无穷之福也。”白崇禧在陈嘉庚面前巧言利嘴，得到的也只有陈先生随身带的一贴虎头牌膏药。白崇禧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又来宴请。朱自然不能与白相匹。但朱又不能违背上头旨意。明知陈嘉庚不愿意踏党派之争的混水，仍要硬着头皮恳请。遭到拒绝。中共驻重庆的负责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也来到嘉陵宾馆陈嘉庚的寓室。他们 3 人对这位爱国老人也是很崇敬的，为陈嘉庚和慰劳团带来一份薄礼：3

件延安产的羊皮大衣。陈嘉庚感觉到中共的诚意，欣然接受。在双方促膝交谈中，当陈嘉庚听到叶剑英等人表示赞成设法调解国共纠纷时，他说：“余到此地后，获悉两党恶感严重，心中焦灼莫可言喻。今闻诸群诚意，实我民族无穷之幸福。”隔了几天，陈嘉庚又到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参加了茶话会。不久，毛泽东自延安来电报邀请他访问延安。

陈嘉庚一行在重庆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倾听军政要人谈政情、战况，会见各界人士，参加集会发表演说等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广泛接触与现场视察。重庆的各种情形，当局要员挥金如土的作风，渐渐地使陈嘉庚大失所望。有人告诉陈嘉庚，重庆嘉陵村是政府要员居住较集中的地方，有许多新建的漂亮楼房，其中嘉陵宾馆宏伟新颖，就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私人经营的。陈老开始不相信。心想他所侨居的新加坡英政府，为防止官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规定公务人员不能私设营业，不得买卖土地等，违者一律开革科罚。堂堂行政院长怎会开起宾馆来呢？凑巧，蒋介石设公宴招待陈嘉庚和慰劳人员，就在嘉陵宾馆举行。陈嘉庚在孔祥熙亲自陪同下仔细观察了这里的设施并与孔祥熙交谈之后，生气地向孔祥熙问道：“在国内，服官人员可以私设营业？”孔没有料到他会有此一问，一时无言可答。几十天的重庆生活，虽给陈嘉庚内心深处罩上了层层伤感与忧虑，对孔祥熙私营嘉陵宾馆这件事，内心平静不下来，但为了维护抗战大局，他没有公开谴责什么人。仅是在私下对友人说：“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十几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

5 月 1 日，南洋华侨归国慰劳考察团由重庆分几路赴各地慰劳考察。陈嘉庚等人由成都取道赴西安、延安等地考察。蒋介石知道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的消息后，大为震动，决定亲自出面阻挠，以防陈嘉庚被“赤化”。5 月 5 日，蒋介石在成都蒋的官邸设午宴招待陈，并让宋美龄出席作陪。宴毕，蒋、陈在客厅叙谈时，蒋忽然间：“嘉庚兄要从成都到哪里？”陈说：“要到兰州、西安，如果有车也要去延安看看。”蒋说：“共产党不认祖国，最无民族思想，一向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只知抢夺地盘，笼络人心，先生何苦去那个地方。抗战以来，我宽恕他们，但他们制造磨擦，争夺地盘，破坏抗战……”陈嘉庚待他把话说完，慢慢地说道：“余代表华侨回国慰问考察，怎可察一隅而不窥全豹？延安也是中国的土地呀！凡交通未受阻的重要区域，都要亲自前往，以便返回南洋后能向华侨敬告真实情况。” 5 月 31 日下午 5 时，陈嘉庚到达延安，不知怎的，竟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激情。延安绝对没有重庆的繁华。甚至可以说大自然也并不厚爱他们，可谓满目黄土，偶尔一棵绿树，在苍凉的黄土高坡上，也像是一个艰难跋涉的旅人。可是，她有一种群情激荡，奋发向上的蓬勃生机。当时有 5000 余名群众集合欢迎。陈嘉庚到延安后，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同他就国共两党团结问题进行十分诚恳的畅谈。为使他更广泛接触更深入地了解延安的真实情况，边区政府安排了非党人士、开明士绅、南洋华侨学生、商人和农民与他座谈。陈嘉庚从这些人士中获悉，对私人商业政府不抽营业税；政府没有没收农民的土地；政府官员无薪俸，实行供给制，农民的生活甚至比机关的普通干部还好；边区政府组成人员实行“三三制”，县长、乡长一概由人民选举；各级干部贪污 50 元以上者革职，贪污 500 元以上者枪毙，绝不袒护……以及延安官兵

一致等种种情形都是在重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两党行为的鲜明对比。因此，6 月 7 日晚他在延安各界欢送大会上兴奋地说：“ 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方面对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延安地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兴奋。 ” 6 月 8 日陈嘉庚离开延安后，又去了许多地方考察。6 月 20 日在洛阳发表谈话说：“ 无论从正面、侧面考察，中共均在诚意实行三民主义 ”。

7 月 17 日，陈嘉庚重返重庆。 24 日晚应国民政府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邀，他在重庆留法、比、瑞同学会礼堂以《南北观感》为题发表演讲，能容几百人的礼堂挤满了听众，其中新闻记者不少。在热烈的掌声中，陈嘉庚开始演讲。他简略地叙述了往西北各地的经过后，话锋一转，就畅谈起延安的情况来，从路线、方针、政策谈到延安的社会现象，与会者感到十分新鲜。会后，重庆 11 家报纸，有 5 家发了《西北观感》的摘要，有 5 家哑口无声，中共的《新华日报》先发消息，并以大量版面报道《西北观感》的详细内容。这把蒋介石触怒了。7 月 28 日、29 日蒋介石在连续召见和宴请陈嘉庚时，威逼试探对国民党的意见，陈嘉庚还是和颜悦色地解释说：“ 蒋委员长勿生气，华侨心里甚盼祖国团结，一致对外，若内部事，待胜利后解决为好。” “ 国内国民党之事，实在无以为答。 ”陈嘉庚离开重庆到西南考察时，朱家骅代表蒋介石送行。后来他还到福建家乡考察。

陈嘉庚对毛泽东很崇敬。他身居海外，忧国忧民，国内精英，已不知在他的脑海中思考了多少遍。尽管还没有把毛泽东摆到蒋介石同等位置上，但他始终认为毛泽东是个人物。延安之行后，他更加清醒地明晰地认识了毛泽东。认为毛泽东不仅仅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而且是有雄才大略的济世人才，甚至有了假以时日，也无法匹敌的想法。

1940 年 12 月 9 日陈嘉庚离开祖国。12 月 15 日在缅甸仰光向华侨作了 3 个小时的报告。他用极其乐观的语气向与会华侨提出：“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鬼子哑巴吃黄连

长江出海口北部，是一块伸向黄海的半岛形的平原。平原上，河川似网。这是一块富饶的土地；海边出盐，河里出鱼，地里出棉花和大米。它的南边，和崇明隔江相望，再向南就是上海了。1941 年春天，新四军 1 师 3 旅在那里正式成立了军分区司令部。以后，这块土地，称为“ 苏中第四区 ”。四分区包括南通、余东、启东和海门等四个县。东西不到 100 公里，南北不过 50 公里。地方不大，但它成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它控制着长江的出海口，控制着上海通往苏北的交通线，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极为重要，成了敌我必争之地！

为了征服这块土地，敌人对四分区实施残酷的“ 清乡 ”，使四分区根据地的军民，面临着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党早已在军民中做了动员，做好了反“ 清乡 ”的准备。虽然这样，但人们并不知道“ 清乡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干部和群众在开始时都有些摸不到底。

在敌人还未布置完毕、站稳脚跟时，我们的主力部队乘敌人调防的空隙，一连摧毁了金沙、余东、悦来、曹家埠等据点，拔除了 40 多座碉堡。然后，主力便转移了。我们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在新的形势面前，也大力缩减人员，配上精干的武装，与敌人周旋。民兵也成立了锄奸队等组织，到处打击敌人，

等敌人疲劳松懈的时候，就抓紧战机伏击它。在南坎等地打了伏击战，大大杀伤了敌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敌人连连受挫以后，便在四分区的重要路口上，都筑起了望台。每个台上，备有竹竿 3 支，麻绳 3 根，响锣 1 面，符号 3 个——△∪○3 种。如果发现新四军或民兵经过，台上人就打起锣来，并按发现我们的人数，分别竖起 1 根、2 根或 3 根竹竿，当作标记。同时，要立即派人报告。报告时言语不通，就用符号表示：△表示我们来了 10 个人以下；　∪表示是 20 个人左右；○表示来了 30 个人以上。因为这样的台太多了，伪军应付不过来，他们只好在保甲中摊派人来分班了望。开始的时候，太阳出山起了望，到午夜时分就结束。后来敌军连连吃败仗，心里害怕民兵和新四军在深更半夜里摸进来，要他们的狗命，所以强迫着民夫，夜以继日地站在台上了望。

敌军时常出来查岗，查岗时民夫必须恭恭敬敬地立正、行礼，如不行礼或稍有点不恭敬，就要被拳打脚踢。若是有人在睡觉，那更会被一顿毒打，甚至有被打死的。因此群众都恨之入骨。

随着斗争的逐步开展，群众斗争情绪高涨起来了，无论老幼与妇女，农民与开明士绅，都一致起来投进了反“清乡”的洪涛里。在敌人刚开始“清乡”时，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等死不如拚命！”这是四分区人民在实际斗争中得出来的经验，同时，也是最富有行动意义的口号。

敌军还恐怕民夫有通新四军或民兵的，他们有时打扮成民兵的样子，向了望台走来。敌军这样笨拙的把戏，早被我们察觉了。针对敌人的阴谋，民兵干部就发动民夫将计就计粉碎他们的阴谋。有一天，探得了消息，晚上敌军又要化装外出，民夫们就准备了好几根又粗又重的木棍，单等他们来到。半夜里，有两个穿新四军服装的人，向了望台走来。民夫们伏在暗处，等这两人走近了，呼地一下，两面涌上来，紧紧地将他抱住按在地上。拉到灯光下一看，不是鬼子还有谁！于是他们不等敌人分辩，就用布条把他们嘴巴塞住，用准备好的大木棍，没命地死揍。一面派一个民兵敲起锣来，拿了一个△的符号，去报告镇上的敌人。镇人的敌人还夸奖了几句，说是：“忠心大大的。”随着就向了望台走来。等他们来到了望台，那两个化装的敌人，已经被揍得半死半活。拿大棍的民夫，见镇上的敌人来了，还上前说道：“新四军的，我们的打！”

敌人再也不敢耍这套把戏了。

浙东抗日第一枪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在全国开辟了 19 块解放区，浙东解放区是其中的一个。浙东游击纵队是新四军的一部分，建立较晚，是一支年轻的抗日武装。

浙东，紧靠着沪、杭、甬三角地区，面对白浪滔滔的东海。全境共十几个县，山区多，有四明、会稽两道山脉；万山重迭，南抵天台山，西达天目山，北靠杭州湾。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交通方便，是侵华日军进行经济掠夺、“以战养战”的命脉所在，是国民党统治较强的地区，是盟军实施反攻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军发展东南沿海游击战争的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抗战初期，党的组织在浙东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大批地下党员在乡村和

城镇中，积极发动群众，联合进步人士，宣传抗日。1941 年初，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被国民党暗害，浙东的地下党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就在那黑暗的年月里，浙东人民仍在逆风恶浪中，英勇不屈地战斗着。

浙东是戚继光宗祠的遗址。浙东人民对于这位三四百年前的明代的抗日民族英雄是很崇敬的。当年，戚继光奉令到浙东防御倭寇的时候，才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那时候，由于朝廷放松了沿海的防务，一度平息的倭寇又猖撅了起来。当时，日本的一些破落封建武士和溃兵败将，纠集大批流氓、奸商和海盗，勾结浙江沿海一带的汉奸、土匪，不断在沿海杀人放火，抢劫财物，甚至深入到南京、安徽歙县一带。戚继光来到浙东以后，经过几年的努力，组织起一支拥有数千人的、训练有素的“ 戚家军 ”，并终于在 1561 年，也就是他 31 岁的那一年，全部平息了侵入浙江的倭寇。戚继光在游源屯过兵，并以这一带山区为基地，沿姚江往东打，把倭寇逐出了国土。戚继光为我中华民族消除了一大祸患，成为抗日英雄。所以，老百姓把他当作再生父母，为他塑像、造祠堂，世世代代地纪念他。这位古代抗日英雄对于广大浙东抗日军民的召唤和鼓舞是可想而知的。

1941 年夏天，日寇从镇海要塞登陆，几天之内，宁波、慈溪、余姚、绍兴相继沦陷，国民党数万大军一枪不发，向浙赣线溃逃。富饶的浙江，就此大部沦入敌手了。当地群众气愤地看到，国民党大军不战而溃、弃人民于不顾；而当日伪军在梁弄设立据点，恣意蹂躏群众时，尽管周围也还有国民党的什么“ 忠救军 ”、“ 国民兵团 ”等部队，却依旧坐视不救，公然以做汉奸、当卖国贼为荣。淳朴的山区人民，虽说见识不多，可在他们的心目中，什么是忠，什么是奸；什么是真，什么是伪，还是一清二楚的。这时候，浙东地下党从斗争中，从流血牺牲的惨痛教训中得出一条宝贵的经验：革命、抗日，都要有自己的武装。为了组织群众抗战，他们纷纷拿起枪杆，搞起武装。余姚县委会首先建立了余上自卫大队，慈溪、镇海县委会也建立了小型游击队。不久，华中局又先后派了姜文光、朱人俊、蔡群帆、林友漳等同志率领几支部队从浦东渡杭州湾到泊东来进行敌后抗战。

秋天，党组织又委派了谭启龙同志来浙东肩负起党的领导工作。整个浙东，北起杭州湾，东达舟山群岛，南至会稽山、金华山，绵延数百里，都已燃起抗日的烽火，都已有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大小不同的抗日根据地。尽管当时浙东各地的抗日武装，暂时都还不够强大，而且是被敌人分割着的；但浙东抗日武装毕竟是诞生了。从此，浙东的抗日烽火就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1941 年 6 月 18 日，是浙东抗日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清早，太阳刚打海上升起，照着一抹无边的庞东盐场。高高的盐墩，石砌的房屋，像塔楼似的飘荡着袅袅的炊烟。突然，在高高的海塘西头露出了一面“ 膏药旗 ”，旗后一群日本兵穿着大皮鞋，扛着三八枪，叱喝着，耀武扬威地朝东南的相公殿走去。庵东镇上的地主许先一，一听说“ 日本佬 ”来了，吓得慌了手脚，连忙吩咐雇工带着他的三个宝贝女儿，逃到北边的亲戚家里避风去了。雇工抱着、牵着这三个东家的小囡，气喘吁吁的走了约莫二里路，见前面走来一支军队。这支军队，不像日本佬，也不像国民党部队，他们穿得杂七杂八，有工人装，有学生服，有蓝布袄……有几个人正在路边拔芦苇和青蒿草把自己伪装起来。

雇工看着这支奇怪的军队，脸上露出了又惊奇又怀疑的神色。在这三北地界，不，就在整个浙东，还从来没有一支中国军队敢向日本佬打一枪！其

实，这支部队站在路边不走了，难道敢跟日本佬较量吗？雇工心里疑惑这是一支什么队伍呢？这就是由蔡群帆、林有璋率领的前天刚从浦东渡海过来，专门到浙东来打日本鬼子的 5 支队。当雇工得知这支部队是专门来打日寇的，身上顿时热血沸腾。他立即带了 5 支队进了自己东家的大瓦房。中午了，部队还没有吃饭，他以“半个主人”的身分煮了点青豆子请大家吃。可是 5 支队的人客气得一颗都不吃。“不吃豆，那喝茶吧！”他又忙着在各班面前放上一壶清凉的藿香茶，部队喝了水，却每一壶都付了两角钱。

啊！这真是一支从未见过的军队。

太阳偏西了，相公殿方向，敌人乱放了一阵掷弹筒，表示他们要开锣喝道，“开路开路”的了。

在海塘通道的盐墩上，5 支队的全体指战员已经埋伏好，大家把手里的步枪架在墩子上，子弹全部推上了膛。3 挺轻机枪也趴着小钢腿像小老虎一样伏在地上，枪口朝着大路。在林副大队长的身旁，雇工也像个战士一样卧倒，他不时用手指点着相公殿方向，突然小声地对身旁的林副大队长说：“看，鬼子出动了。”

日本兵进入了伏击圈。林副大队长把手里的驳壳枪一扬，“乓”地一声，信号枪响了，接着，机枪、步枪咯咯咯、乓乓乓向海塘直射过去。刚进伏击圈的大队日兵顿时慌了手脚，在乱嘈嘈的叫喊声中，只见已经横倒了好几个。日军不知道是从哪里射出的子弹，毫无目标地架起掷弹筒来还击，“通——通——”一发发掷弹筒炮弹，在离盐墩老远的田埂上炸起团团火花。

打了一个多钟头，当场打死打伤日军 8 人，迫使敌人弃尸 2 具狼狈溃逃。首战相公殿，打响了浦东部队南渡后的浙东抗战的第一枪。这一仗，使日本侵略者大为震惊，因为他们从入侵浙东以来，还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打击。这一阵清脆嘹亮的枪声，震醒了沉沦在苦难中的浙东人民，敌后人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只是两个月前，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近 10 万人不战而逃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如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群众奔走相告：“真正抗日的队伍来了！”

小羊馆与小八路

1941 年 7 月，由于日军到处扫荡，我军挺进卫生部一所的部分伤病员，转移到滦水县板城以西的一条大山沟里。这条山沟有几十里长，沟两侧是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沟内被茂密的树冠笼罩着，阴森森的，没有住家，平常很少有人进山，只有冬季农闲时，附近的农民，才到这里烧炭，卫生所就设在这座大炭窑里，这里是比较偏僻、安全的。可没料到，卫生所进沟半月后，敌人在沟口安了个临时据点，把沟口堵得严严实实，从 7 月底到 10 月初的两个多月里，由于和山下失去了联系，没有粮食，没有药物。最难熬的是没盐吃，山沟里有的只是野菜、树叶，长时间吃不到盐，浑身上下发软、没劲。原来大多数伤员还能拄着棍儿，或互相搀扶着，到窑外散步、采野菜，这一来，真的全都躺下了，炊事班长急得直骂。为了让大家能吃上饭，班长用“望梅止渴”的办法，在吃饭时让大家每人讲一个盐的故事，天南海北，咸盐的故事越讲越多，越讲越有意思，野菜吃得也多了，整日愁容的班长也露出了笑容。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每天是那么几个故事，新的又编不出来，没多久，“咸盐精神大会餐”也“会”不起来了。炭窑内渐渐地又沉默了。

一天，卫生所里那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小伤员正在转山沟挖野菜，忽然传来一阵咩咩的叫声，原来是两个放羊的小孩，赶着一群羊向这边走来，大的十四、五岁，穿身黑衣服，半新的布鞋，圆脸上的肥肉差点把那小死鱼眼给挤没了；小的十二、三岁，光背，一条挽到膝盖的又破又黑的裤子，赤着脚，那双明亮的大眼睛，透着聪明、机智。“小八路”惊喜得差点叫起来，“哪村的？”小伤员马上警惕地询问起来，原来这两个小孩是沟外的，大点胖点的是小东家，小点的是小伙计，因为怕鬼子抢羊，所以跑进深沟放羊，沟口的鬼子还正在修炮楼，准备长住那儿，看来伤病员们还得在山上住一段时间。从此以后，3 个小孩天天见面，很快熟悉了，他们放羊，小八路边挖菜边讲打日军的故事，教他们唱歌，聪明的小羊倌一学就会，可傻呆的小东家怎么学也不会，唱的时候跑调不说，就跟老太太牙痛时的哼哼声差不多，笑得小八路小羊倌都直不起腰来。

一天中午，3 人在树荫下乘凉，小羊倌和小东家喝了几口清澈的泉水，掏出干粮吃了起来。小羊倌是玉米皮面蒸的饼子，小东家是黄橙橙的玉米面饼子，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哎呀’他们每人还有一块腌萝卜，顿时，馋涎欲滴，小八路赶快扭过脸去。“都响午了，你怎么不回去吃饭呀？”小羊倌望着太阳问，“没开饭那”，小八路支支唔唔地说。“你饿了吧？”“不……饿。”说不饿是假的，两个多月来，每天的三顿饭，都是不像样的清水煮野菜，没吃过一粒粮食，没尝过一次咸味。特别是望见那块青青的咸萝卜，满腹内，顿时产生一种说不清的难受滋味。后来，小羊倌知道小八路好久好久没吃到盐了，边埋怨边给他一块咸萝卜，他把萝卜推了回去，小羊倌不高兴了，“一家人还分你我，”他像大人似的板起脸，小八路看他真生气了，只好把萝卜接过来，又从口袋里掏出两元钱，可他说什么也不要，“你要是不要钱，我就不要你的腌萝卜！”小八路一手拿着钱，一手拿着萝卜，认真地说。小羊倌摇了摇头说：“这不是真心话！”小羊倌说对了，小八路特想要这块咸萝卜，这虽是一块咸菜，却让伤员们望眼欲穿，也许那些重伤员们，吃了这点咸菜，伤会慢慢地好起来。可是有纪律呀，不要钱，小八路是不能拿的呀！乘着小羊倌去放羊的时候，小八路把钱往他褡裢里一塞，拔腿就跑，小羊倌在后面追着叫着，小八路顾不得伤痛，也不怕石头绊倒，飞快地往回跑着，渐渐地，小羊倌的喊声越来越远。

看到炭窑了，小八路高兴得像举着珍宝似的高高地举着那块咸萝卜喊：“你们看，这是什么？”“呀！腌萝卜”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惊喜地叫起来。小八路像个凯旋而归的英雄，被几个轻伤员包围起来，有的帮忙擦汗，有的递过来一碗凉开水，炊事班长像得到宝贝似的，小心翼翼地把腌萝卜放在案板上，用刀切成薄薄的小片。重伤员厚些，轻伤员薄些，小八路因为有“功”，享受重伤员的待遇，“嘿，又咸又脆！”这个说；“要是每顿有这么一块，我也心满意足了。”那个又说。大家兴高彩烈地边吃边说，像过节似的。小八路把弄到咸菜的经过，向大家作了汇报，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围绕着怎么多搞点盐和咸菜议论开了，最后一致同意，只要能买到花多少钱都行。大家你 10 元，我 5 元，他 3 元，也有 1 元的，倾尽全力凑了一些钱。第二天，小八路见到小羊倌一说，小羊倌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真小看人，八路军吃块咸菜也要钱，真是的！”说着，把昨天小八路给的钱，也扔到了小八路跟前，小八路赶快解释部队有纪律，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要自觉执行的。小羊倌说：“是我送的，慰劳八路军的行吗？”说完，往石头上

一躺，不理小八路了。没办法，小八路只好去找小东家，可小东家只是傻呆呆地摇头，小羊倌看了，忽地坐起来，解释说：“老东家不让多拿！”停了一会，小羊倌像想起什么事似地眨了眨眼，从石头上跳下来，非常高兴地向小八路说：“咱们玩猜猜吧！你赢了我们拿咸菜，要是你输了拿边区票。行吗？”小八路还没来得及回答，小东家就高兴地叫起来：“行行！”这不是赌博吗？八路军怎么能和老百姓赌博呢？小羊倌看着小八路愣住了。就又挤眼，又打手势，小八路看他老是背着小东家，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又不好问，只好依从了。3 个人怎么玩呢？还是小羊倌出主意，他和小东家一伙，小八路一个做一方。因小东家傻乎乎的，由小羊倌和小八路对阵，就这样玩起来了：“猜猜猜！”小八路都伸出来了，小羊倌才出拳，结果输了。小羊倌高兴地笑了，扭过脸对小东家说：“掏咸菜！”小东家白瞪了小羊倌一眼，很不情愿地给小八路一个大萝卜，原来是小羊倌故意输的，让小八路赢咸菜，这可不行，小八路可不想对群众“坑蒙拐骗”，便也想法后出拳，“猜猜猜！”小八路故意输了，小羊倌气得跺脚，不玩了。小东家接过钱，美美的数了几遍，也数不清，原来小东家不识数。一个月过去了，差不多每天小八路都可以赢一个咸萝卜，想多赢也不行，老东家不让多带。小东家不知道玩“猜猜猜”的奥妙，只知道每天拿大个的，把赢的钱，藏在炕洞里，等过年的时候买鞭炮玩。从此，伤员们每人每天都能分到一大片咸菜，结束了没盐吃的生活。

10 月中旬，平西反“扫荡”取得了伟大胜利。卫生部派了人，带着担架，把伤员送到赵各庄。正要出发，小羊倌来了，他双手递给小八路一个大咸萝卜和一包东西。俩人紧紧地握住手，饱含着依依惜别的泪花，久久地互相凝望着。小八路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包，原来是一大块盐、水晶般的盐块，在灿烂的夕阳照耀下，闪闪发光，耀眼夺目，如同小羊倌对八路军的那颗透亮晶莹可贵的心。小八路把它紧紧地抱在胸前，望着那扬鞭远去的小羊倌。

深情厚义“四家饭

1942 年初，新四军第 7 师挺进团在皖西宿松、太湖一带开展抗日工作，受到国民党桂系顽固军阀及土顽、土伪的联合进攻。我军在许家岭地区奋战了 8 昼夜，指导员和刘金生连长负了重伤，在担架上随着部队突围后，组织上决定把他们留在山区休养，派了 2 个小通信员护理他们。由于当时反动势力猖獗，大股小股的顽军到处流窜。他们又没有和地方取得联系，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困难。2 个重伤员也没有固定的住处，吃的也是饥一顿饱一顿，通信员小陈和小邢好不容易才在阎王寨附近找到一个僻静的小山洞，把 2 个重伤员背进去隐蔽起来。荆丛和枯草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走到跟前也难发现。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可是，过了两天，一点吃的也没有了，实在饥饿难耐，不得已，只好派小陈下山去找点吃的。

过了几个钟头，小陈从外边爬进洞来，两手空空的，大家一见，非常失望，刘连长禁不住地问：“怎么，没搞到吃的？”小陈两只眼闪着快乐的光芒，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我找到了一个老大娘……”“什么老大娘？”大家都楞住了，难道小陈在这附近碰到了什么亲戚，不，这是不可能的，“究竟是什么人啊？你对他说了些什么？”大家都不安起来。小陈嘿嘿地笑了两声，更加得意地说：“一个好大娘，她一口答应要给我们送饭，我还领她上

来看过道路呢！”他这一说，大家大吃一惊。“小陈呀，你一向满机灵，今天怎么这样粗心大意呢！现在这种情况，这又是个什么样的老大娘呢。”望着大家那惊疑的责怪的眼光，小陈赶忙把事情的经过向大家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

原来他下山后，发现山脚下有点灯光，便悄悄地走过去一看，是间非常破旧的草屋，屋里有 4 个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大娘，一个大嫂子，还有 2 个面黄饥瘦的孩子。小陈进屋后，就问老大娘是否能卖给点粮食，老大娘说家里没有粮食，并问小陈是干什么的。小陈看了看，这家人家真是穷得除了四壁和 4 口人一床千孔百疮的破被子外，什么也没有。他想，这样的人家都是被反动势力压迫的，穷人的心都是向着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就向老大娘实话实说自己是新四军。这一说，老大娘马上就亲热起来，忙问是干什么的，有几个人，住在什么地方。小陈支吾着只是问有粮食没有，没说其它的，老大娘脸色一下就变了说：“你这个娃娃呀！不相信我这个穷老婆子！我懂，新四军就是往年的红军，红军还信不过穷人！”小陈听了老大娘的话一想，这个地区早在 10 年前就是红军根据地，听老大娘的口气，她是热爱红军的，于是就把洞里缺粮的事说了。老大娘一听，一把拉住他，想了一下说：“孩子，你放心吧，既然到我这儿了，我总不能让你们饿着。你先给我指指你们住的地方，等天亮了，我把饭做好了，给你们送去。走吧，你不能在这多等，土匪和伪军经常到这乱窜”。小陈说完。接着对大家说：“你们放心吧，我敢保证，老大娘的话是真心实意的，她是可以相信的。”这一夜，埋怨和感激搅动着大家的心。如果小陈错信了人，被告了密呢……唉！小陈太直心眼了！可是，如果老大娘真的送饭来了呢，那又多疑了。“呼呼呼！”小陈睡得真香，看来他是深信不会看错人的。与大家的看法不同。

天刚蒙蒙亮，小陈起来就往洞外爬，小邢抓住他问：“你上哪去？”小陈笑着说：“去等老大娘！”不知小邢是担心小陈出事还是自己也想去，对他说：“咱俩一块去！”他们出去后，指导员和连长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一会，他们回来了，小邢先把半个身子探进洞来说：“指导员，连长，老大娘送饭来了！”接着，听见老大娘说：“里面这么黑呀！”指导员马上撑起身子想看看他，可那么黑，只能看见洞口一团黑影，便朝洞口说：“进来吧，大娘！”黑影越来越近，两只干枯而温暖的手，摸到指导员的脸上。刘连长和指导员几乎是同时叫了一声：“大娘！”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孩子，你们伤着哪啦？疼吗？唉！那些该死的反动派”！转过话头说：“你们住在这里很好，往后有事就找我吧。不要怕，这洞没人来。”大娘接着说，她在这山下住了几十年啦，从前红军就常在这山里住。红军在山下打土豪的时候，她家分过东西；红军给她打过柴，她给红军做过饭。大家听了这些话，心里踏实了，大娘实实在在是亲人，是一家人呀！刘连长感激地向大娘说：“大娘，山路不好走，您老人家上下不方便，以后，你替我们买点粮食就行了，要不，会连累你的！”大娘笑了，“你怎么说傻话呀！我这个穷样子拿钱去买粮食，人家准说来路不明，那才是害你大娘哩！你放心吧，大娘有饭吃就饿不着你们。”

天渐渐亮了，从洞口射进来的微光照到大娘脸上，同志们才略微看清了她的面庞。她脸上满是皱纹，发角上耷拉着一绺灰白的头发，嘴唇有些凹瘪，想是掉了几颗牙齿。大娘见天已大亮，才掂着篮子对小陈说：“快吃饭吧，看我光唠叨，饭都凉了！”说罢，起身要走，并嘱咐大家千万不要出去，以

免坏人知道了出事。小陈把大娘送出洞外，回头来把篮子揭开，得意地叫着：“呀！大娘真想得周到；看！有六谷子饭，红山芋、做菜，嘿！还有一些大米饭！……连长、指导员，这都是给你们的。”

从那天起，每天早上、傍晚，老大娘或大嫂子总是风雨不误给同志们送饭来，而这些饭，总有几种花样，除了六谷子，还有大米、山芋、黑豆，有时还掺着一些熬得烂熟的蔬菜。这些饭是怎么做成的呢？刘连长说，这饭很像“四家饭”。过去，有的人家为了孩子长命百岁，妈妈就向左邻右舍要些饭来，被称为“四家饭”，小陈听了连长的话，笑着说：“也许大娘给咱们弄的是四家饭吧！”真没料到，同志们吃的真是四家饭啊！这一天，大娘的8岁小孙女来送饭，她穿着一件长到膝盖的破棉袄，裤子很单薄，冻得发紫的脚指头，从张着口的鞋子里面伸出来。小邢接过了半篮子饭，亲切地问了一句：“奶奶呢？”孩子怯生生地靠在洞边，把小手放在嘴边，两只黑黑的小眼闪动着，一声不吭。小陈以为老人病了，又问了一句：“奶奶呢？是不是病了？”小女孩连连摇头，嘴里低声冒出一句话：“要饭去了！”“啊！”刘连长头上的伤还没好，往日不敢抬头，听到“要饭”两字，马上抬起头来惊叫了一声。他看了看指导员，又看了看那半篮子还冒着热气的杂七杂八的饭，眼泪快流出来了。“怎么，你……你们天天要饭？”小邢声音微微地抖着，一把抱住那孩子，望着她那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小女孩微微地点了几下头没说话。小陈忙着盛饭，听了这话，完全像呆了一样，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呀！小妹，你……你怎么不早说呢？”“奶奶不让说。”还有什么可问的呢？此时此刻，就是用千言万语，也道不出满腹的感激之情！大娘啊，大娘！这些天，同志们只觉得你和你的一家，是大家的亲人，是依靠，可是，怎么也没想到，吃的每一碗饭，每一粒米，都是你和孩子们踏破千门万户，讨来的啊！……同志们望着那半篮子饭，谁也没咽一口。

傍晚，连长和指导员派小陈下去见大娘，要求她从今以后再不要送饭了。可是大娘却随着小陈上山来了。连长和指导员听到她的声音，就赶忙爬到洞外去迎接，齐声叫着：“大娘！”老人不等他们再往下讲，就说：“孩子们，你们也不要客气，只要有大娘吃的，就有你们吃的。眼下，那些坏东西都驻在山下，说什么你们也不能下山。”对于这样的亲人，对于这样爱战士们唯恐不周，助战士们唯恐不力的亲人，大家还能说什么呢，大家只好把深情记在心里！大娘走后，小陈坐在洞口，拨开荆丛，向大娘走去的方向看了很久很久，用袄袖擦擦双眼，突然一昂头，拳头一挥，仿佛要一拳砸破这个旧世界。

在一个繁星闪闪的晚上，大家离开了那个住了4个多月的山洞，由小陈带路，到山下去同养活大家这么久的亲人告别。见到大娘，大家齐声地说：“大娘，我们要走了！我们永远忘不了你！”人在最激动的时候，嘴总是笨的。大家望着大娘和她的全家人，除了说出这句话，似乎什么也不会说了。大家一时都沉默了。借着星光可以看见两个孩子紧紧地依偎着大嫂，她们的眼光闪烁着。大娘轻轻地抚摸着刘连长和指导员的伤处，说道：“好吧，孩子们，要留也是留不住你们，大娘盼着你们早日打跑鬼子，早早打回来！大娘几辈子受穷，唯一指望的是你们！”指导员和刘金生同志都情不自禁地握住了老人的手，这双干枯的手，竟像钢筋铁骨一般坚实，使人精神振奋。大家懂得，老大娘的心意，正是大别山区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朦胧的夜色中，大家告别了大娘，告别了亲人。然而，不论走到何处，

大家都能感到大娘在身边，她那光辉而伟大的慈母形象，鼓舞着战士们前进。

兵民苏亭伏击战

在抗日战争中，有一个我军民结合以极少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一次被誉为模范伏击战的战例。这就是 1942 年 5 月 30 日，我八路军 29 师 769 团 3 连结合地方武装，在辽县（今左权县）县城以东苏亭进行的一次伏击战斗。

当时，日军对我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扫荡”。5 月 25 日，我八路军已完全跳出了敌人“铁壁合围”的包围圈，并立即决定就地疏散，乘机打击敌人。

769 团团直和 3 连疏散到拐儿镇以南桃园一带，并抽出 3 连寻机打击敌人。

27 日中午 12 点左右，7 区武委会主任刘玉堂和村长义呈祥来到团部，汇报了当地地方武装、民兵的组织和活动情况。最后说：从黄漳经苏亭到辽县县城，敌人运输很频繁，押运的日军有时一二百，有时二三百。在这条路上，民兵游击小组经常袭击敌人，因为我们力量有限，敌人没有遭到有力的打击，敌人因而十分麻痹。你们来了就好了，一定要狠狠揍一下这伙王八蛋，让鬼子也尝一尝铁拳的味道。当团长郑国仲说到部队正准备寻机打击敌人时，他们高兴地拍手叫好。刘玉堂还急忙说：“郑团长，打伏击，苏亭可是个好地方。”

苏亭确实是一个打埋伏的好地方。苏亭西有圪塔垴，东有价站山，村北是弯曲的河滩和路，隔河有东寺垴，东寺垴前面是陡岩，岩下的河滩大路成“己”字形。只要敌人钻进来，我们掐住两头，敌人就成了瓮中之鳖，砧上之脔。因此，我军决定在苏亭打一次伏击战。

28 日晚饭后，决定由 1 营教导员王亚朴带领 3 连 2 个排，到苏亭东寺垴埋伏。要求部队尽量往前伸，不留预备队，把所有兵力、火器用在刀刃上，要打得狠，打得突然，快打，快撤。如果是大股敌人，等敌人后卫部队进入伏击圈后再开火，给他一个大的杀伤；如果是小股敌人，就坚决打它一个歼灭战。

具体部署是：以 1 个排、2 挺机枪在东寺垴南面沟口山屹梁的断崖上，以 1 个排、l 挺机枪在北面沟口山屹梁上构成交叉火力；以半个班放在东寺垴前面的半山腰上，保障侧翼安全；以 1 个编村（就是中心村，相当于乡）民兵加部队的 1 名干部和 3 名战士，放在东寺垴西北高地上，阻止可能由沐池村方向前来抢占制高点之敌；另以 1 个编村民兵，隐蔽在东寺垴前面的石崖上，负责往下推石头。部署好后，村长义呈祥笑着说：“这一回是伏击战加滚石战，我们再在河滩上埋上几颗地雷，我看鬼子就是长上兔子的快腿，老鹰的翅膀，也跳不出我们摆下的天罗地网。”

29 日午夜，部队和民兵都按计划进入了阵地，并且连夜垒石头，修筑工事，进行伪装。

30 日凌晨，乌云密布，至 6 点左右又飘飘斜斜地下起了蒙蒙细雨，实在是一个打埋伏的好天气，真是天公作美啊！

中午 12 时左右，栗城日军 300 余名，押着 200 多民夫，还有 300 多匹骡马已沿着公路向苏亭走来。

大约下午 3 点左右，敌先头 9 个骑着大洋马的日军，头也不抬地进入了

我伏击圈。隔了一会，又过来 5 个骑兵。大概日军认为，离辽县城只有 5 公里路了，谁还敢在老虎嘴里拔牙呢？日军尖兵刚刚过去，大队人马就来了。走在头里的扛着日本旗，接着是 5 路纵队的步兵，前面的 10 多个日军还扛着大旗，摆出一副“凯旋”的架势。步兵后面是一群骑着马，腰挎指挥刀的家伙。再后面就是辎重队，大车、毛驴、洋马摆了一大串，上面装着抢来的东西。日军走过沟里一多半后，埋在大路上的一颗地雷被踏响了，炸死了 2 个，伤了 1 个。日军队伍忙闪到小路上。这时，1 个骑马的日军军官赶来指指划划咕噜了半天，于是先头部队停了下来，有几个工兵跑到前面去排雷。前面的日军虽然停下了，可是后面的日军还是一个劲地往前拥。大路上，河滩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和牲口，简直像赶骡马大会一样。除几个端枪的哨兵外，其余的大都背着枪，有的坐着，有的躺在路上，有的抽烟，有的伊伊呀呀唱着怪声怪气的小调。

埋伏在山崖上的我战士和民兵，按捺住激动的心情，等待指挥员下达战斗命令。直到敌人的后卫部队二三十个骑兵全部进了沟，王亚朴才向连长李长林点头示意。李长林高喊一声：“打！”3 挺机枪同时向敌群扫去，手榴弹也不停地在敌群中爆炸。这一下可热闹了！一里多长的山沟，霎时间像开了锅，日军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完全乱了套，前拥后堵十分密集，一粒子弹可以穿两三个敌人。日军被打懵了，撒开两腿朝前面石崖下跑，崖下挤满了日本兵。民兵陈乃珠一声高喊：“推！”20 多个民兵同时用力，把石崖边垒了两人多高的石墙推了下去。只听得“轰轰隆隆”一阵震天裂地的巨响，沙石乱飞，有的日军连喊叫都来不及就被砸成了肉饼，有的被砸得缺胳膊短腿。架在东寺垴的两门掷弹筒也开火了，一颗颗炮弹随着石块在敌群中开了花。侥幸活命的敌人，像一群冲散了的狼群，跳进河沟逃到对面的河滩上。这时，埋在河滩上的地雷又开了花！河滩上没有可供隐蔽的地方，结果目标更大了，近的只有 50 米，远的也只有二三百米，正是我们射击的“活靶子”。仅连部通信员王东山就打死 6 个日军。

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日军一直没来得及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甚至连我们的阵地在哪里也没有弄清楚，只是盲目地朝半山上乱放枪。这时，我军战士们的子弹快打光了。王亚朴考虑到敌军虽遭到重大杀伤，但还有力量反扑，我军兵力又太少，不宜出击。于是下达了撤退命令。民兵先转移，等民兵完全撤下来后，部队才往后山转移。在最后担任掩护的 5 班，撤退前想下去弄几支枪，结果 l 个战士被冷弹击中光荣牺牲，5 班长也负了轻伤。这是在这次战斗中包括民兵在内的我军仅有的伤亡。

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 140 余名，其中打死 1 名日军“讨伐队”的中佐副总指挥。另外，还毙伤敌骡马 80 多匹。战斗后，日军专门从辽县开来 6 辆大卡车拉尸首。日军原来还准备在辽县召开什么“讨伐胜利庆祝大会”，吹嘘什么“太行山的八路军统统地被消灭了”。敌人遭我这一次伏击，不得不将“庆祝大会”换了横幅，改成“慰灵会”。

北垛山上老向导

1942 年 8 月，在我们党的团结争取下，国民党 111 师起义，只有该师副师长孙焕彩纠集了一些坚决反共的顽固分子，占据了甲子山。此山地势十分险要，它南扼滨海，北踞鲁中，在莒日公路边。他们勾结日伪，不断进犯根

据地，切断了我滨海与鲁中的联系。为了巩固根据地，解放甲子山，消灭匪，参战部队共 6 个团，其中 686 团的任务是从甲子后山直取主峰北垛。

部队顶着狂风暴雨，到达甲子山，经过一天激战，终于占领了蒲旺后山，打开了进攻甲子山主峰的大门。团长命令 2 连，稍事休息吃过晚饭后，立即发起攻击，攻占北垛后，燃起一堆篝火，作为占领信号。因为北垛后侧，岩石嶙峋，山路陡峭崎岖，2 连到了山下的官庄，村里不见人影，一片混乱，该村已遭叛匪的洗劫。同志们可犯难了，这到哪里去找向导呢？费了好半天功夫，才在一条偏僻山沟的茅棚旁找到一位老大爷，约有 60 岁，胡须已灰白，但腰板却还硬朗，一看就知道是位饱经风霜的山区老人。老人见有人来，身子扭向一边，头不抬，眼不睁，小烟袋抽得吱吱响，对所有人的问话，一句也不答。从老人的神态上，连长知道他把大家当成叛匪了，急忙指着臂章说“老大爷，我们真是八路军，是来消灭甲子山上的叛匪，是为老乡们报仇来的”。大家也一齐解释着。沉默了一会儿，老人才慢慢抬起头来，视线首先停留在连长那白底蓝字的臂章上，接着他又迅速扫视了一遍所有的人，他忽然站了起来，一步跨到连长的面前，两手抱住连长的双肩，只说了句：“可把你们盼来了”，就哽住了。接着。他便告诉大家说，叛匪到村里糟蹋了好几次。年轻人有的被抓走了，有的逃散了。他的儿子也被抓走了，刚 1 岁的孙子饿死了，儿媳妇吓得回了娘家。说到这，老人擦了一下眼泪说：“不说这了，同志快说，我能帮你们干点什么？”连长告诉他，部队要从北垛后侧攻上山，想请他给指点一下道路，他一听，着急地说：“后山太险了，走不得”。那“蝎子尾”是一夫当关，万人莫开。老人是好心，可是，敌人在山上筑有坚固的工事，而且火力非常强。要占领主峰，歼灭敌人，只有采取突然袭击。当连长把这些道理向老人说明之后，他再没说什么，领着部队就往外走。

老人一定要亲自带路。部队在他的带领下，沿着一条拱起的山梁，步步攀高。来到北垛山脚下，那条被称为“蝎子尾”的山道，已呈现眼前，朦胧中可以看到它陡若天梯，蜿蜒而上，老人望着漆黑的山道，担心地说“蝎子尾”上天门当顶，窄的只能爬过去一个人，同志，不行！老人的话语中含着无限的关心和焦虑，连长和指导员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天亮前如果攻不下北垛，周围据点的伪军会赶来增援，连队会遭到敌人的袭击，因此决定先进行偷袭，不行就强攻，天亮前一定要攻上顶峰。

突击排刚靠近“蝎子尾”，敌人就发觉了，在激烈的枪声中，开始了猛攻，带路老人不顾同志们的阻拦，挺着身子，挥动着手中的棍子，大声呐喊，为战士们助威。一霎时，枪声，冲杀声淹没了松林的怒涛，震动得整个北垛都在颤抖。可是，由于敌人严密地封锁了“蝎子尾”，几次都没冲过去。部队已经有了伤亡，继续强攻对我军不利，只得暂时停止攻击，另想办法。这边一停，正面攻击的 3 营打得更激烈了，3 营要通过那林立的碉堡群和宽广的开阔地，将会比这边更加困难，可是怎样才能通过这“蝎子尾”呢？伤员们陆陆续续撤了下来，他们谁也不肯下山，有的说“蝎子尾”就是刀砌的，也要打过去。有的说：“不消灭叛匪，决不下山”。老大爷急得团团转，又一个重伤员抬了下来。神志已经昏迷。老人刚走到他的身边，他突然大喊起来：“冲啊！为官庄的老乡们报仇！”老大爷忽然三步二步跨到连长和指导员的身边，用手抓住他们激动地说：“同志，快说，还需要我做什么？”“老大爷，敌人把‘蝎子尾’封锁得过不去，再有没有能通北垛的路？”指导员

直接了当地问，老大爷想了一会，才慢慢吞吞地说：“路是有一条，就是……”“在哪？”连长迫不及待地问，老人用手指向北面，那里全是悬崖峭壁，他长叹一声，声音沉重而激愤地说：“路太险了，恶霸霸着山，穷人上山挖点野菜、草药都不行。为了活命，只得冒险翻绝崖，不知有多少人丧了命，还是不走这里好！”老人的话语中，蕴藏着被苦日子折磨了的无限悲哀，也含着父亲般的慈爱。可是他哪里知道，正是这种息息相关的命运，才使这些热血男儿们去赴汤蹈火的呀！指导员又向老人请求说：“大爷，您能给指点一下吧？”老人激动地问：“你们一定要从这里走？”“一定！它就是座刀山，我们也要翻过去！”连长坚决地回答。“好样的！”老人用力拍了一下大腿。然后，从腰带上撕下一缕布条，绑了绑鞋子，一柱棍站了起来，决然地说：“走！我带路！只要我老头有一口气，就能把你们带上北垛！”突击队员紧跟在他的后面，不一会儿便隐没在浓浓的夜幕中。

月亮落了，三星垂西，浓雾遮盖着山林，到处是一片雾茫茫。从 3 营传来的猛烈的枪声，像是给这些插翅飞向北垛顶上的战士的鼓励。“轰”！北垛顶上突然冲起一股火光，接着传来一阵惊人的爆炸声，敌人的机枪立刻变成了哑吧，“冲啊！”连长一跃而起，向上冲去。“冲啊！”隐蔽在“蝎子尾”下的战士们纵身跳起，向天门顶冲去，战士们沿着狭窄的山道，一口气跑到山顶。刹那间，呐喊声、枪声、顽军的嚎叫声，刺刀相撞声响成一片，经过一阵激战，敌人向山下溃逃了。突然从敌人溃逃的方向，传来机枪手的喊声和机枪的吼叫，透过火光，只见一块岩石上挺立着一个高大的战士，端着机枪，迎着溃逃的敌人，左扫右射，连长非常高兴，一面喊着：“堵住敌人！”一面猛向前跑，可是，等战士们赶到时，枪声已经停了。只见向导老人拿着机枪梭子正挺立在陡峭的山崖上，凝望着深谷，连长叫他，他才转过身来，把 2 个机枪梭子递给连长，沉痛地说：“这是那个打机枪的同志留下的，他打得正欢，被一个坏蛋一枪打下了山崖……”。说完，急忙把头转向一边，抹了抹眼睛。连长强抑住心中的悲痛，向叛军逃去的方向看，一条笔陡的栈道上，倒着层层叠叠的叛军尸体。再看看老人凝望着的山谷，深不可测，呼啸着的松涛，像在为烈士唱着挽歌。

战士们在大个子落入深谷的地方，燃起了一堆火，部队继续追击溃逃的敌人，老人没有再随部队前进，仍留在顶峰。连长和战士们一面前进，一面不断回首仰望山顶，只见老人不断把茅草、树枝加进火堆，红艳艳的火焰，照耀着机枪手战斗过的地方，也照耀着向导老人，渐渐地，大火越烧越旺，火焰灼亮了半边天，又和朝霞融合在一起，照耀得甲子山一片火红。

“大麻于”坐“土飞机”

胶东有个不起眼的小镇叫邢村。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乡亲们不甘受日伪军的奴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组织起来，拿起武器与敌人开展了游击战。

当时，日军为确保自己的交通运输线的安全，以便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就派了日伪军进占了邢村，建起了据点。敌人一进村，就将整个村镇封闭了起来。只留下一个出入口，在此处设立了检查所，派兵把守。自从日伪军进村以后，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特别是那个绰号叫“大麻子”的汉奸所长更是作恶多端。他仗着日本人的势力，甘当鬼子的忠实走狗。自

他当了所谓的“所长”以后，更是狗仗人势，变本加厉地为鬼子效劳、欺压百姓。凡是出入检查所的乡亲，他都百般刁难，经常抢劫过往乡亲的物品，调戏妇女，他认为行迹“可疑”的人，轻则打骂、关押，重则押送日本宪兵队。这帮日伪军的到来，扰得邢村家家户户鸡犬不宁，也使我军民的抗日活动受到了限制。特别是汉奸所长“大麻子”的所作所为，乡亲们更是切齿痛恨，要求严惩这个恶贯满盈的汉奸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个村子里有个青年叫赵守福，血气方刚、有勇有谋，自日本鬼子侵占胶东之时起，就参加了我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的抗日民兵组织。由于他战斗勇敢、机智，很快就成为战斗骨干，深得大家的敬佩和信任。除掉“大麻子”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赵守福的肩上。

为拔掉日伪据点，为民除害，赵守福和他的伙伴们进行了精心的筹划，设想了多种行动方案，最后决定，运用我民兵的“拿手好戏”，请“大麻子”坐“土飞机”。

在一个初夏之夜，行动计划开始了。那天夜晚，满天乌云，伸手不见五指。家家户户早已紧闭门窗吹灯入寝。村里村外静悄悄的。此时，赵守福和他的伙伴们出动了。只见他仅穿了一条短裤，浑身上下涂抹了泥浆，进行了伪装，他的腰间环系着几颗地雷。同伴和他开玩笑说：“你这套‘呢子’服就是‘护身符’。”赵守福风趣地说：“这是土地爷赠送我的迷彩服。”当一切准备就绪后，行动开始了。赵守福首先吩咐自己的同伴占领有利的掩护位置担任掩护任务，然后自己趁着漆黑的夜色向敌人的“检查所”摸去。他选准了敌人两个哨位的结合部的空隙匍匐运动，神不知鬼不觉地爬过了防护壕、躲过了陷兵坑，穿过了铁丝网，就在到达“检查所”之时，一没留神，碰到了敌人暗设的“报警器”。只听“当啷”一声，敌哨兵闻声惊喝到：“谁？！口令？！”同时，敌人又打开了探照灯，往发出声响的地方反复扫视。赵守福利用地形、地物的掩护，肚皮紧贴地皮一动不动。连呼吸似乎也停止了。敌人照了半天没发现什么，也没再听到动静，以为是野狗、野兔之类的动物弄出的声响，也就没再注意。只听一个伪军哨兵说：“就你他妈的大惊小怪，让八路吓破了胆！”，另一个争辩说：“你懂个屁！干这倒楣的活，不小心命早就没了。”赵守福趁敌哨兵正在聊天、疏于戒备之时，一跃而起，一个漂亮的鹞子翻身接近了“检查所”的大门。门锁着，赵守福判断“大麻子”没在，准是到外边鬼混去了。只见他纵身一跳，翻墙入院。观察了一阵，见周围没有异常动静，便按原先计划，沉着、细致地在“大麻子”住处的门闩上挂了一颗地雷，又在炕跟处埋了两颗地雷，并进行了巧妙的伪装。当一切布置就绪，赵守福趁夜色安全地撤离了“检查所”。

拂晓时分，“大麻子”哼着下流小调摇摇晃晃、醉熏熏地回到了“检查所”自己的住处。他打开锁刚一推门，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一股火光冲天而起，“大麻子”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炸成了好几截，那些零七碎八的肢体被爆炸产生的强大气流抛上了天空，没一会又噼呖叭啦地掉了下来。爆炸声惊醒了烂睡如泥的日伪军，他们以为是八路军打来了，个个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当敌人终于弄清楚爆炸来自“大麻子”的住处时，又乱哄哄地往“大麻子”的屋里挤，想看看他们“所长”的情况，没想到他们又踏响了赵守福埋在炕跟的两颗地雷，随着两声巨响，十几个日伪军一同坐了“土飞机”，去追随先走一步的“大麻子”去了。

“大麻子”被炸死的消息飞快传开，乡亲们无不拍手称快，都纷纷赞扬

英雄赵守福为民除了一害，为抗日立了一功。《“大麻子”坐“土飞机”的故事》从此也在胶东抗日根据地流传开来。

万众一心反“清乡

1943 年 4 月，日方调动了庞大的兵力。向四分区发动了所谓“清乡”，妄想征服这块土地。

对四分区的“清乡”，卖国贼汪精卫和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是出了很大力气的。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成立汉奸政府时，就把“清乡”定为“国策”，并亲自出马，组织一个“清乡委员会”，自己当委员长，他把国民党向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的五次“围剿”，和日寇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的伎俩都搬了出来，日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也在南京组织了一个“五次围剿战术研究会”。在“清乡”前他还亲自到南通一带“视察”了一次。

敌人订了一个“清乡”计划，这个计划分为三个时期三个步骤：第一阶段是所谓“安民时期”，主要是用军事力量，集结重兵，疯狂地进行“扫荡”，妄想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把我们的主力部队歼灭；然后进入第二阶段的所谓“训民时期”，打算在清乡区内进行宣传活动、调查户口、编制保甲、编练壮丁；这一套搞得差不多，就着手从政治上灌输顺民思想，用奴化教育来麻醉人民，最后达到奴化这一地区的目的，这被称为什么“新民时期”。这样，大量的棉花、粮食、税收、壮丁，就可以被无限地搜刮来支持他的“大东亚圣战”了。

为了实现以上的阴谋，敌人在四分区投入了大量兵力。负责“清乡”的敌军主力，是从江南太湖地区调来的一个特种师团——小林师团。

小林师团是日本一支专门执行“清乡”任务的待务性的部队，里面情况复杂：“中国通”及“浪人”很多；重火器配备虽不如其他日军，但他们狡猾诡谲的特务手段，却比其他日军更坏。在一个地方，前一刻还安然无事，但突然间，小林部队会分兵多路合围而来。他们像黄色的疯狗群，卡着要道，拥进村庄，刺刀在草堆里沙沙地刺着、挑着，寻了又寻，搜了又搜，甚至粪缸、草篷，也不能幸免。他们行动不息、行迹不定，依靠据点，听见枪声或发现目标，即多路合击而来。有时打从一个地方经过，去后又突然转回来搜索，有时，诡密地出现在某地，悄悄隐蔽起来，封锁了要道，行人只许进不许出，挨一挨二地盘查。无论白天和黑夜，他们都鬼鬼祟祟地活动着。有时，他们化装成新四军捉一鬼子来迷惑群众，然后又将群众加以逮捕；有时，又化装成叫化子、拾狗粪的，刺探我们的军情。进行欺骗宣传等政治活动，是他们的惯伎。另外，他们还善于分成小股，打击我军。

除小林师团外，敌人还配有伪军田铁夫两个师，五个“清乡”大队，四个保安大队和三个伪警大队，全部兵力约在一万五千人以上。

此外，敌人还设立了“苏北清乡公署”，公署下面县、区都设立了属“清乡公署”领导的“清乡”机构。“清乡公署”的主任叫张北生，这家伙反动透顶，本来是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蒋介石面前的一个红人。

日寇花了大本钱，打算把四分区的“清乡”，当作一次试验和开端，企图在四分区搞出点经验，然后把“清乡”的毒计扩展到苏中的其他分区去。当一切安排好了以后，他们就恬不知耻地把这行动称之为要“创立大东亚圣

战的华中确保区”。因此，在四分区粉碎敌人的“清乡”阴谋，意义不单是巩固四分区的根据地，而且关系到整个苏中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和敌人斗争的问题。

在反“清乡”的洪流里，四分区的军民，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他们愈战愈勇，愈打力量愈雄厚。在四分区军民的打击下，敌人的“清乡”计划完全破产了。

敌人在开头所谓的“安民时期”实行“军事清乡”，集中优势兵力，反复进行“清剿”，从西北向东南压缩，企图把新四军主力，消灭在海边上。但他们却接二连三地扑空了。扑空后，他们就分兵占领各个交通要道，据点由六十三处突增至二百余处，大搞篱笆封锁。敌人从江南运了五百多万根竹子到四分区来打又高又密的篱笆，企图由天生港向北经白蒲、丁埝，再向东至掘港、南坎直达海边；又由天生港向东至启东海边，再转北向吕四与南坎之竹篱合拢，造成划地为牢的包围圈。包围圈长约数百公里，沿篱笆设大小检查所，盘查出进篱笆的尾人。大检查所驻六个敌人，小的驻三个，每隔十里，又设一碉堡；包围圈内部再打篱笆，实行分割。光是沿篱笆专任封锁的部队，就有伪 24 师、33 师和保安大队的一部。

篱笆封锁，是敌人在“清乡”中使出的主要法宝之一。他们认为“清乡”的关键在于封锁。“清乡”的特工总头子张北生说：“篱笆打起来，新四军就钻不进、逃不出，只要封锁成功，‘清乡’就会成功。”因此，敌人不惜兵力、财力，坚决打篱笆。企图把四分区分割成碎块，截断交通，以便竭泽而渔，达到“清乡”的目的。

但是，敌人完全错了。他们刚从南京派到天生港的一个封锁主任，就被四分区短枪队长“一枝梅”打死了。从江南运来的竹子尚未起岸，就被新四军的便衣队毁坏一部分；打篱笆时，敌人找群众当民工，大家又用逃跑躲避、消极怠工的办法与敌人斗争；有的地方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破拆运动。民兵破了竹篱笆，敌人又重打，一打好民兵又去破，这样打打破破、破破打打，最后连根给它拔光，再也打不起来。在整个“清乡”过程中，敌人的篱笆始终是没有完全打起来的。

两个月过去，敌人的“军事清乡”没有成功，又开始了所谓“训民时期”的“政治清乡”，妄想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阴谋，达到伪化的目的。这一时期他们开始以据点为依托，一面大肆捕杀我基层干部、党员、民兵；一面又利用汉奸、特工和武装，强迫建立伪政权，搞些编保甲、登记壮丁、十家联保联坐的名堂，但锄奸运动在四分区已成为真正的群众性运动。群众只要抓住特工，那真是铁面无情。他们用最严厉的手段对待他们：斧头劈、钉耙打……还有将他们捆得紧紧的扔在大河或深沟里，人们把这取名叫“扎粽子”、“大汤馄饨”。群众用最严厉的惩罚来回答敌人的残暴。特工们在这种运动的威胁之下，嚣张气焰被打下去，恐惧情绪上升了。一提到锄奸运动，就“谈虎色变”，天天提心吊胆。而且敌人内部狗咬狗的事例也不断发生。四分区根据地里，镇压了伪化妥协的歪风邪气，使日军失去了耳目。针对着敌人的阴谋，党组织了反“编保甲”的斗争。当时对士绅是强调要他们明哲保身，对群众是讲清敌人编保甲后的恶毒后果，发动群众撕门户牌、烧壮丁册、不讲真话等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编好户口册子，儿子送给鬼子。保甲编成功，壮丁抽个空。”群众深知敌人的阴谋，斗争起来是非常坚决的。“编保甲”一套鬼名堂也被我广大

军民反掉了。于是，他们恼羞成怒，实行“三光政策”，单在南通十总店一个不满百户的村子上，就活埋了五十三人。尽管如此，“政治清乡”一直拖了四个月，还是完不成。当然就更谈不上所谓“训民时期”了。

在“清乡”区内，骨干武装是短枪队，他们以神出鬼没的行动到处打击敌人。这些短枪队是由主力部队留下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与地方上的基干民兵组成的，他们行动起来，很使敌人生畏。在轰轰烈烈的反“清乡”运动中，短枪队更是立下了很多功勋。

在群众性的武装斗争之下，伪军政人员开始分化动摇，四分区军民乘机展开政治攻势。伪军政人员纷纷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要待机立功。1943年9月，南通伪保安旅在金沙全部起义，一连十几个据点都得到解放。接着，“清乡”区内集合了成千上万的民兵英雄及群众，日夜围困伪军据点，在这气吞山河的斗争形势下，许多伪军被迫放弃据点，抱头鼠窜了。我苏中军区的各主力部队又在四分区的外围发动攻势，打下南坎等十余个据点，歼灭日军一部。敌同时撤去了北新桥、孙家窑、曹家埠等十二个据点。在发动军事攻势的同时，地方武装和民兵掩护十余万群众，在三百余里的“清乡封锁线”上同时破袭，所有的竹篱笆都被拆毁了，被焚烧了，熊熊的烈火，像一条火龙一样蜿蜒三百余里……到处响起了反“清乡”胜利的歌声。这样，敌人先是全面“清乡”，“清”不成，又声言分期清乡，“政治清乡”，也无结果。最后，竟变为可怜而可笑的“战线式清乡”。当然，“战线式清乡”最后也失败了。

在20把刺刀面前

1942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也是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更是日本侵略者连续进行大规模扫荡最残酷的一年。当年，日军为“以战养战”和支持太平洋战争，加紧了对中国沦陷区的控制和掠夺。他们在正面战场除继续第3次长沙会战，进行浙赣作战外，以主要兵力对各敌后根据地进行着大规模的扫荡，企图使这些地区“成为培养补充战斗力的基地。”

然而，中国人是杀不绝的，尤其是他们那种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使日本鬼子们感到棘手和头疼。

是年在鲁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8 月，鲁西的天气时阴时晴，变幻莫测，这天，天气阴沉着脸，好像预感到不祥一样。田地中，刚才还在干活的一对农民夫妇，因为日本鬼子来了，拉着七八岁的孩子，轰赶着牛跑过大田。

“动一动就打死你们！”三把刺刀对准了他们的胸口大喊着。

身材高大的农民，用粗壮的大手牢牢地握着牛的缰绳，保护妻子和孩子似的环视着。他向士兵们转过身来，用缓慢的声调说：“我是老百姓。”那满是泥土的脸上，有几条流下汗水的印痕。

女人靠近丈夫身旁，从满是补丁的布衣服腰部取下旧毛巾，递给丈夫。

“哼，还好打扮呀！”一个日本兵说着扬脚踢向了农民的妻子。

“哎哟！”女人用瘦削的满是皱纹的手，勉强支持住身子，向丈夫求救。那农民太阳穴颤动着，大脚迈出两三步，保护住妻子。

“喂，那个，那头牛，拉过来！”

“不行！”男人推开敌人，紧紧地把缰绳缠在手臂上。“就是死也不给！”

“反抗吗？这个畜生！”日本兵挥拳朝农民脸上狠狠打去。在晃晃悠悠摔倒下去的丈夫的前边，女人用消瘦的双手来阻挡。母亲膝下的孩子哇地哭了起来。

敌人猛力抓住女人的头发把她拉倒。她从地上站起来，又跪在地上，把丈夫、孩子和牛一一看了一遍，嘴里不停地哀求着：“这牛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命根子，如果把它带走了，我们一家人怎么活呢？”

“甭装傻，我不管这些！”凶狠的日本兵一脚朝女人的胸口踢去。被踢翻的女人呻吟着捂住胸口，痛苦地扭动着身子。

牛被抢走了。孩子的头被踢破了流着血。女人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摇摇晃晃站起来，叫骂着：鬼子！鬼子！

“喂，你到教官那儿去！”三把刺刀戳着，男人只好往前移动脚步。妻子死死抓住丈夫不放，央求着不让带走，又大哭起来。

“妈的，跟来就把你打死！”敌人把枪口对准女人的胸膛。

农民平静地回头看着妻子，他把手轻轻放在紧搂住自己的脚不放的妻子的手臂上，说了两三句什么，又抚摸着孩子的头，然后一步一回头地被带走了。

日军由教官和分队长带领士兵对这个农民进行了一阵拷打和审讯之后，分队长命令把农民带到一棵枣树下刺杀。被押着走的农民，从衣服里掏出良民证，在众人面前撕碎，扔在地上。纸片随风飞舞，散乱一地。

在大枣树前，农民站住，回头说：“我不怕被杀死，最后让我抽袋烟吧。”

教官紧握着军刀说：“武士的情谊，让他尝尝。”并对士兵道：“好好警戒！”

闷热的盛暑加上大雨前的沉闷。二十几把刺刀从四面八方紧逼着。

那农民把拷打时被撕破了的衬衫前襟掩好，抚摸着被打伤的胳膊和腰，坐在枣树根上，慢慢地从腰里摸出烟管。烟管已被打断了。他一声不响地凝视着烟管，哆嗦着夹杂着白毛的眉毛，瞪着周围的士兵。

农民解开烟袋带子，把烟管插进烟袋，停下手来，用握着烟袋的拳头，擦拭了一下粘粘糊糊带血的嘴唇，突然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士兵们都吓了一跳，视线一齐投向粘在石头上的血块。农民取出打火石，咔嚓咔嚓慢慢敲着。在他身旁，似乎包围他的日本兵们完全不存在。他使劲地吸着烟，把烟安静地吐出来，又香香地吸着。脸在太阳下晒着，渗出的汗慢慢浸入伤口，他也不擦，只是眺望着天空，盯着喷出的烟雾。他的脸上，竟然浮现出微微的笑容。

“混蛋老百姓，快吸呀！”一个日本兵突然喊着扑向农民，用军靴踢他的肩头。但是受到反弹，他自己却摔倒了。士兵围着教官，轰然大笑。

农民仍旧吧嗒吧嗒抽着烟，吞吐着烟雾。他把烟袋锅儿，用满是茧子的手掌磕去烟灰，粗壮的大拇指灵巧地一转，压上下一袋烟，大口大口地吸着。他盯着自己的手掌，张开握上，又张开握上。忽然，他的手不动了。这时，从他的眼里掉下泪来。接着，陆续不断地掉着，渗入干透的黑土里。

分队长猛扑过去，抢下农民的烟管，摔到地上。

教官大喊：“笨蛋，快把他的眼睛蒙上！”四个人把他的两手捆住，绑在枣树上，又撕破沾血的汗衫，想蒙上他的眼。这时，农民用轻蔑的声调说：“不怕，鬼子，一定报仇！”

他猛一晃头，把布条甩到一旁，眼睛注视着日本兵们。

“刺杀！”教官拔出军刀，在空中挥舞。

“啊！”一个日本兵拼命刺去。但是，刺刀只扎进肩头大约两寸。鲜血流了出来，农民的肩头开始痉挛。

“怎么啦？你那种刺法……”分队长的皮带狠狠抽了下去。

“笨蛋，刺胸口！”分队长喊着。农民仍然紧闭着嘴，眼睛瞪着士兵，又转看伤口。日本兵哭丧着脸，又一次刺杀，刺在左侧肚子上，刺刀和军服都溅上了血沫。

“注意，刺！”教官高喊着。

又一个日本兵跑过来刺杀，刺刀扎进喉咙，扎进枣树，断离了枪身。在这一瞬间，满身是血的农民，把全身的力气集中在嘴上，像从丹田发出的那样叫了一声：“鬼子！……”话没说完就断气了。

教官高兴地笑着：“成功。全体新兵，试试胆量，轮流刺杀！”

这就是一群毫无人性的兽类的表演和练习。

可惜我们不知道这位农民的姓名。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中国人。在那场民族浩劫中，千千万万被屠杀的人们都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他们都是中国人。

几千万中国人倒在血泊之中，民族的血海上蒸腾起一种精神，就是那中华民族之魂。

这位普通而又伟大的农民，他的夫妻情、父子情、离别情，他对土地的感情，对生活的挚情，对生命的恋情，直到撕良民证和吐血块时对侵略者的憎恨和蔑视之情，处处体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朴实中的精神深度。尤其是在被杀害之前，他视死如归，他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大义凛然，他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他心定如山，他浩然之气贯长虹……无论用什么词汇，也难以形容难以描绘，我们只能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因为这种精神，所以日本人不可能杀尽中国人。

因为这种精神，所以日本永远也不可能征服中国。

千里迢迢奔延安

日寇长驱直入，占领南京，杀人几十万，国都变屠场，海外炎黄子孙们被空前激怒了，华侨热血青年纷纷请缨回国杀敌。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联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14 岁的华侨少年王唯真，此时就读菲律宾马尼拉南洋中学，他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

“七七”事变后，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波澜壮阔地开展活动，如组织演讲队、歌咏队和街头演剧队，活跃在街头进行抗日宣传。广大华侨青年群情激愤，坚决支援祖国军民抗战到底，直至最后胜利。他们舍弃“舐犊之爱”，以勿忘我们的民族意识，回国参战依依告别亲人，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这感人的场面，令所有人泪珠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虽有重泽万山阻隔，但回国参战踏上民族解放战争最前线的华侨青年仍有一万多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归国华侨大部分参加了国民党的陆、海、空军，有的参加了桂系军队。数千名华侨司机、技工，在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组织下，承担了滇缅公路运送军用物资的任务。另约有 2000 左右的华侨青年，分赴延安和华北、华中、华南的敌后战场，参加了八

路军、新四军、东北纵队和琼崖纵队，对日寇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这些华侨青年之所以选择归奔延安的道路，一是因为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抗日最坚决的；二是赞成中国的未来，应该是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华侨赤子们的心情激动极了。闻着祖国土地的芳香，吸着带火药味的空气，从心中呐喊：祖国，我们回来了，在海外的儿女为了母亲的屈辱和苦难，回来打强盗了！

延安——这个神圣的名字，象征着革命，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希望。万名爱国华侨抛弃舒适的生活环境跨越重洋，千里迢迢从海外回来，奔向延安抗日前线，取得革命“真经”为民族献身。实现了他们回国报效祖国的愿望。

华侨学生王唯真能实现奔赴延安的愿望，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他的父亲王雨亭。王雨亭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阀袁世凯的斗争；1919 年在菲律宾同傅振机先生一起创办了《平民日报》，1932 年又同杜希泉同志一起在菲创办《前驱日报》宣传抗日救国。“七七”事变后，受廖承志和成仿吾同志的委托，介绍过成百名华侨青年回国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王雨亭从爱国主义走上共产主义，从同盟会员成为共产党员。王唯真眼看自己的父亲介绍一批又一批的华侨青年回国去延安，心急如火燎，在他的一再恳求下，父亲被感动了，同意亲自带他回国。临行前，王唯真的父亲在他的纪念册上命笔写到：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日教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1939 年 6 月 30 日，王唯真应时代的召唤，带着父亲的祝愿，回国踏上了抗日战争的征程。

归侨们来到当时的延安，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世界。因为这里的政治空气异常清新，抗战气息非常浓厚，墙壁上写满了抗战标语，画了不少抗战壁画。早晨的军号声、操练声和抗战歌声响成一片，令人精神振奋。这里没有悲观失望，有的是抗战必胜的信念；这里没有官气，有的是干群平等上下一心的关系；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有的是团结友爱；这里反对口是心非，强调言行一致。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给归侨们讲述爬雪山过草地的亲身经历；从前线回来的同志们，给归侨们讲述日本兵的“武士道”精神敌不过八路军的革命英雄主义；蹲过国民党监狱的同志，讲述国民党特务的阴险毒辣，对革命青年的百般摧残，以及烈士们视死如归的气概。归侨们在延安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初步学习了革命战争的理论、政策和战略策略，从书本和活教材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提高了精神境界，打下了思想基础。

回国就是要上前线打仗，这是当年华侨热血青年的普遍愿望。不打仗回来干什么？所以王唯真向组织上提出了上前线的请求。当时组织上考虑到他年纪还小，应该抓紧时间多学点革命的理论，就做他的思想工作。延安同前方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况且日军已经进逼黄河东岸，延安已被日机轰炸，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包围陕甘宁边区，仗有你打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组织上的教育，使他服从分配到了青干校。归侨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和大生产运动中的拼搏精神，受到国内同志们的好评。不少归侨当选劳动模范，前方涌现出不少归侨战斗英雄，战地记者，战地作家。战斗的激情弥漫着前方和延安，归侨和国内革命青年共享着历史上罕有的战斗的欢乐，大家奋发忘我地工作，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自己的青春。1940 年 10 月 7 日，王唯真作为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唯一的华侨青年，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1941 年 8 月，他奉命调到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同年 11 月转调新华社工作。当时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延安城东门外的清凉山也几经轰炸，报社和新华社就设在清凉山的土、石窑洞里。这里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战斗在这里的是一支党新培养出来的拿笔杆子的部队。其中有 20 多名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一踏上清凉山，王唯真就被那里紧张的战斗气氛所吸引。只有初中文比程度的新华社话务员，靠着山上的简陋无线电和土窑洞里的收报机，克服重重困难，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惊人速度创下了令西方记者都赞叹：“难以想象”的奇迹。被战乱耽误了学业的话务员，不懂英语，只懂英文字母，面对外国通讯社用机器播发的每分钟 200 多个字母，日夜收听着东西半球各大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新闻。他们连续几个小时，以每秒钟 3 个以上英文字母的音讯，在耳机中分辨清楚，用手中的笔把它抄录下来，为处在延安山沟里的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掌握世界战局、交战国政情动态和宣传动态提供了主要信息来源。起到了耳日作用。这种近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终于被清凉山的话务员做到了。清凉山的第二大奇迹是新华社的“破译天书”。当时报务员高速抄下来的外电，字迹很难辨认，加以高空电离层变化的干扰，抄错、抄漏的现象难免发生，从抄报房送来的字迹简直像“天书”，面对这种高难的“天书”，翻译组的同志通过艰苦、细致的探索，终于摸清现律，夜以继日地一一把它们破译出来。在“破译天书”能手中，就有来自南洋的归侨。正是战斗在清凉山的这批抄报“神童”和“破译天书”的能手，保证了党中央耳聪目明，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天下大事。

王唯真说：我当年选择归国奔赴延安的道路走对了。

伟大的“地下长城”

说起冀中地道战，这是冀中军民在艰险的斗争环境中，为粉粹日本侵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多项“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在艰苦卓绝的与敌斗争中，群策群力发明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战斗形式。我抗日军民利用这伟大的“地下长城”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狠狠地教训了日本侵略者。

1942 年日军“五一”大“扫荡”以后，我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敌人对我冀中进行了全面“蚕食”、“清剿”，修筑了公路，建立了碉堡、据点 1700 多个，挖封锁沟 4000 多公里，实行了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回笼”政策。日伪军天天四处烧杀抢掠，给冀中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为了保存自己，坚持抗日斗争，我冀中平原根据地的部队、地方干部和民兵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一道，在冀中各村、区、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地道斗争。

刚开始，一般都是在自家的院子或屋里挖个小洞，待敌人来时，便钻进去藏身。但这些地洞都只有一个出口，只能消极地躲藏。敌人很快就发现了地洞藏身的秘密。一发现洞口，就往洞里开枪、灌水或放毒。因为都是只有一个洞口的死洞，使我军民遭受了损失。

我根据地的军民从血的教训中总结，摸索，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为了克服能“藏”不能“走”的问题，军民们创造了院院相通的多口地道。把一家一户的地洞，通过地道连接起来，做到家家相通，院院相连。这样，死洞就变成了活洞，敌人即使发现了某一洞口，洞里的军民也可以从另外的洞口逃出去。可是，敌人是凶险狡猾的。对敌斗争的发展，对地道的构筑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对敌斗争中我冀中军民不断总结，不断摸索，把地道修得越来越神奇，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实用。军民们把村里相通的地道修成了通到村外的连环地道。有些村庄主要街道在地下用“田”“申”“甲”“中”字形地道连通起来。许多地道经过精心设计，有泄水坑、防毒通道、通风孔，能防毒、防水、防烟。有的地道则为多层的连环地道。上下几层都有地道相连，这样洞下有洞，洞洞有地道相通，形成连环。如果敌人发现或破坏了第 1 层地道，军民们便可进入第 2 层地道，如果敌人放毒气，则可以把第 2 层的洞口堵死，让毒气进入第 1 层地道。军民们还故意造了一些假洞来迷惑敌人。

为了把地道建成能藏、能走、能打的多用地道，军民们在大地道中又挖出许多小地道，敌人胆敢进入大地道，军民们就可钻入小地道，瞅准机会消灭敌人；有的地道与地洞之间隔上一层土，当敌人钻进地道时，可以用铁器迅速打通隔土层，进行转移或打击敌人；有的在接近地道或地洞口之间挖一个陷阱，口上安置一块翻板，平时用横梁支着，一旦敌人进洞，抽去横梁，敌人就会翻进陷阱里去。遇到敌人往洞里放毒气弹、手榴弹，翻板一翻，就会都掉到陷阱里去，失去了作用。有的甚至把地道修到了敌人的据点下，监视敌人的行动，弄得鬼子是想打打不着，想防防不了，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伤透了脑筋。

冀中军民在发挥地道作用的同时，注意把“冷枪战”和“地雷战”结合起来。所谓“冷枪战”就是利用设在街口和院落厕所、墙角、鸡窝、碾棚、锅台、牲口槽和旧墙基等隐蔽处地洞口的秘密射击孔，瞅准机会向敌人射击。因为我在暗处，敌在明处，所以一般都是在十几米、甚至几米时才开火，百发百中。有时甚至用红缨枪都能从射口戳出刺死敌人；所谓“地雷战”，就是在菜篮子、筐子里放上地雷，挂在屋内、院内的锅盖下和门窗上、厕所里、鸡窝上等等敌人经常搜查的地方，然后拉上引线，如果敌人进院，进屋开门、掀锅、抓鸡、上厕所等，就会拉响地雷被炸死。

1945 年 1 月 17 日拂晓，任丘、高阳两县 700 多名敌人的快速部队突然把我冀中 9 分区的指挥机关紧紧地包围在了高阳县皮里村。些时，美籍盟军观察员杜伦中尉正在此村实地考察地道战的情况。9 分区的司令员和政委沉着、冷静地指挥部队转入地道，决心依托地道打击敌人，让杜伦中尉真实地感受一下我军民地道战的威力。

他们刚刚转入地道，鬼子就嗷嗷叫着冲进了院子，接着，敌人就上了东房顶。我特等射手从射击孔连发两枪，两个日军应声从房上栽了下来。敌人又拥进了东屋，又遭到我东屋和北屋战士利用“翻眼地道”的射击。各处的敌人遭到很大伤亡，大为恼怒，又苦于找不到我军，便在村里到处点火烧房，寻找地道口。最后，在汉奸的告密下，敌人终于发现了我们的 4 个地道口，分区领导和杜伦中尉恰好就在这个地道内。敌人如获至宝，把这几个洞口严密地封锁起来，疯狂地向地道里灌水、放毒、吹烟。可是，敌人灌到地道里的水顺着排水沟又都流回到了水井里，毒气和浓烟又都被地道内的巧妙装置堵在了地道外。与此同时，地道内的战士利用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地道网迅速机动，各就各位，从高房工事里、磨盘底下，墙根和庙台背后等各种地方向敌人准确地射击，全村处处只听枪响，只见鬼子一个个地毙命，却根本见不到八路军的影子。

黄昏时，日军撑不住了，急忙想溜。分区领导果断命令部分部队冲出地道，与疲惫不堪的日军展开白刃战，紧接着，附近几个县的游击大队和区小队也赶来参战，弄得敌人鬼哭狼嚎，最后，敌人扔下了几百具尸体，狼狈地窜回了据点。

亲眼目睹地道战神威的杜伦中尉钻出地道，伸出大拇指连声赞叹：“ 冀中的地道是万能的，冀中的老百姓顶好顶好的，中国一定能胜利！ ”

像这样的战斗，在当年的冀中战场还有成千上万，数不胜数。在抗日战争中，冀中军民到底挖了多少地道，难以统计。仅据 1944 年下半年以后的统计，所挖的地道就有 1 万多公里。在敌人残酷的“ 清剿 ”、“ 扫荡 ”面前，冀中军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凭借最简陋的工具，长年累月一镐一锹地修筑了一座罕见的“ 地下长城 ”，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民兵大摆地雷阵

地雷是个大铁瓜——咚咚咚
满山遍野埋上它——咚咚咚
大吼一声震天地——咚咚咚
鬼子脑袋开了花——咚咚咚

民兵们在鼓声中从四面八方跑来。有的扛着步枪，有的抱着地雷，有的还拿着铁锨、铁丝和褡裢等东西。

原来，阜平县城厢民兵中队正在进行埋雷演习。

这时，只见爆炸队长张俊鲁向队员们喊道：“ 用连环雷，摆成梅花阵！ ”几个队员挖得挖，埋得埋，动作非常熟练。埋好后，队员们从褡裢里掏出牛蹄子、羊蹄子，印上蹄印；又掏出小孩鞋底、妇女鞋底，印上鞋印；另外还撒上牲口粪，做得真毫无痕迹。

埋雷进入城厢街道，由游击小队长侯起清领着爆炸第二组表演。他们埋到大路两旁，不埋路中间；埋在水井周围，不埋打水的道上；埋在门槛里边，炕沿下面……。侯起清组表演完后，大声说：“ 我们这叫敌变我也变。鬼子挨一回炸，多一个心眼，咱给他们来个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出其不意，炸其不备。 ”

草枯叶黄谷上场，阵阵秋风催人忙。1943 年秋，根据地军民紧张秋收的时候，日军开始对我晋察冀北岳区根据地实施“ 大扫荡 ”。各路日军的进攻矛头，都是指向阜平——我边区首府。

虽然边区的山川平原十分广阔，“ 皇军 ”的行动却无自由。他们走大道，大道炸；走小道，小道也炸；庄稼地、渠道、沙滩等等，无处不炸；炸得鬼子不敢贸然前进，只好绕绕转转，走走停停，队伍零零散散的没个队形，一个个搭拉着脑袋像送葬；慢得简直就像乌龟爬。足足费了半个月，才爬到阜平城关附近。

这时，我军区主力部队已插到外线打击敌人去了，只有民兵武装“ 区不离区、县不离县 ”地坚持内线对敌斗争。

10 月 2 日上午，阜平城东玉皇庙顶上的“ 消息树 ”向西倒下，这是报告敌人从东边来了。城里的老乡们，在自卫队的掩护下，安全地转移到大白山去了。城厢民兵爆炸组按照演习过的方案布好了雷阵。

鬼子一到城门口，当然迎面会先看见张俊鲁他们扎的那个草人，草人手里举着一幅大标语牌，牌上写着：“城里地雷五百三，看你小鬼哪里钻！”这两行红字是给敌人的警告，也是给敌人精神上最强烈的打击。据说鬼子到草人跟前生气地瞪了一半天，也没敢动它。怕下面埋着地雷。因为他们在别处已吃过不少这样的苦头了。

前几年反“扫荡”中，敌人进村后我们在山上所听到的，首先是杀猪宰羊，烧火做饭的声音；而现在绝然不同。敌人硬着头皮进了阜平城，不断传来的却是雷声隆隆的巨响。远远望去，城里真是火光闪闪，烟尘滚滚。这每一个光闪，都会有鬼子的血肉横飞，这每一个声响，都会有鬼子的尸体倒地。高兴得民兵们在山上止不住地连声叫好。

天快中午时，侯起清带领的游击小队从谷子地里钻出来，在隔城不远的地方抓来一名伪军俘虏。听俘虏讲：鬼子进了阜平城，走路，脚底下的地雷炸了；挖窑，窑口里的地雷炸了；推门，门框上吊着的地雷炸了；抓鸡，鸡窠里拴的地雷炸了。还有的鬼子到菜地里伸手去拔萝卜，萝卜下面的地雷也爆炸了。那俘虏还讲鬼子在摘门板和绑担架时挨地雷炸得特别厉害。直炸得鬼子吓破了胆，他们行不敢走路，住不敢进屋；好像他们的性命是个用细线吊起来的鸡蛋，说不定哪儿会线断蛋打，一命归阴。

就这样，敌人在阜平城里一夜也没敢住，当天下午，就气急败坏地夹着尾巴溜走了。

城厢民兵中队还经常“远征”。侯起清带着游击组，跟着敌人绕转转；张俊鲁带着爆炸组，瞅空子就给敌人摆地雷阵，他们配合得非常自如。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们在枪雷结合的战术中不断出现新的创造，什么“引诱爆炸”、“驻地封锁”、“迎头爆炸”、“尾追爆炸”等层出不穷。在埋雷技术上也是花样日益翻新，什么“连环套”、“迷魂阵”、“梅花群”、“空中跳”，还有那“仙人脱衣”、“金蝉脱壳”等等，真是越来越加神妙。有一次，打一小股敌人，打得就非常巧妙：首先，在山头上指挥几个人唱歌子，激怒了鬼子飞步来追；正好，侯起清埋伏在对面用步枪点名，山半腰张俊鲁埋的“追命雷”也炸了，追上来的敌人就没有跑回去几个。

敌人也在煞费苦心地想办法：抓几只羊在前边替他们趟雷，但羊总得有人赶着，地雷炸了羊，人也跑不脱；弄来探雷器让工兵在前面扫雷，但民兵到处埋下些废铜烂铁片子，使敌人真假难分，经常弄得连人和探雷器一块给炸飞了。鬼子没办法，只好用刺刀逼着伪军在前面领路。一天，侯起清从路边拣来一字条，上写着：

“民兵大叔，请高抬贵手给小侄们指条生路，炸鬼子尽管炸，千万别炸我们，我们是被逼得无法才吃这碗饭的。”

很明显，这是伪军向民兵写的哀告求饶书。于是，民兵广泛开展了“攻心战”，让地雷和政治宣传一齐爆炸，一齐开花，把鬼子和伪军的裂缝炸得更宽更大。

民兵们马上行动起来，埋上真雷再埋上假雷，然后写上标语传单警告伪军，并规定暗号给伪军指出路线。所以在各地的墙壁上，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诗传单：

要想过河先搭桥，要想成佛扔屠刀，
进了边区别作孽，地雷饶你命一条！
只饶你们小命，不让鬼子逃生。

倘不遵守规定，地雷决不留情！

此后，有些伪军果然搜山领着鬼子绕圈；发现粮窖向鬼子作假报告；走路按照我们的暗号，指东不敢往西走。

由于边区各地民兵地雷战广泛开展，对我外线出击的主力起了很大的配合作用；日寇所谓的“毁灭大扫荡”，终于在我边区军民协力打击之下被彻底粉碎了。

在追击逃出边区的敌人时，途中缴获敌独立第三旅团第六大队代理大队长菊池重雄的日记，他在日记里写道：“地雷战使我将官精神上受威胁，使士兵成为残废。尤其是要搬运伤员，如果有五人受伤，那么就有六十个士兵失去战斗力。”他还写道：“地雷效力很大，当遇到爆炸时，多数要折骨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

从敌人口中，也足以看出我边区民兵地雷阵的威力了。

石雷显威敌胆寒

说起石雷，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区根据地的军民对它都非常的熟悉。那时，乡亲们手中打鬼子的武器很少，为了与日本鬼子作斗争，就根据当地山区石头多的待点，就地取材，创造出了一种用石头制成的地雷。这种石雷取材方便，创作简单，只需用钻子和铁锤往石头上凿个洞，装上炸药，安上雷管，这个石雷便制成了。别看这种简单易做的石雷，当年可是把小鬼子们炸得魂飞魄散，寸步难行。就连鬼子的探雷器对这种石雷也奈何不得。因此，当年的伪军最怕到太行山区“扫荡”，因为那里草木皆兵，“连石头都会炸！”

太行山深处有个村子叫樊家窑，当年这里的人们可说是创造和使用石雷的“高手”。他们制作的石雷千奇百怪，真假难辨，他们布置的“石雷阵”更是神秘莫测，奥妙无穷。

有一年的夏收季节，鬼子又要来这里抢粮了。这里的武工队员们奉命布设石雷，延迟敌人行动，积极配合我八路军主力的出击。

队员们立刻行动起来，在敌人的必经之路布设了石雷阵。什么拉雷、踏雷、弓雷、子母雷……安排得多样而巧妙，大大小小的石雷足足埋了有半里路，雷区上面弄得和平常一模一样，在上面还有意弄上了牲口走过的蹄子印和拉的粪蛋。在真雷阵的前面还故意弄了一个假雷阵，迷惑敌人。

天大亮时，石雷阵已布置就绪。大家伏在山头的树丛里，拨开树条向北望去，不一会，就见敌人向石雷阵走来了。前边是四、五个便衣，后边是乌压压的一片，最后是民夫牲口。看样子大约有二百多鬼子和四、五百伪军。

走在前面的那几个便衣大概吃过地雷的亏，走几步就要停一停，弯下腰摸摸地。突然，他们站在那里，拼命地向后招手，后边立即就跑上去几个拿着探雷器的鬼子，只见鬼子拿着探雷器左左右右的探了探，然后全体卧倒，一个工兵上前胆颤心惊地去排雷。可鬼子撅着屁股挖了半天，排出的不是烂鞋、粪蛋就是石头，一颗真正的地雷也没挖着。被捉弄的鬼子恼羞成怒，就把一群伪军赶到前头开路，继续往雷阵里走来。这些伪军早都知道石雷的厉害，但又不敢违抗鬼子的命令，只有硬着头皮慢慢往前蹭。这些狡猾的家伙似乎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偏偏不走大道，反而小心翼翼地从路旁的草墩上走，没一会儿开路的伪军就悄悄穿过了真雷区。

大队的日军跟着“黑狗子”往前走，雷还是一个没响，眼看着鬼子的一

部分已过了雷区，这时只听“蹦”的一声，“地枪”响了。“地枪”是队员们利用打狼的办法：把猎枪固定在地下，只露个枪口，用一条暗绳子倒系在枪机上，只要鬼子从枪口前走，脚一踏地上的机关板，枪口就会吐出弹丸，休想逃脱。这一声枪响，使本来就已魂不附体的日伪军吓得阵脚大乱，他们以为是踏上了地雷，许多原本在草墩上行走的众人突然像放羊一样四散逃开来，很多日伪军跑到了石雷阵里。只听轰隆、轰隆、轰隆，石雷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黑烟、尘土冲空而起，碎石横飞。鬼子越挨炸，越乱套，越乱套，越挨炸，干着急，没办法。就这样，鬼子们在石雷阵里像野狗一样到处乱撞了好一阵子，被石雷炸得死的死，伤的伤，躺倒了一大片，却连“八路”的影子也没见到。

日伪军们再也不敢往前走了，他们知道，再往前走，必是死路一条，前面不知还有多少地雷阵在等待着他们的“光临”。就这样，狼狈不堪的鬼子，只好收尸的收尸，抬伤兵的抬伤兵，一粒粮食没抢到就灰溜溜地滚回了据点。

皮徐支队进豫西

位于豫西的偃师西通秦川，南依伏牛山，曾是历代兵家必争的要地。由于自然灾害的蹂躏，和连年的兵荒马乱，这里人民的生活极为困苦。特别是1944年4月，汤恩伯部号称40万“国军”不战而逃，把数千万人民抛在了日寇的铁蹄之下。豫西人民恨透了国民党军队。汤恩伯的溃逃，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们忍无可忍，自发地组织起来，利用有利的地形和各种便利条件，拦途截打解除了不少汤军散兵游勇的武装。就连汤恩伯的副司令王仲廉逃到这里时也被老百姓拦住了。起初王仲廉还在马上耀武扬威地说：“我是集团军副司令，堂堂抗日大军，谁敢阻拦？”老乡们理直气壮地反问：“日寇来了，为啥夹着尾巴跑？”王仲廉被问得张口结舌，副官战战兢兢地问：“你们到底要干啥？”群众一齐吼道：“把枪留下！你们没种抗日，我们抗！”喊着，叫着，一涌而上，动手抢夺。王仲廉见势不妙，打马便跑。当跑到豫鄂交界的老河口时，身边只有几个马弁了。群众自拦截了许多汤恩伯军队的武器，拉起了各式各样的武装，只可惜许多武装被地主豪绅和流氓兵痞所利用。在原本动荡、贫困的地区更加混乱，急夺势力、地盘，仇杀、械斗愈演愈烈，天天枪声不断，打杀不止，局势更加混乱……

为了解救河南人民，党中央紧急命令从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别抽调一支部队挺进豫西和豫南，开辟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豫西偃师地界的是我军著名战将皮定钧和徐子荣指挥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人称“皮徐支队”。

部队一进入豫西，沿途所见，触目惊心！到处是干裂的黄土，地里连草都不长，树木都已枯萎，树皮都被人剥了吃掉了，到处可以看到一堆堆的白骨，活着的百姓也是衣不遮体，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有一位中年妇女，丈夫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被“国军”枪毙了，大儿子又被抽丁抽走。她把仅有的两间破屋卖了赎回儿子，谁知钱又被国民党军劫走。她一气之下，把刚满周岁的婴儿摔死在伪保长脚下，免得长大被抓丁。她自己也因此得了重病，整天哭哭啼啼……

连年的战乱，兵匪四起，各种武装多如牛毛，民不聊生。使偃师这一带的情况非常复杂。特别是国民党特务为了阻止我军在此建立根据地，损坏我军声誉，经常趁乱打着我军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尽干坏事，弄得群众真

假不明。

一天，部队在黎明时分刚刚翻过一个山口，冷不防一声枪响，鼓噪群起。抬头一看，山坡上黑乎乎地站满了人，挡住了我军的去路。部队只好停止前进，向他们喊话：

“老乡们，我们是抗日的八路军！”

“八路军？现在都在黄河以北，咱豫西没有。”

“我们就是才从黄河北过来的八路军！”

“哪个知道你真假！谁脸上也没刻字！”说着就叫嚷起来，舞刀弄枪就要动武。在这紧急情况下，我军官兵没有急躁，沉着应付，选派了几个代表上前和群众耐心地解释。代表们举起大盖枪和一些日军军用物资向群众解释说，这些都是在太行山打鬼子缴来的，到此地来只是为打鬼子，绝不打抗日百姓。这些人最后才答应让我军翻过了这座山口。

为了打开局面，使我军很快在人民群众中生根立足，部队决定，首先来个武装大游行，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把抗日八路军来了的消息尽快告诉群众，并以部队严明的纪律，爱民的行动事实来争取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这个任务完成起来一点也不比完成战斗任务轻松。

武装大游行开始行动了。

执行此任务的战士们武装整齐，容光焕发。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一致的步伐，喊着嘹亮的口号，唱着雄壮的歌曲一路走去。这支队伍尽走一些大村大镇和集市等人多的地方，所到之处，红旗飘扬，战歌嘹亮。不论在何处，只要有人，就停下来宣传我党的政策和八路军的任务，将“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的布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各种标语传单沿途张贴、散发。

有时候，战士们走近一些村寨，寨门忽地紧闭起来，任你磨破嘴皮，也是不开。战士们既不动怒，也不着急。他们知道，连年来，兵匪一家，把乡亲们害苦了，多如牛毛的武装有几支是为百姓的呢？这些寨子就是为防兵匪骚扰兴建的啊。战士们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说明自己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他们整齐地坐在寨门前唱起了抗战歌曲。到吃午饭的时候，就把袋里的干粮掏出来啃着吃，没有水喝，他们就请老乡从寨墙上放下吊桶，把大头银元放进去，买他们的开水喝。夜晚，就在寨门外露宿，以星空为被，以大地为床。绝不扰民。乡亲们很快便从这些行动中辨明了真伪，一处处寨门戛然而开，群众像亲人一样把战士们迎进寨去。

一次，在陶家寨，群众听到战士们的喊话，正要打开寨门，突然，恶霸乡长窜了出来，把机关枪架上了寨墙，不许战士们前进一步。局面顿时紧张起来，战士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在这时，寨内人群中跑出一个青年，他站在寨墙上向乡亲们喊到：“乡亲们，这是真的八路来了！……他们就是打登封机场的八路，不会有假……”原来，这个青年曾被鬼子抓到登封去修机场，亲眼目睹了皮定钧率领的八路军歼灭机场守敌，解救两三万民夫的战斗。他的话比什么都灵验，乡亲们一阵呼喊，就把恶霸乡长的机枪掀下寨墙。

八路军的游行宣传，犹如一阵阵春风，吹遍了偃师的村村寨寨。人民知道这是一支自己的队伍，群众的误解消除了，国民党的阴谋失败了，反动势力再也难随心所欲利用群众武装与我对抗了。八路军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热情欢迎和全力的帮助。许多地下党员也都和部队接上了关系，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和开展根据地工作的骨干。我军去偃师初步扎下根，成立了偃师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偃师警卫连。

群众有了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武装，气更壮，腰更直了。

一天下午，一个衣不遮体的老汉跑到县府告状。原来这个老汉一家由于连年灾害、兵荒马乱，家里除了他和小儿子，其它人都死光了。眼看小儿子也要饿死，他不得不狠了心，把仅有的两亩地卖给了地主。现在他无立锥之地，要求政府作主。人民政权为人民，这个老汉的反映代表了群众的迫切要求，于是，一个声势浩大的“倒地”运动便在偃师南部山区开展起来，把凡是过去荒年贱价卖出去的土地，一律按原价赎回。为此，八路军还专门成立了工作队，分头到各村寨去帮助工作。在工作队的帮助下，经过开会、讲理、折算地价、丈量土地，最后把一张张卖地文书从地主老财手里索取回来，一把大火，付之一炬。老乡们如同搬掉了身上的一座大山，各个村寨像节日一样沸腾起来，农民们欢天喜地，互相祝贺，跑到失而复得的土地上欢呼。多年不见的高跷、旱船、曲子戏又闹腾起来了。到处吹吹打打，尽情欢乐。

偃师的老百姓通过自己亲身的感受，知道了八路军是自己的队伍，是为穷人们打天下的队伍，对八路军无比的爱戴和全力地支持。八路军和这里的群众结成了血肉关系。政权也更加巩固。广大农村青年大批参军，地方武装也扩大成了“偃师独立团”。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军民团结、合作，打了不少大胜仗。

黄桑乡的史乡长

1944 年深秋豫皖苏边区的敌人仍是很猖狂，眼看天气就要冷了，战士的棉被还没有着落，武器也需要修理，可是在敌人据点林立，敌、伪和顽军夹攻的情况下，大家都在为即将来临的冬天伤脑筋。经过研究新四军供给部决定到萧县的黄桑乡去购置军需品，缝制棉被和设立修械所。黄桑乡是一个出色的游击区，它的东南面就是曹村车站，驻有一个团及一部分日本鬼子，到那里收购东西，有一定的危险和难度。部长派赵股长带领一部分工人和警卫人员出发了。大家挑着机器负重行军，摸黑穿过敌人的据点，拂晓前才赶到黄桑乡公所所在地——土盆。

在上路前，部长介绍那里的乡长史珍是一个很好的乡长，会帮助部队把一切都做好的。大家心里想象着，史乡长一定是个身材魁梧，神采奕奕，斗争经验丰富的一个不平常的大汉。可大家见到的史乡长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小个子，脸黄，一对因没睡够而布满红丝的眼，老是“夹挤、夹挤”的，看来年龄还不足 30 岁，身上披件黑夹袄，腰里缠条蓝布，倾斜的肩上搭着一条布搭肩。他一手接信，一手揉眼，慢悠悠的，让大家先去休息。赵股长着急想问一下情况，他只是说不用着急，他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他亲自到每家安置大家住下，说也怪，每家都对他很尊敬，连孩子看到他也叫“好乡长”。

第二天，天还未亮，赵股长就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史乡长。他披着一身露水，眼睛更加充血、发红，眯成了一条线，没有多说话，冷冷地告诉赵股长，房子已安排好了，哪家住什么人，接什么东西，连每部的缝纫机放哪都安排好了。原来昨夜一夜他都没休息。接着，他催大家吃饭，说吃过饭后再去联系购布的事。没等同志们向他道声辛苦，他就走了。不大一会儿，只见老乡们端着热腾腾的饭菜，说是乡长通知他们送来，让大家吃。这热腾腾的饭菜把同志们的心都烘的热乎乎的，同志们也非常有信心完成任务了。收购工作开始了，大家整天忙得没空，史乡长更忙，他亲自当向导，带大家

到集镇去收市，而且他熟悉各种布匹，看得出经纬稀密，懂得布面宽窄对于裁剪是否合算等等许多行家的知识，避免使部队收到孬布。他工作很忙，可还是按时间一家家地去动员妇女、民兵，组织突击队，帮助部队尽快完成缝制棉衣棉被的任务。要是劝他歇歇，他会冷冷地问你：“ 咋，这事我不能沾个边？ ”做好的物品东西得搁好，随时准备行动，可棉布越来越多，一有情况，疏散困难。赵股长和同志们有些发愁，史乡长帮着收布制衣，还忙着乡里的工作，实在太累，真不愿意再打扰他。可他知道后，只是挤着那对红红的眼睛慢悠悠地说：“ 不要着急，没问题 ”就出去了，一会来了很多群众，原来他动员大家共同保管，哪一家缝多少就保管多少，一会堆积如山的棉布就疏散好了。当赵股长看着他用自己的破衣服破被子把棉布包起来送出去时，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紧紧地握住他那双消瘦的手。

一天半夜，忽听狗叫，赵股长和同志们赶快起来，哨兵报告说，有一伙人向这里走来。民兵队长领着民兵来了，说敌人出发“ 扫荡 ”了，他们是来帮助转移的，赵股长正想着怎么走时，民兵队长却说，一切乡长都给安排好了，连走那条路都给计划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走！“ 史乡长现在哪里？ ”赵股长急着问，这几个星期的接触，部队的同志都非常的相信他，觉得离不开他，他没来，有些不放心。民兵队长看出了大家的心事，安慰说：“ 他留在乡公所里，敌人一来他得周旋。放心吧，安排好没问题。 ”部队开始转移了，人、机器全往大山里走，在民兵队长引导下，越过龙岗山，来到西村，一到那里，早有史乡长派去的人给安排了住所，让好好休息，一有情况，史乡长会马上通知的。这一夜，只听得远处不断传来人声、狗叫声。敌人在动，部队、群众也在动，妇女、小孩、老人成群结队地走，在西村和附近的庄子里，转移来的人们和东西，挤满了土屋窝棚，这么一支庞大的转移队伍，却井然有序，杂而不乱，这需要多么周密细致的组织工作啊！大家虽然没有看到史乡长，都觉得他就在队伍的前面，领着大家前进……

第二天，天没亮，赵股长就带着警卫排想去村里看看，没有走远，忽然隐隐约约看到东南方向几个高山头上有人影。“ 是敌人？难道村子给占领了不成？史乡长为啥不早报个信来？ ”部队马上就地隐蔽，以便摸清情况后，再决定行动。天渐渐地亮了，赵股长用望远镜看去，不觉惊喜地叫了起来：“ 啊！是他们。 ”原来，站在山上的是我们的民兵，同志们忘了一夜的困倦，高兴地跑上山去，大家欢跃在一起。“ 史乡长呢 ”赵股长发现人群中没有史乡长就问，民兵队长说：“ 他正在乡公所忙那！ ”跑到乡公所，看到史乡长正偏着头伏在那里写什么，一面揉眼睛，一面抓头皮，像在思考什么。他的搭肩还搭在右肩上，风尘仆仆，好像远道归来，刚刚坐下。他一看见赵股长和同志们，就赶紧跑过来：“ 老赵，吓了一跳吧！ ”说完，他笑了，“ 当兵的还怕吓？ ”老赵高兴的和他说笑，“ 不怕吓，那好！ ”他使劲打了老赵一下，停了一会，严肃地说：“ 过了，搬回来！ ”至于昨晚他怎样一夜未睡，怎样组织转移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的东西，怎样与敌人周旋，他压根儿没谈，看看他，让人心中暗生敬佩。赵股长关心地问：“ 你为大家又是一夜没合眼吧！ ”可他一听，反而不安起来。“ 老赵，说这干吗？ ”显然他不愿意这样说他。说着他又埋头赶快写起来，原来，他正在整理关于转移工作的报告，里边主要的一项是部队存放在群众家里的军需品的情况，写完后，他约赵股长一起去检查，要是看到公家的东西群众有一点没放好，他就认真地指出来，甚至自己动手摆放。部队在那里驻了一个多月，工作很顺利。不说别的，光

军用棉被就缝制了一千多床，在那样四面是敌人的环境里做成，还要想法运送出去，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但军民共同努力，任务圆满地完成了。

供给部的同志们要走了，但一清早找不到史乡长，刚要出发时，他气喘喘地跑来了，后边还跟着一群拿扁担的人。“老赵，来，担子！”他一边说一边往人群里钻，原来他又为部队组织了担子队。“史乡长，你……”老赵拍着他的肩膀很过意不去。“嗨！最后一次！”他还是“夹挤、夹挤”着红红的眼睛，小小的个子，黑夹袄仍旧用一条老蓝布缠着。“史乡长，最后说一句，你可别生气！”赵股长知道他的脾气，不愿别人说个“好”，先打着预防针。“说吧！”他笑笑，于是，赵股长也像他平时那样使劲地拍着他肩膀：“史乡长，你才真是我们供给部的军需股长，离了你，什么也干不成！”他一听，脸就红了，“夹挤”了一下眼睛说：“唔！你说我！我靠谁？靠大家，靠人民，离了他们，我又能干什么！”他大声地笑了，大家也笑了。史乡长的话让人回味，我军的后勤工作，依靠的就是像史乡长这样的地方干部和像黄桑乡这样的抗日人民！只有和他们联合在一起，才是战无不胜的！

民兵徒手夺日机

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开始。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恶不做。我八路军将士发扬红军的革命传统，不怕牺牲、英勇抗日，爱护人民，保护抗日群众的利益。这种情形广大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然而然地，发自内心热爱自己的子弟兵。民兵徒手英勇夺日机的故事，再现了我军民亲密无间，水乳交融，不畏艰险，同仇敌忾，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情景。

1945 年 9 月的一天上午，日本侵略者的一架“九九”双发螺旋桨运输机，因左侧发动机发生故障，被迫降落在山东省海阳县留格区大辛家乡南庄村附近海滩上。此时的日本鬼子惊恐万状，三个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从飞机里爬出来急急忙忙抢修。看样子，为了急于修好复飞，连飞机右侧的发动机都没敢关车。

这一年，这一带农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庄稼却长得十分喜人。九月金秋，谷穗黄澄澄，苞米伸出尺长的棒子，丰收在望。负责保护秋粮的 42 岁民兵张吉俊，躲在垄沟里看得真真切切，他趁机外慌乱的鬼子不注意，神秘地摸到飞机上，正待进舱的同时，又发现机舱里还有一个鬼子也在忙碌着抢修。当他正琢磨着如何行动消灭掉鬼子的时候，他的眼睛猛地一亮看到另外几个保护秋粮的民兵飞驰般地跑过来，便奋不顾身跃进机舱，扑向鬼子，恨不得把敌人撕个粉碎。张吉俊赤手空拳与手持钢刀的鬼子拼死搏斗了八九分钟，左手背也被鬼子用钢刀刺伤，但他毫不顾及，忍痛拼搏，说时迟，那时快，他飞起一脚，对准鬼子的小腹猛踢过去，只听一声惨叫，鬼子应声倒下，张吉俊趁势夺过钢刀将鬼子砍昏。

机外的民兵喊着“缴枪不杀”向鬼子冲去。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把机外的三个鬼子搞得懵头转向，慌乱不堪，仓皇撤逃。其中一个鬼子向民兵开了一枪，也没打中，一个民兵向他扔去一颗手榴弹，也没炸着。在来势很猛的民兵包围之中，他走投无路，最后绝望地开枪自杀了，另外两个鬼子则当了俘虏。之后，张吉俊说我们民兵能勇敢地冲向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兵是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决心，就是坚决抗日，保家卫国，打败日本侵略者，

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在审讯中，机上的那个日本鬼子说，如果民兵们再稍晚一点赶到，用不了五分钟，飞机便可修好飞走。民兵们兴高采烈地把缴获飞机的机身上的日本国徽涂掉，写上“ 中共 ”两个大字。

一天早饭后，当我们的飞行员告别乡亲将缴获的日本飞机架机起飞以后，他们看见从机舱厕所里闪出一个人影来，不觉大吃一惊，这个人是谁呢？原来是张吉俊。他因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曾要求搭乘飞机去桃村，因为飞机是在海滩上起飞，难度较大，所以被我们的飞行员婉言谢绝了。张吉俊不死心，头天夜里就带上干粮偷偷地躲进了飞机的厕所。因此出现了飞机起飞后的吃惊的那一幕。此刻的他笑着对大家说：嗨，蚊子真厉害，咬得俺一夜都无法睡。

徒手夺日机的民兵英雄张吉俊，就这样坐上了他亲手缴获的飞机，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